

Almond Flowers 2011, Vol. 2

二〇一一年第二期 总第十六期

夏季号



杏花

今天是什么时代
民国初期的宗教自由运动
被劳动改造的岁月



新約全書





我是基督徒。
我信上帝。
我与罪恶战。
我追随上帝。

——孙中山先生临终告白

卷首语

以撒在别是巴的时候，夜间遇见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听到神向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创 26:24）这个地方是他父亲亚伯拉罕挖到井的地方，是他父亲求告神名的地方。就在这里，以撒筑了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也同样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井。日后等到雅各来到别是巴，这同一位神向他显现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创 46:3—4）

或许以往对尚未独立的以撒或雅各来说，这位神只是他父亲的神，因为他父亲的神而是他以及整个家族的神。这位神因为在他父亲身上所给予的应许、所彰显的奇妙作为，而让他对这位神有所认识。终于有一天，这位耶和华神直接向以撒或雅各本人说话，明确地显明自己不只是他父亲的神，现在也要作他的神。神亲口给他应许，亲手在他身上彰显作为，让他独自地经历与神的同在。这位神是活人的神，他因为与作为他仆人的我们父辈的约，就照着他信实的本性，定意要成为他仆人的下一代人的神。

就中国本土教会的发展历史来看，还没有哪个时期中国教会能够像现在这样自立地发展，不仅要独立地履行教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承担的使命与责任，也要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主流教会与其他社会群体有所互动。在 1949 年前，本土教会一直是在差会建制教会的荫护下，学习如何从大公教会母体的怀抱中自立出来，就如一个在呀呀学语、摇晃地学着走路的幼童，还没有在中国社会完全承担起主流教会当承担的使命与责任。在那个时期，神因为是父辈的神因而是那一代本土教会的神。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中国教会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不仅被分裂，被彻底地置于社会的边缘，同时也在各种政治运动的高压之下大浪淘沙，仅存的余数被分散为小的群体，隐秘地以家庭聚会的形态学习着如何在经历苦难中炼净自己的信仰；学习着在父辈离去后如何在一个无神论的政权下独立地生存。在那种艰难的处境下，这位神成为她自己的神，让她亲身地经历到神奇妙的保守与引导，为中国教会保留并播下纯正的福音火种。

或许对于一个走向成熟自立的本土教会来说，这两个时期的功课正是需要学习的功课，并且也只有战胜了这两个方面的考验之后，才可能在今天开始真正的教会建造的过程。然而，就是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老一辈陆续地息了他们在地上的工，而让我们这生命仍有待成熟的一代去独自地探寻和实践今天神给教会的带领异象，亲自地去聆听神的应许，观看他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会有的奇妙作为。

本期主题是历史的反思。时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以及义和团运动一百一十周年之际，我们希望在回顾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变迁历史的同时，也在此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反思中国本土教会的发展历程，以此更加明确神在教会建造方面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引导与带领，以及在日益走向社会主流方面赋与这一代中国教会的使命与责任。由于外在环境的因素，本期没有收齐预定的约稿；愿所登出的文章能够引发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思考。■



目录

卷首语

真理讲台

- 3 ▶ 今天是什么时代? /王怡

历史反思

- 5 ▶ 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兴起的内部源流 / 刘同苏
18 ▶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 / 王怡
30 ▶ 民国初年的信教自由运动 / 刘义
36 ▶ 异象：过去、现在与未来 / 李小白
41 ▶ “反西化”还是“现代化” /秦晖

灵性操练

- 49 ▶ 信心与祷告 / 倪柝声
53 ▶ 个人灵修——自我牧养的一种方式 / 游冠辉

敬虔生活

- 56 ▶ 寻找沉默百年的逃亡日记 / 沈颖
62 ▶ 我所认识的王明道先生 / 林献羔
65 ▶ 被劳动改造的岁月 / 杨毓东
72 ▶ 在天国相会 / 喜乐
78 ▶ 生命的乐章——追思主的使女、一代忠仆杨心斐 / 基立
83 ▶ “我们经过水火” / 林献羔 Sarah整理
87 ▶ 回忆谢伯伯 / 许波

读书沙龙

- 89 ▶ 看，圣灵的感动——读优西比乌《教会史》 / 小雪
92 ▶ 百年余音今犹在——读《回首百年殉道血》有感 / 凯文

文化透视

- 95 ▶ 山西忻州百年福音堂保护活动始末 / 麦克
101 ▶ 换药不换汤 / 许宏
106 ▶ 百年辛亥——我们往哪里去? / 傅国涌

艺术广角

- 110 ▶ 怀念战友 / 书拉密
118 ▶ 洛桑会议日志 (之三) / Maria
封三 ▶



编辑

《杏花》编辑部

二〇一一年十月出版

本刊浏览及下载网址:

<http://www.xhjournal.com/>

投稿邮箱

xinghua2007@gmail.com

内部刊物
免费赠阅



今天是什么时代？

文 / 王怡

各位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神的儿女，平安。

最近发生了许多事情。我深深感到，时不我待，因为时机都握在主手中。上周和几位牧者交通，说在这个时代蒙召传道，就是内外作战，两头燃烧。主内的争竞、退后和动摇，世界的贪婪、慵懒和蛮横。血肉中的属灵争战，从人意看，是地上喧嚣了几千年；从信心看，是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当我略微体会十架道路的真义时，我才对何为“主看千年如一日”，有了更多的理解。

以前，我也不太理解，甚至不太喜欢“基督精兵”（提后 2:3）的比喻。我甚至反感圣经中对信仰生活的军事化类比。穿戴的是全副的军装（弗 6:11），跟随的是救恩的元帅（来 2:10），打的是美好的仗（提前 6:12），飘扬的是真理的旌旗（诗 60:4），魔鬼要与圣徒争战（启 13:7），亲人要与亲人为敌（太 10:21）。

多年以来，我们下意识地躲避这些教导，人人练就了一副矫捷的身手。

我曾说，信仰先是一扇门，然后是一条路。我们靠恩典入门，还要靠恩典上路。信仰先是一个家，然后是一个国。一家之主称为父，一国之君称为王。有人进了门，却一辈子睡客厅。有人回家几个月，就不孝敬父母。然而，上帝是我们的“父王”，天上地下，再也没有更亲密而敬畏的称呼了。仅仅是开口，呼唤一声阿爸父神，整个时代就足以在我面前土崩瓦解。

但我察验自己，之所以下意识地抗拒“基督精兵”的比喻，问题还是出在这里，就是对自己身临其境的这个世代，仍然评价过高。

有人说，今天中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经济日渐鼎盛，社会日趋复杂，而在一切繁华的背后，都能看见、也必须看见的，是信仰的复兴。

有人说，今天中国的使徒时代。信仰的传承，要先经过使徒的性命，再经过使徒的信经。信经从来不是神学家的信经，而是殉

道者的信经。这是一个从性命到信经的时代，但殉道者的数目还没有满。

有人说，今天是中国宗教改革时代。思想家波普尔曾说，马克思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他以恨取代了爱，以寻找敌人取代了寻找朋友。但上帝使用共产主义的错误来击打一个启蒙主义的时代。上帝使用党国的邪恶，以文化革命和专制主义扫清了宗教改革的障碍。基督的爱是倾城之爱，为了使中国人也能像马丁·路德一样，说出“这是我的立场，我的良心是上帝的囚徒，我一步也不能后退”；主耶稣为此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也有人说，今天是中国清教徒时代。家庭教会起源于一群“不从国教”的天路客。他们为了自由地敬拜上帝和传扬福音，走上十字架的路程。所谓清教徒，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基督徒。我之所以会在21世纪蒙恩信主，不但出于基督的宝血，也是因着他们



在基督里所献上的活祭。瓦器中若没有上帝的宝贝，生亦何欢；活着若不能成为活着的道，死亦何惧。

也有人说，今天是中国古列王时代。上帝必要激动外邦君王的心，为他在中国的教会撤去苦杯，预备爱筵。然而爱筵就是苦杯，苦杯就是爱筵。正如和平就是争战，争战就是和平。“平安”的意思，不是取消冲突，而是指向一切冲突中恩典的临在。换言之，“何处有扰乱和各式各样的坏事”（雅3:16），何处就有和平。就如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5:20）。

今天，每一个中国基督徒在地上的命运，都与一场大复兴有关。除了为这场复兴而生，为这场复兴而活，世上的万事都将显为虚空。

今天是一个乖僻弯曲的世代（申32:5），今天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太16:4）。人若在这样的世代养尊处优，事事亨通，说明这人也是弯曲邪恶的。

然而天是耶和華的天（诗115:16），夜是耶和華的夜（出12:42）。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正是我们为什么信主了，却没有马上被接回家缘故。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遭遇一切纷争和磨练的原因。因为主说，“你们要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2:15）。求主赐我们更大的信心，免得我们生不如死；求主使我们大大张口，他就给我们充满（诗81:10）。

我和其他一些传道人，已决定就守望教会事件联署向政府请愿。家庭教会的前辈谢模善弟兄，这样回应我们，“你们这一代，要凭着信心继续走下去。”

即使玉碎，但求主使用这间教会，直到他来。

今天愿与你们一起立志为主燃烧的主仆
王怡，写于2011/5/3

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兴起的内部源流

文 / 刘同苏

在一个半世纪（1840—2000）左右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穷尽了文化救亡的所有非超越性的渊源，仍然无法达到民族自救的目的，从而，显示了非诉诸超越（宗教与准宗教）的精神渊源，就不足以完成文化救亡。危机的性质（来自西方的整体文化冲击）与响应手段的局限（有形手段不可能解决整体文化或者民族精神的问题）预先决定了民族自救的失败。后共产主义时期的都市化浪潮并没有创造上述危机，仅仅显露了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的急迫性。不过，不幸有时就是幸运，诉诸有形渊源的失败，恰恰促成了对超越渊源的探求。今天中华文化里面那种完全沉溺于纯感官享受的犬儒浪潮，并不能掩盖整体文化的颓废和失落，实际上，这种彻底的声音犬马就是来自对整体文化精神失缺的绝望；当整体文化高度上一片空白的时候，人们只好追求当下的感官享受。然而，希望正生自绝望；承认“没有”，便产生了对“有”的需求。

对民族精神重新定位的普遍要求，正在生成对整体文化进行多路思考的新诸子百家时

代。“新诸子百家时代”是将春秋战国作为当代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参照；依照这种比较，当代中华文化发展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从整体文化的高度重新确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诸子百家”就是“百家争鸣”，就是各种超越渊源申明自己作为民族精神之权利的竞争；这种纷杂局面是新民族精神分娩前的阵痛，那种混乱本身就是创造的一种表象，是从空白处生出新有的必然阶段。

“诸子百家”就是民族精神确立之前的多种候选。笔者认为：直至今日，基督教依然是确立民族精神的最佳候选。关于“基督教是确立民族精神的最佳候选”的申明，并不仅仅是笔者作为基督徒的宣信，也是作为人文学者的历史观察。宗教不仅仅是作为纯粹信仰的精神现象，更是作为社会文化的历史现象。纯粹的信仰只能够存在于头脑之中；若要影响人类的实际生活，信仰就不得不采取历史的形式。一种信仰的神学正确性，那得留待最后审判去证明；一种信仰的历史成功，却可以在历史发展中发现其有形的（从而可

以进行定量分析)的轨迹。基督教在当今中华文化中的优势,不仅仅是来源于信仰的正确性,更来自于长期的历史准备。

本文是从当代中国基督教的视角回顾基督教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积累。基督教在中华文化里面的最新发展就是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尽管以往的基督教发展都隐含着影响整体社会文化的可能性(从而成为了今天基督教对整体社会文化发挥真正影响的准备),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却是基督教在中华文化中直接影响整体文化的开端。本文所描述的教会发展轨迹都指向城市家庭教会的出现;实际上,城市家庭教会仅仅是当代基督教的一种具象形式,在这种具象形式之下,基督教通过进入社会主流而开始了影响整体社会文化的历史运动。

一、源远流长——走向民间的基督教

由于西方人本主义之个人主义的影响,宗教信仰在本质上往往被人视为一种纯粹的个人现象,其社会效益仅仅是其原本个人本质之存在的衍生;宗教信仰是一群个人的迭加,宗教进入一种社会文化不过是数量放大的个人行为。其实,任何宗教信仰都是一种群体生活,是一种社会行为。单说信仰,还可能勉强局限在个人存在的空间里面,但信仰一旦具有宗教的性质,就必须是社会性的。

首先,一般信仰可以是一种纯粹个人的认定,而宗教信仰必须指向某个客观的超越实体,特别是高级宗教,其对象必须是作为终极实体的无限者。只有通过公共生活的活动及其框架,极度超越的客观实体才有可能被认知(首先被认定)。“超越”至少意味着超出个人,所以,超越物是个人单单凭借自我

不可能认知的;个人之间的彼此印证是个人确证超越客观实体的前提。

其次,宗教是信仰的外部表现;“外部”就意味着与他人发生关系。没有与他人的关系,信仰就无法外化为宗教。一种宗教信仰进入一种社会文化,是一种共同生活与另一种共同生活之间的关系;信仰者与社会成员都是某个共同体的成员,是组成共同生活的质料,其个体存在仅仅是该共同生活的载器。当一种宗教信仰进入一种社会文化,它将该社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对待,于是,便产生了宗教共同生活与社会共同生活的整体对话。在直接的具象形式上,宗教信仰是分别、单独地翻转了单个的社会成员;不过,只有在宗教信仰具有了真正共同生活的性质之后,它才会对社会文化产生整体性的冲击力。

从组成成分看,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和两个社会阶层有关:知识阶层与工商业经营者阶层。在当今中国社会里面,这两个阶层都属于主流人群。自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有两大社会要素造成了今天中国的经济繁荣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发展。一是个体经济的出现并且最终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二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可以说,没有个体经济与西方现代科技,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个体经济与现代科技的肉身载体就是个体工商业经营者和科技人员以及背后的整个知识阶层。如果个体经济与现代科技是当今中国主流社会的技术构成,个体工商业经营者与知识阶层就是这一社会的社会构成。如前所述,这两个主流人群恰恰是城市家庭教会的主导成分,这就使得基督教具有了通向主流社会的重要通道。

不过,无论工商业经营者与知识阶层在社会文化中占居如何重要的地位,单单凭借他们

自身还是无法对整体文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整体社会文化是全体人民的生活方式，没有绝大多数人群的参与或默许，就不足以改变和维系一种社会文化。以工商业经营者和知识阶层为主导成分的城市家庭教会之所以对整体社会文化产生冲击，是因为城市家庭教会不再是封闭在自我里面的独立阶层的福音运动，而是基于草根大众的普遍福音运动并且构成了普遍福音运动的部分。支配有形社会资源的优势，固然赋予了城市家庭教会以重大的外部力量，但是，其可能更新整体社会文化的内在力量来源于其与大众福音运动的关系。城市家庭教会能够有所作为，不在于其自身的社会优势，而在于上帝通过大众福音运动而赐予的生命恩典。脱离了普遍的福音运动，城市家庭教会就会丧失目前具有的整体文化冲击力，退化成为狭窄社会领域中的个别文化现象。自戴德生一代开始的普遍草根福音运动，渗透性地在社会文化的深层沉积了基督教长远发展的根基；只有踏着这大众生命凝结起来的深厚而坚实的基础，城市家庭教会才可能代表性地运用中国教会的力量，去冲击中华文化的整体。

二、直接传承——道成肉身与十字架的反合

任何信仰进入一种社会文化都必须面对如下的两难局面：一方面是如何采取一种社会文化的形式，却不因此而被该社会文化所同化；另一方面则是改变一种社会文化的劣根性，却没有随之而消灭该社会文化本身。这个反合性的任务如此艰难，以至于除了上帝以外无人可能完成。自有人类文明以来，除了基督教，尚没有一种宗教跨越过社会文化的极性对立结构。只有全人同时全神（即有

限中的无限）的耶稣基督才具有超越社会文化的最高反合性。

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存在着两个对立却相成的本质：“道成肉身”与“十字架”。“道成肉身”意味着：无限的道可以随意进入有限的从而具象的社会文化，却不会丧失自己的永恒本质。“十字架”则表明：无限的道出于爱而自我牺牲式地更新社会文化，从而，他可以改变一种社会文化的内在生命（灵），却无需取消该社会文化的外在形式（肉身）。前者强调了上帝对社会文化的超越性认同（即完全认同社会文化却不被该社会文化穷尽），后者则指出上帝对社会文化的保全性否定（即为了肯定的否定）。两者的反合作用在于，上帝在具象的社会文化中彰显了永恒的真理，从而，通过否定社会文化中的罪性而保全了社会文化本身。认同社会文化形式，却不认同其中的罪性；灭绝社会文化形式中的罪性，却不灭绝社会文化本身。正是耶稣基督生命的这种反合性质赋予了基督教跨越社会文化的可能性。耶稣基督拯救的奥秘就寓于这一反合性之中。基督教是否可能进入华夏文化，换言之，耶稣基督之拯救是否可能实现于中华文化里面，关键就在于教会是否活出耶稣基督的这种反合性质的生命。

信仰必须活出来，所以，单单在头脑里面想明白了尚不是信仰。而除非有上帝的恩典，人完全没有可能活出上帝的生命。有时，从人的立场看，上帝的恩典实在不像一个恩典，其实正因为超越了人的想象，那恩典才是超越了人的上帝的恩典。中国教会最终活出了耶稣基督的反合生命，所借助的正是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上帝恩典。生命的传递需要示范。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本没有基督教传统的民族里面，第一个示范必定来自其他的社会文化

(西方文化), 换言之, 基督教不是华夏文化自我生长的结果, 而是透过异质文化赐予的恩典。在一般情形里面, 面对一种异质社会文化形式的灵命示范, 一种社会文化需要通过漫长的实践过程, 才可能从异质文化形式的背后发掘出灵性生命的本质。透射性地将原本存身于异质文化里面的灵性生命接受到自己的社会文化形式中来, 这就是所谓的“本土化”。

基督教从“洋教”成为中国人自己的信仰, 其间经历了相对速成的奇特跳跃。1949年以后, 意识形态化的中国政府在宗教领域采取了锁国政策; 所有的外国宣教士都被驱逐了, 与国外教会的所有联系都被强行切断了。其后系统地铲除基督教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以至于以往来自西方的有形教会形式都被彻底清除了。失去了西方教会传统的直接有形借鉴, 反倒造就了一种局面: 通过圣经与圣灵, 有限的中国社会文化直接去面对无限的上帝。隔着一千九百多年的时间跨度, 中国的家庭教会直接参照与模仿了《使徒行传》里面的早期教会形式, 形成了完全本土化的中国教会。没有现成的实际教会模式比照, 没有系统的神学理念指导, 单单依靠圣灵, 中国家庭教会在自己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教会形式。“剥夺”成就了“创造”。强行剥夺了异质社会文化里面的实际灵命示范, 反倒加速了中国教会的本土化。永恒的道具有了中国文化的形式, 那是一个从石头里面生发出永恒生命的奇迹。

在现代中国的“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是中国基督徒(而不仅仅是西方宣教士), 于是, 这“十字架”就成为中华社会文化内部更新的力量。“十字架”意味着: 在文化形式认同的同时, 决不认同文化形式内部的罪性。没有“十

字架”, 信仰就会被社会文化所同化。“十字架”是进入一种社会文化的同时保持信仰本身的法宝。不经过“十字架”, 信仰就不配进入任何社会文化(因为没有“十字架”, 信仰立即就会被社会文化同化)。“道成肉身”与“十字架”是信仰进入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的双面一体的钥匙。1949至1979年中国官方全面而系统地灭绝基督教的企图, 1979年以后有限度地限制基督教的努力, 实际上却成就了极具活力的中国教会。在专政体制完全统辖了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条件下, 所有其他的民间社会组织都无法维系自身的存在, 唯有传统家庭教会凭借真正超越的信仰渊源, 不仅存活了下来, 而且奠定了全面发展的基石。可以说, 只有全面灭绝的灾变, 才可能显明不可灭绝的绝对超越。所有信仰团体与社会组织的灭绝, 不过是在专政的实际检验里面, 显露了自己高不过人间专政体制的实底。而传统家庭教会在荡涤一切的洪水中建立, 恰恰证明了其渊源的高度绝对地超越了那高过一切尘世要素的专政者。灭绝一切的专政成了伪超越者的死穴(真正的超越不可能被专政所灭绝), 却成了它专不了政者的铺垫。

传统家庭教会是完成上述反合性生命运动的主体。20世纪50年代, 中国教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一方面, 中国政府驱逐了所有的外国宣教士(据统计, 至50年代中期, 侥幸留在中国本土的外国宣教士不超过五人), 中国本土教会与西方差会的联系被强行切断。那时, 中国教会尚未最后完成本土化, 在各方面都对西方教会有所依赖, 外在强行地截断其与西方教会的联系, 相当于把哺乳期的婴孩从母亲的胸脯上揪了下来。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强制性地由教会内部改制, 从教会的治理结构上, 把信仰独立的教会变成屈从政



王明道夫妇

府意识形态的组织，把作为民间组织的教会改造成服从政府命令的官方垄断行会。

尚未完全成熟的中国教会，在全然没有外来支撑的条件下，独立地站起来响应了灭顶之灾般的危机。王明道、林献羔、杨心斐、袁相忱、谢模善，一批中国的基督徒坚持独立的信仰，拒绝教会成为政府的附庸。当现在论及50—60年代的独立信仰运动，提到的仅仅是一些个人（单个的基督徒），而不是地方教会。这表明当时的中国教会尚无法作为整体教会做出独立的反应。不过，这一批中国基督徒的生命实践，奠定了未来成型的中国教会传统的基石。由于当时的教会反应仍然是个人性的，外在结构尚未形成教会的模样，其真正的领袖因为被监禁或流放而没有直接处身在实际教会生活之中，也许那时的独立教会还称不上“家庭教会”，而仅仅是家庭教会的雏形，但是，家庭教会的独立精神与基本形式已经由这一代中国基督徒所奠定。60—90年代以河南、安徽、浙江温州为中心的独立信仰运动，将上一代中国基督徒所开始的独立生命传统，

化为有形有体的实际教会。

不屈从于政府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在家庭或类似的非公共领域里坚持独立自主的教会活动，于是，在内在本精神与外在形式这两个方面，第二波的中国独立信仰运动完全继承了上一代的生命传统。这一波教会发展的重要贡献在于：在上一代中国基督徒那里，家庭教会传统还是个人性的和精神性的，到了第二代，那一传统已经被群体生命所承载并由此成为实际的和公共性的教会生活。可以说，到了第二代，家庭教会才实体性地成为教会。这两代中国基督徒及其形成的教会传统通常被称之为“传统家庭教会”。

70年代末期以后，官方意识形态悄悄地萎缩，强大起来的民间社会却没有真正的内在精神作为价值结构的核心，城市家庭教会就是在这种社会形势里面兴起的。外在地说，城市家庭教会就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萎缩，社会文化极度缺乏价值结构核心的条件下，进入中国主流社会的教会。尽管出现了上述的外部条件，城市家庭教会必须具有足够的自我

力量，才可能把握这种机遇。城市家庭教会能够把握这一机遇的力量渊源首先就是对传统家庭教会传统的继承。如果不是传统家庭教会在圣经与圣灵的引导下，创造了中国样式的教会，中国的主流社会怎么会接受一种“洋教”呢？整体社会文化对基督教的普遍接纳，不仅表明外在社会条件的改变，更显示了内在形式的更新。除了“道成肉身”的中国教会形式，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化境遇里面的“十字架”传统。只要没有用自己的生命背负“十字架”，书本上写的，头脑中想的，口头里说的“十字架”就都是别人的；正因为传统家庭教会以中国人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十字架”的真理，才出现了“十字架”的中国传统，换言之，“十字架”才实体化为中国基督徒的生命，才具有了中国形式。当我们不仅仅透过戴德生、李爱瑞、马礼逊、利玛窦、汤若望、阿罗本见到基督的生命，而更是通过王明道、林献羔、杨心斐、袁相忱、谢模善、李慕圣、张荣亮、沈先锋而遇见基督，“十字架”的生命就具有了中国面孔。没有一种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自己的社会文化里面的“十字架”传统，在世界罪性价值观的冲击下，进入主流社会的城市家庭教会就无法保守住自我生命的属天性质。传统家庭教会“道成肉身”与“十字架”的反合性质的生命实践，奠定了城市家庭教会进入中国主流社会的内在生命基础。没有传统家庭教会的准备，城市家庭教会就不可能进入中国主流社会，即便进去了，也无法保证不改变其生命的性质。

三、海外逃城——通向他山之石的路径

中国教会在本土被外在地斩断了与普世大公教会的联系，但是，在本土之外，中国教会

的某些部分依然有形有体地连接于普世大公教会。在本土以外的中国教会里面，有三个部分共同发挥着主导作用，这就是台湾的教会、香港的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

由于这些教会在“肉身”上没有被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权力所统辖，它们依然可以作为独立的教会而自由地从事自我的活动。从外在形体看，海外的华人教会保持了一批独立（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的地方教会，一些相应的基督教机构（诸如神学院、基督教出版机构、宣教以及其他机构），一群信仰上可以自由活动的基督徒。上帝在意识形态化政府的统辖之外，保留了这些教会，在外在功能方面，是要保持中国教会与普世大公教会的有形联系；在内在功能方面，则是继续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之间进行融会贯通的生命实践。上述的功能都是为了让仍然被困锁在中国本土的教会可以最终有形地回到普世大公教会里来，也是为了基督教全面融入在本土原创文化中心的华夏文化。

由于离开了本土原创文化中心，无论是“寄居”或“殖民”的性质，还是不足以展开宏大华夏文化的狭窄社会空间（空间上岛屿的限制，时间上文化附属地位的承袭），都使得海外的华人教会不足以承担基督教与中华文化之间全面对话或者全然连接的角色。这些教会在所处的地区，依然有其社会文化或灵性生命的位置，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教会，仅仅具有过渡或者信道的功用。深处自由环境的便利，使得海外教会可以接轨于在西方教会里面长期积累起来的神学资源与教会传统。尽管不处在中国文化的原创中心，海外华人教会与这些资源和传统的接触，依然是从中华文化思维的某种角度出发的生命实践。由于这些教会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生命实践最终会成为基督教进

入中国的传导。信仰是生命而不是理念,从而,信仰只能用生命传递。文字与语言只能叙述和介绍关于基督教的概念,而唯有活着的生命才可能承载从而传递作为信仰的生命。生命传递的首要方式就是示范;“示范”就是具象地显示,不能活生生地实在彰显,就没有示范。由此,生命传递的前提就是传递的一方先活出生命。真正将基督信仰引进中国文化的,不是一大堆翻译或介绍的神学书籍,而是活在基督身体里面的活生生的生命。外国人的生命也是生命,所以,宣教士们以及其他国家(诸如韩国)教会的生命实践也会对中国教会产生示范作用。但是,那些外国教会的生命实践需要灵性翻译,才有可能运用到中国教会身上。当中华文化面对外国教会的生命实践,需要经过对外国文化要素的剥离而还原到基督生命的原型,再从基督生命的原型返回到中国文化的境遇。可以说,在20世纪下半叶,传统家庭教会在被迫与普世大公教会隔绝的环境里面完成了中国教会的本土化,而海外华人教会却以自身的生命实践保留并进一步建立了中国教会与普世大公教会之间的阶梯。

就生命的实际交流形式而言,人与人的直接交往,显然优于书刊、光盘、电讯或网络。从纯粹人的眼光看,上述三地都碰到了某种介入中国教会发展的机遇,从属灵的角度看,这些机遇无非是上帝奇妙的计划。20世纪中期,美国政府忽然放宽了对亚洲移民的限制,于是,有大批华裔青年学生从台湾、香港、南洋前往美国留学。这批学生的到达与留居,一举改变了北美的华人社会。由此,北美的华人社会从中国城或者类似中国城的社会生存环境进入到北美的一般社会文化。由于这种文化成分的变化,北美华人教会的发展也随之变向。从地缘上说,教会的范围从中国

城进入大学城,从少数大城市的中心转入郊区的中产阶级小区。论到形式,以往仅仅是粤语或台山话的老华侨教会,其后才建立起学生团契或校园查经班,后来更出现了中产阶级的国语教会和新型粤语教会,并且还伴随着兴起了与知识分子福音工作相适应的各种基督教机构。

从60年代到90年代初的30年左右时间里,美国华人教会完成了从校园查经班到独立团契,再到中产阶级教会的发展过程。而这初步的成型似乎恰好在等待1989年以后大批涌入教会的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如果上述过程出现晚了,则整个发展就没有完成,北美教会就无法在90年代为大批中国学人提供成型的福音工作。若上述过程过早发生,教会就会因为过度定型而缺乏开放性,于是,就不会具有那么高涨的传福音热情以及对新文化成分的高度接纳(可以对照南美台湾人教会的发展与态度)。由于90年代北美的福音浪潮,在海外聚集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数量并高质量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群体,从而成为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大批转向基督的先导。“对征服者的征服”,这是汤因比对罗马帝国与其征服的小亚细亚或非北民族关系的评价,特指这些民族的信仰因为该民族的被征服而渗透到罗马帝国的腹地。“对收复者的收复”也可以被用来描述香港教会的角色。1997年香港的回归使得香港成为福音进入中国的滩头阵地。“回归”使得香港人民不得不建立与本土同感的文化意识,与此同步,香港教会也具有了不同的视野,本土的福音工作不再是外边的事情,而是内部的事情了;“以大陆事工为己任”,使得香港教会具有向大陆传福音的更大驱动力。主权的连接提供了福音工作的外在便利条件。自香港方面,有经商、旅游、

文化交流等等的方便；从大陆方面，有经商、官方常驻机关、旅游、留学（与大陆高考统一招生）、文化交流等等途径。海外没有一个地方具有香港那样的地缘条件，在签证与旅程方面那样便利地进入中国大陆从事福音与培训的工作，同时又接纳从中国大陆出来的福音对象与进修人员。

当中国教会从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带进入到主流区域的时候，其自身的形式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边缘时代，与主流社会截然对立的局面，造成了传统家庭教会与主流社会色彩鲜明的分离。换言之，外在的对立已经保证了内在的区别；只要直接的经验性存在就已经足以使教会区别于世俗世界。采取主流社会的文化形式，是进入主流社会文化的前提；所以，当教会进入主流社会文化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与主流社会文化相混杂的局面。在外在形式上具有与主流社会文化完全相同的样式（即“取了罪身的样式”，“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于内在生命方面却保持着与主流社会文化完全不同的属天性质，这样一种反合性的生命形态要求着比直接经验性存在更多的要素。外在的区别就是内在的区别，于是，存在本身就是区别；外在的无区别里面包含着内在的区别，由此，直接的存在并不能显露区别，需要对内在结构的分析，才能够最终揭示区别。

这就是当今中国教会所面对的问题。由于与主流社会文化分享了同一文化形式，对于当下的中国教会，“圣俗二分”的焦点不再是外在形式的分离，而是内在生命的分离。在外在在同一的条件下保持内在的分离，就产生了对教义（以及相关的神学发展）和结构（及其制度表述）的需要。教义是教会以明晰形式对自我信仰的统一说明；结构则是信仰实现自我的规范保证。在存在就直接是信仰的时代，教义与

结构的需要仅仅潜伏在背景之中。在存在必须加以分析才可以还原为信仰的时代，对教义与结构的需要就被推到了教会生活的前沿。借鉴快于独创。传统家庭教会的传统里面缺乏教义与结构的要素，而普世大公教会一向具有成型的教义体系与结构传统，在此局面下，从新回归普世大公教会，是中国家庭教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由于自身的文化成分，城市家庭教会具有联系普世大公教会的天然优势。

以知识分子与私人企业家为主导力量的城市家庭教会，具有先行接触西方教会传统与神学体系的技术优势，从而，成为了中国家庭教会与普世大公教会接轨的前导，也成为了中国家庭教会从普世大公教会学习教义知识与教会传统的信道。生命只能连接生命，生命也只能被生命连接；城市家庭教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家庭教会与普世大公教会对接的纽扣，不是因为它的知识与技术的传递功能，而是其生命实践成为两大教会传统生命融合的实验。在这片“试验田”里，普世大公教会的教义体系与教会结构，经由城市家庭教会的生命实践而翻转为中国形式的教义体系与教会结构；传统家庭教会的敬虔主义，通过城市家庭教会的生命实践而具有了自我的规范表述。当普世大公教会的生命传统与传统家庭教会的生命传统在中国城市家庭教会里面相遇，前者的规范形式中便充盈了生命活力的内容，而后者的生命活力则获得了持续稳定发展所必需的规范形式。

四、成长足迹——从脑到心的历程

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北京家庭教会迅速崛起并且逐渐取代温州家庭教会而成为整个中国福音运动的中心。温州家庭教会是传统

家庭教会的最后发展，也是城市家庭教会的最初发展。通过温州家庭教会，传统家庭教会的外在形式发展到十分完善的形态，也将自身的潜力发挥到极致；经由温州家庭教会，家庭教会首次在城市中形成了能够冲击整体社会文化的教会群体。温州家庭教会是传统家庭教会与城市家庭教会的衔接，由此也显明了自身存在的过渡性质。北京家庭教会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类型教会的代表，而温州家庭教会则是私人企业家类型教会的典范。中国福音运动的中心地位在温州与北京之间交接，还表明了知识分子类型的教会是目前家庭教会里主导中的主导，而私人企业家类型的教会尽管也构成了主导力量的一部分，但尚未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北京家庭教会可以说是中国本土福音运动的思想库。通过思索与尝试解决中国教会发展的关键问题，经由提供教会发展的新型范式，北京家庭教会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国家庭教会的生命更新，由此引导整个国家的福音运动进入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可以说北京家庭教会在全国福音运动的决定作用是质量性的。由于知识分子类型教会在目前中国福音运动里的中心地位，本节主要介绍与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类型教会形成的过程。

1989年的政治事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转折的意义。这一转折主要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文化性的。即使在社会文化发展里面，这一事件的实质影响并不在于造就出了什么，而在于其揭示作用。这一事件揭示了：以往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再能够为政治权力提供法统意义上的支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在学理上崩溃了，而且无法发挥其作为法统渊源的社会文化功能了，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权力在法统上停止诉诸意识形态的支持，

而开始寻找精神以下的东西作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渊源。1989年的政治事件是压垮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宣告了这种意识形态在社会文化中的统治功能之终结。1989年以后，在整体社会文化里面失缺了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种失缺的社会文化意义远远大过了其政治意义。由于以往统治性意识形态丧失了社会文化功能，于是，当下的政治权力便失去了自身的合法性依据；但是，相对于社会文化的危机，那还是较小的事情。真正的危机在于：当整体社会文化失缺了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整个社会就失去了统一的精神平台，由此，整个社会无法再生活于统一的规范性的最高价值之下；这个民族只是直观地经验性地作为一个外在身体的集合，却没有一个统治性的意识形态作为统一整个社会文化的精神纽带。政治权力丧失合法性依



北京某家庭教会的主日敬拜

据仅仅是整个社会文化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整个社会文化都没有统一的精神核心，社会文化里面又怎么会产生对政治权力的普遍精神背书（即法统）呢？1989年以后出现的各种信仰热潮或者关于文化核心精神的种种议论，都是以过去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崩溃和此后的整体文化精神的空白为背景的。知识分子由于思想的敏感而率先开始了这一寻求。知识分子中的基督教热以及其后对城市家庭教会的影响正是上述寻求中一支，且是对整体社会文化产生最深刻影响的一支。

中国知识分子的基督教热分成了本土与海外两支，并且在同一方向的发展上形成了一个间隔不大的时间差。无论在海外还是本土，那时中国知识分子基督教运动的主流是文化基督徒。所谓“文化基督徒”的主要特征就是在理念上认同基督教信仰，其对基督教信仰的追求不会超过社会文化的高度；换言之，其对基督教信仰尚无实质性的全面生命委身，具体表现为无法实际地投身于教会生活，由此，信仰还不能成为其生命的真正终极，而仅仅是达成社会文化目标的手段。中国知识分子基督教运动初期的文化基督徒趋向，不仅与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特性有关，也反映了“八九”以后的社会文化危机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走向基督的历史动因。

远志明的《神州》与冯秉承的《游子吟》是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基督教热于初期的代表作，其中的社会文化气息与纯理念形式表明了该热潮的前教会阶段（这就是为什么这类作品只对慕道友奏效）。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基督教运动的幸运就在于其在海外，海外的自由环境使其一开始便置身于教会之中。在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基督徒阶段是在教会里面经历的（他们身在教会，生命的整体

却没有进入教会），这一外在优势使得他们迅速地跨过该阶段，成为实际委身教会的真正信仰意义上的基督徒。90年代，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当时在北美被称之为“中国学人”）的基督教热之中心是一些以教会为基础的福音机构，诸如“海外校园”，“生命季刊”，“使者协会”，“大使命中心”。这些机构以教会为基础，从而成为了海外中国知识分子进入教会的信道。但是，这些机构毕竟不是教会，其中心地位也就仅仅是一种过渡现象。例如，“海外校园”对慕道友与初信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而，只有在运动的主体是慕道友与初信者的阶段，它能够成为运动的中心；又如“生命季刊”，其“政治运动式（大规模场景+激烈口号）”的号召力正吻合于大批初信者急迫要求进深却未识教会生活之日常性质的激进情绪。稍后出现的“大陆基督徒使团”是试图响应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深入教会所产生之实际需要的一个尝试，其在整个运动中的作用还有待观察。90年代以后，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基督教热似乎过了最热点，其前沿移向欧洲与澳洲，其关注点渐渐转到教会的日常生活。“平静”有时正意味着“成熟”，而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基督教运动初初的成熟正好承接中国教会发展的使命。

起始时，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基督教运动面对了与海外不同的社会环境。在一个宗教信仰与结社尚不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最初在本土追求基督教信仰的知识分子首先遇到的不是教会，而是神学理念。理念毕竟不能直接撼动社会现实，所以，也就易于从现实中的统治力量那里获得较大的自由空间。刘小枫现象于是应运出现，当时在知识分子中了解基督教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致刘小枫等人所翻译与撰写的那些介绍基督教的书籍风

靡一时。从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运动，由完全的空白处开始进行对基督教的最初级了解。整个运动满足于从理性上客观地了解基督教，所以，那些毫无独创性地从西方神学里面照搬来的纯粹理念变成了那时运动的最高现象。严格地说起来，那时的基督教热还不是一种信仰现象，而仅仅局限于文化的层面。即使在那个阶段，仍然是海归的文化基督徒领导了整个运动；那一阶段的运动以海归基督徒为标志，也由此被他们的肤浅而规定了自身的“低度”。

从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本土知识分子基督教运动经历了“查经班”与“校园团契”的阶段。本阶段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主要路径有四：（1）通过阅读书籍和文章了解基督教的神学系统；（2）通过录音带、光盘、电台听到了海外传道人的讲道；（3）在国际学生组织的团契里面，或者通过与外教、外国来华商人或专业人士、海外归来人员的接触，而了解了基督教；（4）接触到当时在城市中数量极少的传统家庭教会。在前两项的理性传递路径里面，除了刘小枫时代的翻译与介绍书籍仍然扮演了一个媒介的角色，此阶段前期传播手段的代表是唐崇荣的录音与书籍，后期则出现了一批人（从本土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诸如远志明、冯秉承、张伯笠、刘同苏、洪予健、范学德等）的光盘、文章与书籍。后两条实际生活路径则规定了其实际信仰生活的高度。且不提传统家庭教会在城市中少得可怜的数量，那时的传统家庭教会由于自身的文化与传统的限制，也无法提供吸引知识分子的形式。国际学生组织具有适于知识分子的活泼形式，但由于本身的神学理念，没有将知识分子群体带向真正完整的教会生活（为此，北京家庭教会与某个

大型国际学生福音组织曾经发生过长期的争论）。个别基督徒脱离教会境遇的个人性传播，本身已经失去了直接将初信者立即带入教会的优势。上述的两条理念传播途径也加强了实际传播途径的局限。那些流行于知识分子中间的书籍、文章或光盘，主要是布道性的，也就是说其初步介绍基督教信仰的成分要远远超过强调在教会中深入信仰生活的部分。

这个阶段的知识分子基督徒或是理念认同信仰却没有实际委身的“理性基督徒”，或者是间或到教会露一下面的“个人基督徒”。由于“校园查经班”和“校园团契”具有偏重理性的趋向，这一只具有部分教会生活幅度的信仰组织，却成了这一阶段知识分子基督徒的最高信仰生活形式。对于这一阶段的知识分子基督徒，教会生活依然只是理念意义的和片面性质的。

自21世纪初以来，本土知识分子基督教运动才真正进入了教会阶段。信仰不仅走出了校园，而且由“查经班”或“团契”这一类部分性质的教会生活上升为全面的教会生活。有全职驻堂牧师的堂会制是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城市家庭教会首先建立的（温州家庭教会仍然处在“点片制”与“派单制”的时候，北京家庭教会已经普遍实行了“堂会制”与“驻堂牧师制”）。有严谨结构的地方教会以及由此而来的全面牧养与整体委身，不仅深化了知识分子基督徒的信仰生命，也引领整个中国家庭教会上升到新的高度。“改革宗运动”以及相关的“归正神学”热潮是这一发展阶段的一个现象。全面的教会生活需要严谨的教会结构以及明晰表述自我信仰的教义。90年代在海外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从事科技职业的专业人士，由于缺乏整体文化熏陶，使得他们很难使用技术意义以上的

手段传递神学观念。陈佐人牧师是该运动中少见的能够整体性把握活的神学体系的领袖，可惜他身处运动的中心地位却未用心纠正目前机械主义的取向。

当然上述的过程仅仅是本土知识分子基督教运动的主流，这一主流的现实形态就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目前运动的发展还有不同的支流，首先仍然有大群的知识分子游离于教会的边缘，构成了城市家庭教会继续发展的外缘。其次，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进入官方教会，这批人也许在将来会发挥某种内部颠覆的作用。顺便提一下，目前知识分子基督徒的精英部分主要坐落在城市家庭教会之中。当下中国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具有前所未有的民间意识。从信仰上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难分辨真正的信仰出自什么样的教会；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讲，公民社会的出现结束了专制社会里面形成的正统观念，民间已经成为了未来社会的正溯；无论是出于信仰，还是发自文化意识，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基督徒进入非官方的教会，未来定向的理想主义是其重要的动因。最后，也有在传统家庭教会扎根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他们可能在未来的整个中国教会中承担更为重要的使命。能够在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教会传统里面坚持日常的教会生活，必定会造就出成熟而坚定的教会领袖与骨干。对传统家庭教会的继承是现今城市家庭教会的重要挑战，那些愿意生活在传统家庭教会的知识分子将成为城市家庭教会响应这一挑战的重要辅助。

中国知识分子基督教运动在海外与本土有一个时间差，在海外知识分子基督徒几乎是直接便进入了教会，在本土却经过文化思考而迟了半步。这相差的半步成为了中国教会发展的祝福。海外知识分子基督教运动成

为了一个先行的实验。由于在深厚神学传统和成熟教会传统中先行经历的生命体验，海外的知识分子基督徒成为了本土相同文化成分基督徒的示范与借鉴。生命体验的现实力量是任何理论都无法比拟的；要想知道甜味，无论什么样的成分分析或语言描述都不如将一粒糖放在嘴里。示范的力量就在于此，示范是先行的生命体验，其效力是生命对生命的具象（即现实）与整体（即不可解构）的冲击。改变主体生命的最佳途径（如果不是唯一途径的话）就是示范。对于本土的社会文化，海外知识分子基督徒成为了一个群体的生命示范；一批当时被视为知识精英的留学人员信奉了基督，这种冲击远超过了最精妙的理论介绍。示范者与被示范者越是相同，则示范的冲击效应就越大。受到海外知识分子基督徒影响最大的，就是本土的知识分子。如上所述，在迄今的本土知识分子基督教运动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可以看到海外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影响。不过，当城市家庭教会逐渐走向成熟，本土知识分子基督教运动也将走出海外的影罩。目前本土知识分子基督徒也具有优良的知识背景，城市家庭教会传道人身中的金天明（清华大学）、金明日（北京大学）、方兵（北京大学）、王怡（四川大学）、平信徒领袖中间的孙毅（北京大学）、余杰（北京大学）、游冠辉（北京大学）、彭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查常平（中国人民大学）、苏文星（中国民族大学）、范亚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齐宏伟（南京大学）、张守东（中国政法大学）等，可以代表性地体现出目前城市家庭教会的知识程度。

笔者于2007年在北京对65个家庭教会聚会点（从属于46间教会）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有76%的教会，其50%以上的会众具有

大学专科以上知识程度。由于身处中华文化的原创中心，本土知识分子基督徒具有了海外知识分子基督徒所缺乏的文化胸襟。作为海外华人教会的重镇，美国华人教会从来没有真正超出亚文化圈的高度。在本土，知识分子基督徒视野的落点却是整个中华文化。海外教会的信仰讨论带有较多的技术性，而本土城市家庭教会的信仰讨论却更具有文化性；前者更像西方教会的一个分支，而后者因着与中华文化原创中心的连带，正在开始一种独立的教会传统。城市家庭教会社会参与方面的主动精神，表现了对整体社会文化的责任感，不仅是严格信守“圣俗二分”的传统家庭教会所不曾具有的，也少见于身处自由环境的海外华人教会。

五、结语

既然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处于中国福音运动的当下定点，她就必然是整个中国教会长期发展的结果。(1) 新教入华以来面向草根人群的转向，使得基督教信仰真正成为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城市家庭教会才可能具有对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冲击力。城市家庭教会只有成为大众福音运动的一部分，才可能成为该运动的主导要素。(2) 传统家庭教会在逼迫中坚守“十字架”道路的生命实践以及于隔绝境遇里面独立扎根中华文化的探索，使得中国教会完成了表面相反但实际上相成的反合性生命更新：一方面是保持信仰本质的本土化，另一方面则是具有主流文化形式却不会丧失自我的坚实生命根基。若没有这样的生命传统作为保障，城市家庭教会就会或者缺乏必要的本土形式而无法深入中华文化的主流，或者缺乏坚固

的自我生命而迷失于主流社会文化之中。(3) 海外华人教会为中国教会保留了通向普世大公教会生命通道。因为与海外华人教会的紧密联系，城市家庭教会率先获得了在主流社会文化里面建立教会的借鉴。(4) 留学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先于本土半步成批信奉基督耶稣，为城市家庭教会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生命示范。只有全面继承整个教会的传统，城市家庭教会才能有可以把握中国教会的整体力量，从而，才可能将中国福音运动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城市家庭教会的出现及其在整个中国教会里面的主导地位，完全是上帝通过整个中国教会的发展而赐予的恩典。■



1957 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

文 / 王怡

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罗马书》3:10



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

——林昭狱中血书

基督徒右派

基督徒右派李景沆，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天水市一中的数学老师。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在 2002 年春天，作家刑同义用掉 12 盘采访磁带，写出了《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基督徒右派俞以勒，我们知道她，因为她是林昭的狱友。1961 年北大学生林昭入狱后，一度与俞以勒拘禁一室。她们不但成为难友，也成为在基督里的姊妹。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对专政的不妥协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心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基督徒右派杨毓东，是 1957 年 12 月 26 日在“北京市基督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上被打成的 45 名基督徒右派之一，第二年被劳动

教养。1986 年，杨毓东在政府答应三个条件的前提下，任“三自爱国会”北京缸瓦市教堂牧师。这三个条件是，第一，教会不学习政治；第二，讲道唯独根据圣经；第三，宗教局当众承认当初对其右派定性是错误的。“六四”期间，杨牧师带领的青年团契，组成了天安门广场上唯一一支举着十字架的救助队。1994 年，杨牧师与三自会决裂，从此服事于家庭教会。

基督徒右派吴维尊，在个人思想改造报告中这样写道，“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他在 1957 年被下放改造，一直到文革前夕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前他为自己定下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从此直到 2002 年 12 月离世，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践行了这个原则。

尽管吴维尊在狱中经受了种种肉体折磨，但他仍然成为当时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直到70年代初，筋疲力尽的狱方给他提出两个简单要求：停止饭前祷告，诵读毛主席语录，便可视为服从改造，予以释放。但吴维尊一如既往地以死相抗。在他瘦弱的身体内，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令人难以想象的惊人力量。

1957年8月7日，正式成立三年的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会”决议号召全国基督徒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宗教不过是愚昧和迷信的遗留，即使牧师和其他教职人员，也很难被当局和一般公众视为“知识分子”，更何况那些普通信徒。因此教会内的反右斗争，比主流社会和主流知识界更加惨烈。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或因他们的双重身份而能被主流社会了解。但大批被迫害的基督徒，却难以被计入“右派知识分子”群体。甚至迄今为止，基督徒右派分子们的遭遇，也难以得到主流知识界的关注。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狱的教会领袖倪柝声在狱中离世。他离世后两周，《香港时报》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不完全的统计：

1950—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在1957—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三自运动·信仰的沦陷

早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共借助“三自爱国筹备会”及吴耀宗、丁光训等人，在反帝、爱国、拥护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下，企图一统分散的基

督教会。1949年9月，中共高层钦点了当时在教会内并无重要地位的吴耀宗、刘良模等5人，作为基督教代表，参加产生新政府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政府大力扶持他们的地位，让吴耀宗在会后率宗教界代表团去全国巡访，在各地均受到党政首脑迎接。随后，周恩来在1950年5月短短一个月内，接连三次接见以吴耀宗为首的19位基督教领袖，开始向教会摊牌。

当时，吴耀宗等人在信仰上受到自由派（现代派）神学影响。连他在内，三自阵营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均曾在自由派神学的大本营——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他们确实有一种真诚的爱国情感和反帝心理，这和当时几乎所有自由知识分子是一样的，对新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充满了盼望。如在1948年，深受“社会福音”影响的新派神学家赵紫宸，以一种悲凉的语气写道，“大批不顾个人安危的年轻人站在了共产党人一边，他们根本不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教会。”

这些越来越倾向于左翼政治思想的基督教新派人物，开始围绕在吴耀宗的周围。1948年，吴耀宗曾写下《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宣称基督教在华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他说，“如果我们的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一样，我们实际上就变成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意识的工具。在求解放的广大民众眼里，我们不过是鸦片”。

这些新派“基督徒”看到了社会参与的意义，却因自由派神学的捆绑，无法向着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救恩论归正，去恰当地、全备地认识个人救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于是对他们来说，“基督的救赎与社会变革是一回事”。他们所谓的基督信仰，已和世俗的社会主义理想相去不远。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于2006年11月其父的遗体迁徙仪式上在宗教局官员面前为父亲辩护，仍然苦口婆心地提及

吴耀宗至死坚持认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并无矛盾”。中国教会史专家、法国的沙百里神父在其著作中评论说，这正是中国的“三自运动”从新教开端的原因。共产党显然注意到了吴耀宗等人的思想，“他们对此相当重视并充分加以利用”。

韩战爆发后，西方传教士更迅速地被逐出中国，少数人被政府逮捕。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这一切都对这些自由派的教会领袖触动很大。吴耀宗写下《共产党教育了我》一文，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写出《我政治思想转变的过程》，在随后的三自革新运动中，成为了对广大基督徒进行思想改造的两篇范文。文中最后的结论是，原来共产党的理论才是正确的，“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救全世界”。他们承认，自己已从一个改良主义者变成了革命者。

另外一些教会领袖，则在政府发出三次威胁之后，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对自己所信之道、对上帝在历史中的主权也丧失了盼望。转而认为，若不妥协的话，教会就会彻底被摧毁。于是他们因着小信，怀着一种似乎为主忍辱负重的想法，接受了政治上的依附。如上海灵修神学院院长、改革宗神学家贾玉铭，曾公开宣称“参加三自会是违背神旨意的”。但到了1954年春天，几个宗教干部去他办公室密谈数小时之后，他公开加入了“三自会”，并当选为全国三自副主席。聚会处的领袖倪柝声，早期也公开反对三自，不久也改变了态度，甚至为三自辩护，说“教会是一个杯子，政府是一个盘子”。杯子当然要放在盘子上，是理所应当的。但因为他的影响太大，政府已决定拿他杀一儆百。1952年，倪柝声还是因反革命罪在沈阳被捕。

其他更多的人，则有出于恐惧而随波逐流的。也有极个别倡导者，本来是共产党很早之前就派遣、渗透在教会中的秘密党员。这和

他们在20年代“非基运动”中暗中策划和鼓动的手法一样。如在上海组建“三自会”的主要人物、秘密党员李储文“牧师”。1961年升任全国“三自爱国会”秘书长，后在文革中经受不住红卫兵殴打，亮出藏于家中的党员证求饶，要红卫兵给周总理打电话，证明自己其实是党的人。他的身份暴露后，离开基督教界，改任上海外事办主任。改革开放后，调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

随后，吴耀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一个表明基督教政治立场的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以团结全国基督徒爱国、爱党，反帝、反美为宗旨。根据政府的指示，邀请了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起。这个宣言的最后定稿是经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并由政务院批准，连同第一批共1500余人的签名名单，全文刊登于1950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9月26日，中共中央直接作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随后在政府的扶持下，三自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签名卖主的运动。

当时全国约有10000间教会，8000传道人，84万基督徒。人人都必须过关，签名才能自保。签，就是“爱国”，不签，就成了“反革命”。到了1951年4月，签名者达到18万人，年底达到36万。1954年“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时，签下自己姓名的基督徒有41.6万余人，约占全国信徒的一半。

然而，当时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尚沉浸在对新民主主义的浪漫设想，及20年代“非基运动”以来对基督教的偏见中。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言论触及共产主义与宗教自由的议题，也几乎无人关注基督徒这一边缘群体的政治命运。但基督徒在1950至1956年的遭遇，人人过关、思想改造、控诉大会，这一切都在1957年重演，成为全体知识分子的恶梦。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一般的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基督教界关于《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

思想和言论自由也必将失去。由周恩来出面导演的对基督徒的信仰禁锢与迫害,到1957年就变成了由毛泽东亲自引蛇出洞的、全面的思想禁锢与政治迫害。这不禁令人回想起纳粹时代尼莫拉牧师那一段锥心刺骨的忏悔: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殉道与护教：中国自由史的篇章

最讽刺的是,一个号称“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却建立了一个两千年教会史上罕见的、彻底依附于政权、放弃圣经真理而接受现实政治目标控制的宗教组织。用吴维尊的话说,“这三个‘自’,实质上就是中国党和政府

对神在中国教会的绝对领导权,或绝对主权。”对基督徒来说,这已不是基督的教会,也不再是基督教信仰。一些公开反对三自、捍卫基督教信仰和良心自由的,恰恰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独立教会和本色化教会。而三自运动的主要目的,则是要替当局消灭他们。

在极权主义的洪水猛兽前,人的尊严和良心的自由,如何可能站立得住。以此观察1949年后的中国,41万基督徒集体签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件令人震惊的灵魂事件和中国大地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属灵争战。基督教在中国150年的宣教和扎根,当无神论的极权者到来时,却如草木禾秸的工程,一瞬间就软弱跌倒了。

共产党的价值,就是让所有知识分子都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会被折断。连中国的基督徒们,他们的上帝也任凭了他们的软弱,他们曾宣称的信仰也轻易跌倒了。这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无数次全国性背道,无数次偏离他们的耶和華神。但亦如圣经所言,即使在这样的全国性背道中,上帝也总会“为自己留下七千人”。在任何一个时代,圣灵都预备了他的见证人,好使耶和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落空。总有“七千人”不会向着偶像屈服,不管这偶像是木头泥巴,还是政治国家。

中国教会史上、也是中国自由史上一段最令人敬畏的篇章,就是在“三自爱国运动”中,上帝在黄皮肤的子民中也为他“留下了七千人”。大约还有10万左右的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从“三自运动”开始,就以不合作、不服从的态度,走向了家庭聚会,拒绝政府的思想改造,从而开创了1949年后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以非暴力方式、为着信仰和良心的缘故抵抗专制的一个活生生的传统。这不是靠着人的道德、血气可

以坚持的，因为许多骨头比他们更硬的人都屈服了。这是唯独靠着上帝的恩典，基督对他的教会的超自然的保守才可能成就的神迹。

他们中的多数人只是消极地不服从，在地下坚持秘密聚会。但也有个别教会领袖，在政治高压下公开表态，公开聚会，公开为信仰辩护。这种在宗教迫害中公开为福音辩护的人，在初代教会的历史上，曾被称为“护教士”。在50年代，中国的教会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护教士。

堪称中国基督教之“护教士”的，是北京独立教会的领袖王明道先生。他一开始就公开反对三自，成为“三自会”的眼中钉。1954年北京教会召开了对王明道的批判会。他在年底发表了著名的《真理呢，毒素呢》一文，针对吴耀宗的立场，宣称“在圣经中，没有‘帝国主义的毒素’，只有上帝纯全的真理”。

他告诫吴耀宗们说，

“你们不如爽爽快说这种教训是‘耶稣和使徒播散的毒素’，还比较诚实一些。我只问你们，我上面所引的这些经文是不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如果你们不敢说‘是’，就请你们快些收起这一套恐吓人的面具来。如果你们说‘是’，就请你赶快脱去你们所披的羊皮，宣布与教会脱离关系，宣布你们不是基督徒，更不是教会的领袖。你们就爽快再组织一个‘反基督教大同盟’，再来一次‘反基督教运动’，至少你们所作的还比现在诚实一些。”

1955年，王明道再次发表长文《我们是为了信仰》，公开批评吴耀宗等三自领袖是“不信派”；反对与“不信派”结盟，反对与他们同工；宣告道不同不相为谋，“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王明道的立场有两个方面，一是

政教关系上反对教会依附于政府，反对政府对教会的政治控制；二是反对三自领袖们的自由派神学，坚持圣经的权威性和基督信仰的基本要义。而他的后一个立场，正是前者的一个根基。

这两篇文章，成为了中国家庭教会在20世纪持守信仰自由的经典文本，同样也应视为中国人在20世纪持守良心自由的经典文本。尤其是《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在教会内产生极大冲击。一些已加入三自的基督徒，也受这篇文章所感，退了出来。事实上，在1949年后的政治迫害中，那些坚持信仰自由、走向家庭聚会的基督徒，大多是被称为“基要派”的基督徒。不持守圣经权威性的基督徒，在平日也可以做基督徒，但当政治的权威忽然变得严厉和残暴时，他们心中就无法信靠那比国家更高的权威和信念了。本着圣经相信基督的人，遇上谁，他相信的都是基督。相信自己的人，遇上共产党，就连自己也不信了。

对基督的信仰，成为这批基督徒在极权主义面前的勇气源头，也在他们软弱跌倒之后，成为他们悔改归正和重新站立的依靠。王明道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后，当局决定逮捕他。1955年8月7日，他作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晚王明道夫妇二人及18名信徒一起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称从此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都是非法的，从此不加入三自即已构成被捕的理由。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召开大会，声讨王明道，支持和同情他的信徒在各地纷纷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其中包括广州大馬店教会的传道人林献羔。

许多知识分子对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难以理解，或心存怀疑，担心基督信仰与共产主义有某种相似的排他性。然而1949年以后，中国的基督徒和其他人群一样，都曾活在专制主义的苦难中。但教会在相似的苦

难和同样的普遍性的跌倒中，仍然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殉道与护教的传统，活出了一个尽管微弱但是坚决的良心自由的传统。到了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才发现这个以社会精英自居的群体，在他们中间竟然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人，找不到一个活着或死去的楷模，找不到一个可称颂的士大夫的高贵脊梁，遑论保守一个鲜活的传统。而基督徒们却在此时收获了他们的盼望，在此时看见了他们中间的圣徒。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和被称为“中国的以巴弗”的吴维尊等，一大批为义受苦的本土传道人成为中国家庭教会持守信仰和良心自由的云彩般的见证人，也成为中国基督徒在五星旗下与中国人民同受捆绑的见证人。

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补发工资。一些老右派甚至用了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但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却再次出人意外地拒绝出狱。政府用了各种欺骗手段，将他们连哄带骗，连拖带拉地扔出了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1979年邓小平访美，美国总统卡特点名要求释放王明道。邓小平答应年底之前解决此事。狱方告诉王明道，只要作一个服从改造的表态，就放他出去。但王明道说，我是无期徒刑，我必须顺服政府的判决，除非政府认错，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这个监狱。后来邓小平指示，不管他认不认罪，都要在年底放出去。于是在1980年春节前夕，狱方百般无奈，只好将王明道强行架出监狱，在他身后关上大门。

从50年代开始，吴维尊写出了一封封“狱中书信”，在家庭教会内流传。1987年5月28日，他也被监狱哄骗出狱，当日写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1981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这篇文字堪称1949年后用汉字写

成的、最激动人心的文本，超过了那个时代数百万知识分子所写文字的总和：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他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回头一看，像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基督

徒，因为是真正地爱主，所以也才真正地爱国。他们委身于自己的族群，委身于上帝让他们活在其间的那个时代。他们知道，要在黑暗的世代“爱自己的邻人”，为福音作美好的见证，就只有一条路——在苦难来临时并不躲避，像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样存心顺服、默然不语。今天，家庭教会要争取信仰自由，得到主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第一要做的仍然是悔改，如果我们是真教会，我们就有责任为主的教会在1950年后整体性地背主并依附于共产党专制政权，而在上帝和国人的面前认自己不信的罪。

但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仍有一种狭隘的眼光，仅在基督教内部强调其与三自的对立。这是不错的，是必须坚持的。但如果一个基督徒相信这是“天父的世界”，相信我们受托传扬福音，治理这地，那么教会就不单是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渎职犯。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到教会的背主与国家命运之关系上，把我们在1950年后所受到的逼迫，与整个民族50年来在镇反、反右、文革、民主墙、“六四”屠杀中的所有苦难连在一起来看。在1950年，共产党选择了首先拿基督教开刀，这使教会何等荣幸地站在了一个为同胞受苦挡灾的位置上。但教会却从这王后的位分上跌倒了，在共产党对文化群体的第一波迫害面前，丧失了“光和盐”的管家职分。如果“三自运动”中没有数十万基督徒轻易地放弃信仰、集体跌倒，如果1950年的中国教会中，有一百个王明道、一千个吴维尊，后来的反右运动和文革是否还会那么轻易地发生？正是因为上帝的儿女在道德和灵性上失败，一场又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才临到了整个国家。今天，一个基督徒若看见这一点，就当为此忏悔，替自己的弟兄认罪。因凡事皆在上帝主权的恩典之下，但人却要为自己的本分受到审判。

我们持守家庭教会的立场，因为我们的先

辈圣徒活出了一个殉道和护教的传统。但是，“三自爱国运动”始终是从新教而起的。这依然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在国人面前的耻辱。以这一眼光来看家庭教会与三自的关系，家庭教会的成员既要坚持立场，又不能自以为义。反倒应该来到上帝面前，为中国教会认罪，并为那些至今被“三自会”辖制的、无知的弟兄姊妹祷告。恳求上帝按他的意思，叫他的儿女早日脱离被掳巴比伦的世代。

教内反右：一个义人也没有

“三自运动”的实质，是一场镇压基督教和信仰自由的政治运动。有人称之为1949年后的“第一场文革”。共产党比1957年的知识分子们更清楚一件事，摧毁言论自由的前提，先要摧毁信仰自由。因此共产党在1950年后的国有化，显然是按着这个顺序：先“没收”教会的信仰；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最后“没收”知识分子的言论。一无信仰、二无财产的知识分子被摆在最后，因为在前两轮的“没收”中需要他们在一旁鼓掌，并摇笔为旗，出口成章。几十年过去了，后两轮的“没收”至少在书面上已被彻底否定，但令人痛心的是，“第一场文革”的结果仍然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一般公众，迄今为止依然活在这一场针对宗教信仰的“文革”里。

尽管在吴耀宗等“不信派”基督徒眼里，基督信仰几乎就等于地上的共产主义，但1949年，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大偶像面前，中国社会中与共产党的一切邪恶特性相距最远的、最具有异质化的文化力量，就是基要派的基督教会。1948年，连储安平这样的英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禁眺望一个由共产党带来的新中国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创世记”。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面

对这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发表了《致全国信徒书》，其中清醒地宣告，“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

到了1954年，知识分子们仍对几年后的狂风骤雨毫无察觉，仍对一个新民主主义乌托邦的雏形满怀激情，仍对那些看似愚昧的宗教信仰者的遭遇漠不关心。当年，中共制造数十起间谍案，逮捕了几乎所有反“三自”的天主教神父。上海的主教龚品梅神父，在这种处境下不但继续公开反对三自运动，进而坚决表达出他对整个“新中国”的反对。他在《反对总路线》的发言中宣告：“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事实上，在1954年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头脑比他更清醒。龚品梅类似天主教中的王明道，几个月后，他以反革命罪被捕，随即在全国天主教会内展开了一场揭发和控诉龚品梅的运动。

1954年8月，“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但在北京，以王明道带领的教会为首的11个独立派教会仍屹立不倒，拒不入会。一个月后，北京市政府直接出面，邀请这11



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基督教各教派、各团体代表共232人。会议一致通过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选举吴耀宗为主席。

个教会的100余人到政府议事厅开会。了解到他们强硬的反“三自”立场后，当局主动提出一个妥协之道，说不和他们在一起就算了，你们11个教派单独组织政治学习，由政府直接派人管理。这11个教会的传道人讨论后回复说，如果政府要求必须参加，我们个人就以北京市民的身份参加学习，但绝不能以教会或信徒的名义参加。到1955年5月，中共对这些死硬派的转变彻底失去了幻想，开始由拉拢转为强制，对拒不参加三自的基督徒展开了一场全国性大逮捕。

所以，在1957年的反右风暴来到之前，基督教内排除异己的政治逼迫其实已差不多完成。一大批持守基督信仰、抗拒“三自”运动的基要派信徒，都以反革命、特务、坏分子等罪名被逮捕、判刑、流放或处决。被关押4年的倪柝声，在反右运动来到之前被判15年徒刑。他和王明道的入狱，标志着“第一场文革”的大致结束。因此，基督教的反右运动，主要不是针对三自以外的基督徒。反倒是针对刚成立不久的“三自爱国会”。倪柝声的被捕，使已加入“三自”的聚会处信徒纷纷退出，王明道的被捕也激励了一大批爱主的基督徒，继续走十字架的道路。因此也有很多反“三自”的基督徒，在反右时期继续被捕或判刑，如广州的林献羔，在1958年11月24日被判20年徒刑。布道家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也于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18年。但这些依然是“第一场文革”的延续，基本上与反右运动无关。

当然也有一些尚未以“反革命”之名清除干净的独立教派领袖，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的袁相忱先生。1957年的圣诞节刚过，北京宗教事务处组织教会领袖学习班，袁相忱参加了会议，接连几天一言不发。最后处长李某点名要他发言。袁先生沉默良久，站起来说了两点：

第一点，“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对各宗教有不平等的待遇。譬如对回教的政策很宽松，对基督教却很紧，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

第二点，“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人可以说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的津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又摇身变成为“三自”的人，其实他们是最不‘三自’的。他们只是基督徒队伍中混饭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据传记作家称，他发言结束后，会场鸦雀无声，宗教事务处长也不敢贸然总结。他回家对妻子梁惠珍说：“从今天起，我是右派了。”

袁相忱作了半年多右派后，1958年4月20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半年后被判无期徒刑。

反右之前，“三自会”中或许没有人会料到，当中共将最后一批死硬分子送入监狱后，斗争的矛头就将指向三自本身。大致来说，1957年前，共产党利用“三自运动”镇压了持基要信仰的基督徒。1957年后，则利用“反右运动”摧毁了三自教会。那一场普遍性的背主带来的咒诅是如此真实。在1952年背主卖友、把自己的弟兄控诉到监狱去的基督徒们，到了1957年就纷纷被打成右派。在1957年助纣为虐、逃过劫难的三自领袖们，到了文革又纷纷被批倒。无论三自会如何紧跟形势，还是逃不脱鸟尽弓藏的命运。

1961年，主日学和团契被禁止。三自会宣布“儿童主日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

1964年，全国展开社教运动和四清运动，重点之一是无神论教育和反宗教斗争。《天风》开始受到批判，各地开展“退教运动”，一批牧师宣布放弃信仰，与基督教决裂。

1966年，三自会的始作俑者吴耀宗被批斗，接受劳改，三自会也被解散。

之后，中国教会史翻到最悲惨的一页，在

紧接着更残酷的逼迫中，为信仰殉道的基督徒，和背主卖友的基督徒，他们的经历都同样触目惊心。不久，中国除了地下的家庭教会，地上已没有了基督教。

令人讽刺的是，三自被造反派批斗为“刘少奇和吴耀宗的一个阴谋”。一份大批判文件如此评价这位否定了基督的神性和圣经权威性的“三自爱国会主席”：“基督教头子吴耀宗思想反动，一贯来企图在全图范围内恢复宗教失去的阵地。到处叫嚣，到处放毒，胡说宗教仍有其真理，上帝与马列主义并没有矛盾。”

如前所述，三自领导层中有一批人，因神学立场偏离真道，在大时代的冲击下失去了清晰的救恩论下的历史观。他们开始的软弱和依附中，也有一部分“真诚”的对信仰的忧虑和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漫憧憬。另外也有一批自认为教会忍辱负重的领袖，以为作出如此惨痛的妥协后，共产党至少会给三自内部以信仰的自由。这两种人在1954年以后，都难免对政府步步进逼的宗教政策和社会局势深感失望。或者这种失望也会带来他们对教会的负罪感。因此在1957年的鸣放期间，三自的各级领袖（同时也是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也忽然冒出了大量批评共产党宗教政策的言论。列举如下：

郑州“三自会”副主席于沛苍。他说，“宗教爱国组织是我们自己的组织，现在却被领导代替，形同虚设。凡事都要请示宗教事务处，信仰自由变成了领导的自由，以不信者的自由来衡量信者的自由。无神的人不应该管有神的人，信仰自由只是说说，要信教可真是没自由。”

三自副主席陈崇桂，在全国政协作《保护宗教自由，尊重宗教信仰》的发言。他引用一位高级干部的话，这位干部说，“你们信上帝的人，要把你们的上帝丢在粪坑里。”陈崇

桂激烈地批评说，这不是批判宗教，而是毁谤、亵渎宗教。

上海三自以刘良模为首的7位基督徒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作联合发言。批评政府对宗教信仰有成见，说一些部门的表格中把基督教并入“会道门和迷信团体”一栏。他们呼吁让基督徒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青岛基督徒人大代表张天人、杨光恩，在人大会议上发言，要求政府的宗教政策应当向基督徒透明和大力宣传，对政府占用教会用地、不尊重教会表示不满。

广州市基督徒人大代表王以敦，在人大会上发言，批评政府歧视基督徒团体，把“基督教青年团契”当作“三青团”审查。批评有些干部禁止信徒奉献，没收信徒的圣经、赞美诗，不准儿童进礼拜堂等。他也和刘良模等人一样，对政府利用三自把基督教“圈养”起来，隔离在主流社会以外很不满。因此大力呼吁要让基督徒发挥社会作用。

基督徒姜蒙光，在《天风》上批评政府出版大量从苏联翻译的批判宗教的书籍和小册子，其中对宗教采取粗暴轻蔑的态度。

哈尔滨的基督徒人大代表孙耀宗，在人大会上发言，也批评信徒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基督徒虽然努力工作，但评先进和提干时就轮不到他们。在学校里也受到讥笑，被称为落后分子。致使很多基督徒认为只有入党入团才算是进步。

上述言论，和袁相忱等右派基督徒相比，除了于沛苍的发言隐含了对共产党处理政教关系和三自运动的否定，算是一个真右派；其余的大多数意见，对教会信仰立场与中共的本质及社会制度性危机的关系，并没有反思的能力和批判的勇气，不过反映了三自对政府的一种怨妇式的情结罢了。这些人抱怨的事实，其实大多数在今天的三自系统也依然存在。事实上，对那些把信心扎根在圣经和教

会所承传的福音真道上的基督徒来说，上述问题从来就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那些在人格和良心上堪为1957年中国右派知识分子之楷模的基督徒们，那些为着更重要的真道竭力辩解的传道人，此时差不多不是死了，就是在监狱里。可怜几十年来，三自始为淫妇，终为怨妇；只是抱怨，却不悔改。

与此同时，三自会在反右斗争中再次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教会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强调“务必在政府直接领导之下进行”。1957年10月底，三自会扩大会议决定，“对全国基督教工作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1958年1月起，学习班在各省分批举办。除“向党交心”和自我检讨外，进一步鼓励对“反社会主义”言行的相互揭发。

学习班的另一目标，是改造基督教中“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教制。各地的改制大致有以下方面：

撤销各教会的委员会、执事会等机构，统一由三自会领导；

对教会解经的书刊进行审阅，“有毒草”的一律剔除；

全国采用统一的诗歌，并一律剔除反革命传道人（如倪柝声）的作品；

停止宣讲末世论等“消极悲观”的道理；
不要强调信与不信的分别（如婚姻问题）；
禁止赶鬼医病和为病人祷告；

各堂奉献上交三自会，统筹统支；

在教堂之外，不举行任何宗教活动；

在收获农忙等季节停止礼拜，支持“社会主义建设”。

学习班结束后，一定比例的人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劳改。到了年底，吴耀宗在上海人大作“加强反帝爱国工作，清除残余反动分子”的汇报。他说，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明确了教牧人员属于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

必须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从此，大批传道人离开教会，被送往劳改营。教会缺乏牧者，三自会又替撒旦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会合并和联合崇拜运动，将全国两万间教会压缩到不足一百间。

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们，无论是三自的头面人物，还是独立教派的殉道士，他们都处在一个比他们个人的遭遇更为重要的悲剧当中。那就是基督教会在中国的荒凉和被拆毁。尽管基要派信徒们以他们的血，为信仰作了美好的见证，也终将上帝对这个族群的咒诅转为祝福。但另一方面，教会在共产党手下的真正悲剧，是在一个将罪人抬举得比巴别塔更高的时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其实是以不同的方式同时辖制了自由派和基要派。对自由派来说，就是离开十字架，彻底转向对国家和民族的膜拜。吴耀宗的接班人丁光训在1984年有一段著名的话，解释三自的信仰。他说，“我的信仰不是一个圆，只有一个圆点。我的信仰是一个椭圆，有两个圆点，就是基督和国家。”相



信这段话也是吴耀宗及多数三自领袖们真正的“信仰告白”。

王明道称其为“不信派”，一点没有冤枉他们。真信徒一定反对这种心怀二意，将福音与世界折衷妥协的“椭圆论”。但对吴耀宗们来说，王明道的敬虔主义和倪柝声的属灵主义的信仰似乎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国家、时代和民族的处境，对基要派也有一种反面的辖制，就是迫使他们成为圣俗二分的“分离主义者”，从撒旦的世界离开，把信仰与世界的界限划得干干净净，一心传福音，等候基督再来。所以在1950年，王明道的教会其实是最三自、最本色化的教会。无论西方教会是不是“帝国主义”，事实上早已把界限划清楚了。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早在1949年前中国教会就开始了一个与两千年普世教会的传承相割裂的所谓本色化运动和自立运动。几乎所有宗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这种倾向。

基要派的信仰最伟大的地方，是当时代越黑暗的时候，信仰越是站立得稳。但缺陷是当时代越不黑暗的时候，就越无法完整地去回应一个时代，不能根据圣经全备的福音，整全性地处理教会与社会、福音与文化、信仰与政治的关系。当共产党入城、进村后，一个基督徒到底要去理解他眼前的这个世界？不信派固然背弃了信仰，但基要派其实也无力回答这个问题。正是这一缺陷使大多数基督徒在“三自爱国运动”中，面对革命的金光大道和新思潮的诱惑，难免陷入普遍的信仰困惑之中。甚至连王明道的儿子也怀疑信仰，离开教会，成为令王先生晚年最心痛的一根刺。

三自的实质向内是拜金牛，向外是自闭。基要派向内持守了信仰，向外则仍然不同程度地以民族性割裂了大公性，自闭在普世教会和教会史的传承之外。可见在文化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确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显赫的世界观。面对这个世界观，无论是抗拒还是妥

协，教会的信仰都未曾提供一个完整的回应。

同时代的英美，正值“福音派”从传统基要派中脱离了出来。福音派一样持守基要信仰，反对自由派。但他们也不满基要派将这个世界拱手相让的逃跑主义。尤其是保守的福音派如长老会，持守归正的信仰传统，强调基督徒“在世而不属世”的社会参与，在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关系中，坚守了一个完整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不是一个心持二意的椭圆，而是一连串围绕一个圆点的同心圈。福音派基督徒以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去回应时代，促使教会发挥出整体性的见证。尤其是在经历了60年代的价值危机和多元主义之后，逐渐成为北美社会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重要的保守主义力量。

但在50年代的中国基督教中，还看不见这样的信仰传承。自由派和基要派同受时代的影响，都倾向于将信仰理解为一种个人主义的，与国度无关的一种“私有化”的信仰。但面对共产主义的凶恶时，家庭教会的基要派信徒仍旧活出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基督信仰。三自会背道卖主，基要派退到地下。苦难使中国成为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殉道者的血亦成为家庭教会复兴的种子。

到1958年底，中国基督徒的总人数已迅速下降，大部分信徒都不再去教堂，参加聚会的也多为年老信徒。中国教会史专家赵天恩博士评论说，到1954年，“中共透过三自会控制了全国绝大多数教会”。再到1958年，“中共透过三自会彻底摧毁了有组织的中国教会”。许多西方的教会史学者都在这里停下，写出相似的句子，“从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国基督徒的消息，基督的门徒们在那里苦苦等候教会复兴的一天。”

在基督徒看来，极权主义的实质就是对政治国家的偶像崇拜。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基督徒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曾以和平的信仰抗拒凯撒的暴力。在他们中间既有可耻的失败，

也有荣耀的得胜。他们中间的圣徒和殉道士们，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精英一样，曾以“反革命”或“右派”的名义构成了中国当代自由史的一部分。他们的苦难也成为中国人苦难的一部分。乃至他们对基督的信仰，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当代精神的一部分。

基督教在极权主义下的历史，使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从中看见两件事。第一是人的全然败坏，“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第二是真信徒的坚忍到底，从坚忍中不是看见几个超拔的圣人，而是看见上帝恩典的保守。无论有多少人跌倒，总有人靠这恩典，参与了基督对这个世界的得胜。或者说，我在1957年的片断中看见人的两种无限性。一是人的堕落的无限性。一只狗不会堕落得比猪还不如，但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仍然还有堕落的余地。二是人被拯救的无限性。就算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但如保罗所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了。”

谨以此文，为教会的悔改，福音的广传，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和马礼逊来华200周年。为殉难的信徒感谢神，为教会的罪哀哭，为神的拆毁与建造献上赞美。

2007年5月8日写于成都

（本文限于篇幅有部分删节）

主要参考文献：

- 1 赵天恩 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湾中福出版公司。
- 2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书楼，1999年。
- 3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全译本），台湾光启文化，2005年。
- 4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 5 王明道，《又四十年》。
- 6 李迪亚，《活祭——袁相忱传》。

民国初年的 信教自由运动

文 / 刘义

在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信教自由的发端和实施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基督教一方对其中国处境的反思和改进；另一条则是中国内部追求现代国家的积极努力。当然，两者的走向也多有重合之处，并互相影响，共同推动着这一问题在思想和政治实践中的前进与实施。

1900年是一个关键门槛。一方面对反教势力的重惩使基督教暂时赢得了发展的“黄金时代”，而深重的教难也促使着基督徒们去反省如何更好地处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深重的民族危机再次促使中国的先知先觉者们去探索救国之路，而面临生死关头的清政府也被迫做出一些政治革新的样子来。宗教的、思想的以及政治的机缘在此发生了巧合，共同推动着信教自由在近代中国思想与政治实践中的浮现。在晚清思想界，对信教自由思想的论述大概有两大重镇：一是《万国公报》上基督徒发表的文章；另一则是维新人士梁启超的论述。

1901年，《万国公报》载英国医士马林译的《自由篇》第十八章“论国教”就指出：“国

家靡财以施教”，“非事之所宜”。这几乎是论述这一问题最早的篇章。1905年，黄梓材撰文论述说：欧洲国家，宗教纷争多年，战祸惨重。“其后泰西各国，政治改良，划定政治与宗教之权限，任人民宗教自由，而争教之祸始息，国家之治化遂大进。”他们无论开设学堂、设立官职，均不以所信之教不同而区分，因此各教多能和谐相处。中国则不同，官僚和士生，无论上学、就职都须到庙中祭拜，实为对宗教自由干预太甚。政府既不许宗教自由，下层教堂则多不能得保护，从而多导致教堂被毁、教士被杀。“外人遂得乘间而入，以保教为名，酿成交涉重案。”这是早期对宗教自由阐述较详细的一篇，后来关乎信教自由的很多问题，比如教争、官职、学堂、教案等都在本文中有所论述。然而，更多的论述集中在1906年前后对英、法、西班牙、日本等国政教分离问题的报道，并以此为参照抨击中国的宗教问题。一篇评论法国政教分离的文章指出：“今中国之人，恒以本教仇敌他教，既用教以分别人类，又于学校定例中特著他教人不得入学肄业之条，而强其必拜儒

教之教主，何与法国政府之用心相背而驰也。夫法政府所以学校必由国立者，使人人皆受国民之教育，国立则无教可分也。中国乃似其国为儒教所专有，非儒教者，即非中国之人民，不得进国学，其暴虐亦甚矣。然则儒教之宗旨，尤甚于罗马教，而中国之政教分离，以法国之法待之，未知当在何日也。”后一篇评论英国宗教问题的文章也指出：中国于世界各国推翻国教、维护自由的当日，更欲以国教之名奉之于儒，强迫入学堂者必拜孔子，并著在令甲，颁于条教，“初不一考世界之现象，而徂其迂谬之见，殊可叹也。”

梁启超则在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接受了日本学界关于国家和宗教问题的新理论，认识到了政教分离、信教自由这一基本原则。1901年，在比较欧洲中世与近世国家思想的区别时梁启超即指出：中世国家由宗教团体构成，以教派相区分，“凡异教、无教之徒，不许有政权，且虐待之。”近世则政治与宗教无涉，“国家有保护‘信教自由’之责任，无论何种教令，不得禁止凌窘之。”中世教育归宗教势力范围，近世则“一切专门学，皆脱宗教之羁绊，国家保护其自由”。

此后，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他更是明确阐述了政教分离、信教自由的思想，并将其作为反对尊孔的重要理由之一。梁启超指出：欧洲历史上因宗教派别问题，战争数百年，至今仍令人毛骨悚然。后几经讨论，始以信教自由之条著于宪法，而教争之祸几息矣。信教自由之理，一“使国民品性趋于高尚”，二“使国家团体归于统一”，而其要则在“画定政治与宗教之权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属世间法，宗教属出世法。教会不能以其权侵政府，固无论矣，而政府亦不能滥用其权以干预国民之心魂也”。由此治化大进也。昔日中国，孔自孔，耶自耶，互不干涉。今日持保教论者，无异于无端设立藩篱，导致



梁启超

两者日相水火，从而引起教争，继而掀起政争。“是为国民分裂之厉阶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关于信教自由的论述所包含的政治蕴意。在《新民说》中，他已将信教自由看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在关于自由的论述中，宗教自由则与政治自由、民族自由、经济自由等并列为公民的重要自由之一。梁启超的论述对于扩大信教自由思想在公共思想界的影响以及信教自由作为公民权利的政治含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信教自由的付诸实施提供了切实机会的是清政府的新政改革。1901年，清政府准备实行“新政”，并于1905年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1906年，旅美华民耶稣教联合会陈翰芬、李济良、甘成国、刘维珪、梁廷美、李熊、潘成安等人上书考察大臣，请求为“永息教案，潜消外患”，“许宗教自由列于宪法，以崇政体而保民安”。他们在呈文中指出：

耶稣教实为“今日地球上最通行之宗教”，西方最富强、文明之国，如英、德、法、美等，莫不以此为立国之本。此教之盛行于各国，其明效大验，然传入我国，却教案叠起，此无他故。“中国宗教不自由，民教未能相安也。”他国宪法，无论信何教，俱得进入学校。我国官吏则

必限以祭祀礼节，不行此礼节者皆不得入学，“此之谓宗教不自由”。“夫宗教不自由，其为祸有不可胜言者。”在上者歧视，在下者随之。“由是民教不能相安，彼此互相齟齬，倘一有无智之民，煽惑其间，则焚杀之事，由此而生，而交涉之重案遂由此酿成矣。”相反，如果朝廷赐予宗教自由，臣民得以自由信仰，自由传教，则“哥儕小民自古传教者日益多，而外国教士来中国传教者益少，我既收回传教之权，则内地士民可免仇视外国教士之举，转而教案从此永息矣”。而且，各省基督教民在欧美留学者甚多，倘闻朝廷将宗教自由列予宪法，“则同深感激，图报圣口恩，民心既固，国势自强，可为预祝矣。”

这大概是近代中国史上最早的信教自由请愿。

1908年，清政府准备实行宪政，并于1910年在北京召开了资政院会议。与风起云涌的国会请愿相伴，1910年冬，许子玉、诚静怡、俞国桢、刘芳等人在北京发起宗教自由请愿会。他们称：自筹备宪政以来，各种奏疏，“除政治、法律、学术、技艺，尚未闻提议宗教自由。”然而，此点确为治道难易、国势静危之关键，更是“吾基督信徒刻不容缓、责无旁贷之义务”。因此，他们发起宗教自由请愿会，以期联络国内外基督教同胞，结合群力，共谋请愿进行之策。将来所请实现，则“上可以助国势之安，永息教祸，下可以造民生之福，浚沦性灵”。

宗教自由请愿会的发起无疑得到了海内外的共鸣，香港伦敦会的尹端模说：自己前此即有这一心思，不料南北远隔，难成夙愿，今“得诸君子登高一呼，提倡请愿，使弟等闻听之下，称心称愿，少此远行，乐可知也”。此事实关系重大，“非得此明谕，将来基督教民均遭歧视”。1911年4月，宗教自由请愿会的发起人诚静怡，在游历各省时到达广东，受到热烈欢

迎。代表们听了其伟论后，“均以为请愿一事，亟当进行，万不容缓”。山东泰安的基督徒在看到广东的布告书后，也即“商之诸同道，业蒙多数赞成”。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此时基督徒仍旧对西牧很是依赖。诚静怡在同广东代表谈话时指出：此事“仍须一面由西国牧师，关白驻京各国钦使，请其尽友邦之谊，相劝我国政府”。山东泰安的基督徒在谈论此事时，更是主动向西牧请教，西牧答复说：“斯时中国教会，多未自立，传教西人，尚在中国，各会信友，可商请本省西牧教主，致信于各国驻京公使，请其转询资政院，此事可行否。中国信友，待得到回音，然后再筹进行可也。”这与以后基督徒完全不依靠西牧、自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很不相同的。

然而，这一请愿活动却因清政府的倒台而宣告结束。1912年，民国成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在中国历史上，信教自由第一次在宪法意义上得以确立，是为近代中国信教自由法律保障的滥觞。此后，国父孙中山先生又多次提到这一问题，允诺给公民以信教自由的权利。如在广州耶稣教联合会的欢迎会上，他指出：甯清之对于教会，不能自由信仰，自立传教，只借条约保护。“今则完全独立，自由信仰。”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的欢迎会上说：民国告成，自由平等，万众一体，“信教自由，亦为约法所保障。”在法教堂欢迎会上指出：民国成立，政纲宣布，信仰自由则“可以消除昔日满清时代民教之冲突”。袁世凯上台后，在接见北京基督教代表时也明确承诺“以后在全国将实行信教自由”。

约法上的规定和最高元首的承诺（这里主要指孙中山先生的论述），无疑给信教自由以稳固的法律和政治保证，从而也为后世争取和坚持信教自由者所反复强调和引用。

民国的成立，确实给了基督徒很大的希望，以为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关于信教自由的规定和承诺，更使他们感到是上帝赐予的宝贵良机。《教务杂志》的记者评论说：在所有这一切中，最精彩之处，莫过于宗教迫害将在革命的烈火中永远消除。在基督徒以及受过基督教教育的人中，“信教自由已经被宣称是我们的父辈曾经奋斗、我们现在仍在争取的人权法案的一部分。过去的情况再也不会重演了。完整的宗教宽容必将指日可待。”《时兆月报》的记者说：“中华民国之大总统以及执政诸公，均喜仿欧美文化之邦许民之宗教之自由。为国民者，无论教内教外，多觉喜慰。”

与此同时，与民国认同，与自由、平等相认同，也成为了一些基督徒的目标。《中国基督徒月报》的记者说：中华民国之成立，“基督徒成立之也”。而民国之维持更是需要基督徒的努力。“盖基督教所抱之主义，即自由平等博爱是也。果能从皆明自由平等博爱之理，行自由平等博爱之事，则民国之巩固，自可操胜券而获矣。”基督教与中华民国，实有“密切之关系”也。正因为此，全国的基督徒才自愿为民国进行国祷，为中华民国的人民祈福。

然而，现实的经历却是残酷的。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带给基督徒一劳永逸的福利，而信教自由的历程也是多有挫折。历史的经验表明，临时约法以及国父对信教自由的保证是多么脆弱和不堪一击，而争取信教自由的过程又是多么艰辛，任重而道远。

1916年6月，袁世凯因称帝不遂羞愤而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下令恢复约法，召集国会，对1913年的宪法草案进行审议。此前争论不休的国教与信教自由问题再次被点燃，基督徒的请愿活动也由此被引向高潮。信教自由会即是其中的中心组织。1916年11月，信教自由会正式成立。总机关设于中央公园



徐谦

内，前司法次长徐谦被公推为会长。该会以“永久保持中华民国人民在宪法上有完全信教自由”为宗旨，定名为“信教自由会”。总事务所设于北京，并在各地设分事务所。规定：“中华民国已成年之男子及女子，无论信教与否，凡赞成本会宗旨者，均得为本会会员。”总事务所干事会分为四部：总务部、交际部、文书部和会计部。四部设总干事一人，每部设主任干事一人，干事无定额。徐谦任总干事兼交际部主任，其他各部主任分别为雍涛、马良和魏丕治。

信教自由会成立以后，开会演说，拍电投函，布告宗旨，极力鼓吹，并向各地发出公函，请速成立分会，以联合请愿。随着各地分会的设立，信教自由会日益庞大，会务几趋繁杂。而且，鉴于各宗教团体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办事很难统一进行。因此，基督教（指基督新教）方面遂有人提议各宗教团体分头进行，每周举行一次大会，以保持行动一致。各方面赞同后，信教自由会即分为三部进行：总机关仍设于公园，称为“信教自由总会”；公教（指天主教）方面，称为“信教自由会公教部”；基督教（指基督新教）方面则称为“信

教自由会基督教之部”；其他宗教团体则构成第三部。基督教之部则尤为活跃。自各宗教分进以来，北京基督教会领袖公推诚静怡为该部主任，借北京中华基督教会为通信机关。

基督徒既抱定必胜之决心，力争完全之信教自由。然而，反对一方的势力也不甘示弱。如诚静怡所言，对宪法草案的重新审订，“为以前斗争的复苏提供了一个契机。坚信信教自由原则的人获得了为删除那引起反对的条款而斗争的机会。而希望看到孔教定为国教的人则同样得到了为在宪法中加入新的条款而战斗的机遇。”

1916年9月17日，康有为上书段祺瑞，请其提议“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以他职事假赁侵占，且令议院有司，永不提议”。10月4日，张勋等十三省区督军、省长等致电黎元洪，请国会定孔教为国教，“保存君宪学宫及其学田祀田，设奉祀生，行跪拜礼，编入宪法，永不得再议。”11月12日，参、众两院中顽固坚持定孔教为国教的一百多议员，在北京组成国教维持会，通电吁请各省督军支持。基督教与孔教，双方竭力鼓吹自己的观点，各相拉拢支持者，在多方面展开了旗鼓相当的较量。斗争的白热化则体现在宪法会议上多种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中。

1916年9月5日，宪法会议正式开幕。8日，由提案人朱兆莘说明第十九条二项之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是为初读阶段之主要审议内容。后由于有人再次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问题，对十九条二项的审议随之转化为对国教案的讨论。在初读阶段，这主要有两次会议，分别于1916年12月27日及1917年1月8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上，提案人王敬芳解释增加国教的问题，认为我国自古至今，之所以能维持不堕，实

赖孔教潜移默化之力。我国名义上虽无国教，而文化礼教则均以孔子之垂训为依归。因此，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孙光庭等赞成此项提案，认为中国历史上本无教争，自不必引外国之教训为杞忧。何雯及朱某则反对，认为中华民国成自五族，法律上既属平等，在信仰上当然自由。第二次会议，王葆真力呈中国无规定国教之必要，认为倘以之定为专章，加入宪法，其弊必不可言。孙光庭以我国与他国国情不同相驳斥。王葆真则举德国的例子再反驳，认为我国今日之政体与孔子之宗旨不符，倘定为国教，定有人利用此来推翻共和。后以“孔教为国教，仍许信教自由”进行表决，结果在场人数519人，赞成票255张，反对票264张，均不满三分之二的法数，因此都不能成立。

自1917年1月26日起，会议进入二读阶段，分别于2月2日、5日、7日、9日讨论孔教问题。会议中，由于陈光寿提出第十一条与第十九条二项关系密切，主张合并讨论，经会议议决后实行，因此这两个问题遂合而为一。到9日集体表决之时，议员们共提出九种修正案，分别为：孙光庭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依历史习惯，以孔子之教为国教”；张琴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以固有之孔教为国教，其他各宗教之传布，均以法律保护之”；陈善修正案：“将第十一条及第十九条第二项一并删除”；布尔格特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以孔子之教为国教，至满蒙回藏人民，亦得各依其向来所习惯之教为宗教”；魏肇文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有信仰孔子之道及其他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其尊孔典礼，别以法律定之”；刘恩格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有信仰孔子及其他各教之自由，其尊孔典礼，别以法律定之”；李文治修正案：“赞成规定孔教为国教”；瞿富文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旧有之信仰，以孔子之教为国

教，有信仰其他宗教者，亦听其自由”；易宗夔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有信仰孔教及其他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会议依次对这九种修正案及原案两条付诸表决，均不足三分之二的法数，以致此项议案几乎被废除。后又有李景濂与秦广礼两项提案，但均未获通过。最后，议长声明，第十一条与第十九条二项另付审议，会议暂告结束。

1917年4月30日，宪法会议对第十一条及第十九条二项进行三读。邵瑞彭提出于第十一条后加一项：“中华民国人民对于孔子之道须崇敬之”。因附议者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成为议题。陈景南提出：“中华民国人民，有信仰孔教及其他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其尊孔典礼别以法律定之”。讨论中，除参议员焦易堂反对原案第十一条、王泽颁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外，叶夏声、吴宗慈、褚辅成等均赞成第十一条，反对第十九条二项。后以各修正案分别提付表决，均未能通过。最后以刘恩格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付表决，赞成者293人，也不足三分之二的法数。有人提起反正表决，反对者113人，不足三分之一的人数，即证明前次表决已获通过。但仍有人提出异议，试图推翻表决结果，议场顿时秩序大乱。议长宣布审议结果应报告大会，遂散会。

5月14日再次开会，汤松年、陈景南、蒋羲明三人提出修正案，但均未能通过。最后再以刘恩格修正案付表决，以483票赞成通过。议长宣布：本条通过，第十九条二项当然打消。由此，第十一条与第十九条二项的审议，以国教案失败、信教自由的确立而告终。

1917年5月15日，信教自由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青年会讲堂举行，庆祝信教自由在宪法上的确立。除报告成绩、总结经验外，一项重要议题为《信教自由会永久保存案》。

会议中，大概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信教自由在宪法上已得完全保存，妨碍信教自由之条件也已经完全打消，本会目的已达，因此信教自由会自无继续存在之必要；另一种则认为，信教自由虽已在宪法上确定，但孔教的支持者必不肯善罢甘休。我们请愿无非是为了保护信教自由，而孔教徒则意在遏阻其他宗教之自由。而且中国政变无常，很难防其不借题发挥，刚刚过去的这番争论即是明证。因此，信教自由会有永久保存之理由。最后，第二种意见得到大多数赞成通过。

翌日，选举职员，曾洞忱当选为会长，刘馨庭与徐季龙为副会长，其他职员也都由票选产生。17日，信教自由会在北京美以美会礼拜堂举行庆成大会，到会人数约两千余人。徐季龙主持开会，马相伯、诚静怡等人相继演说。最后，会议在高呼三声“信教自由万岁”中解散。信教自由会作为永久性机构成立。民初的信教自由之争由此暂告一段落。后来，传教士乐灵生评论说：“现在，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给宗教自由以明确的定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一直拥有宗教自由。但中国人从来没有有意识地为宗教的权利而斗争过。现在，他们已经实现这一点了。这是这一现代时期（1911—1927）的一个新特征。■

（本文蒙作者允许选自其硕士论文）



民国初年学习圣经的妇女

异象：过去、现在与未来

文 / 李小白

面对着教会目前的困局，当我们反思并需要抉择下一步行动的时候，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再次浮现在我们面前。这些问题其实自守望教会决定“浮出水面”以及后来确定“山上的城”之异象时就已经存在，但当时并未有如今日之深度的解读。因此，在登记、整合、建堂等过程中，多是从外在及事工的角度予以解释。随着过程的深入，今天我们必须更深的层面上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否则无论建堂、植堂还是深度教会建造都难以继续。

这些问题实质上反应了如何理解异象及其实现——当下具体的疑问包括：登记、整合、建堂等是教会的使命吗？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大型聚会？户外聚会合适吗？等等……守望教会是一个比较“后知”型的教会（即我们多是“先做后说”，而不是“先说后做”），我想就此谈谈我的一些“后知”看法。

教会：基督教信仰的唯一载体

“载体”这个词也许不妥，但却是我目前能想到的比较合适的表达。

任何一种信仰（社会学意义上就是宗教）都需要具体的载体，否则就无法实践及传承。基督教信仰的载体显然就是、并且只是教会。从旧约到新约，绝少中国“大侠”式的人物（参孙大概最为接近，但也是不大好的见证），保罗宣教成果就是建立了一系列教会，而新约圣经几乎都是写给教会的。圣经称教会为基督的身体与新妇、神的家与国等等，可见教会在神的心意中何等重要。

教会就意味着群体，也就是说基督教信仰是透过群体实践和传承的。“不可停止聚会”是圣经的命令，尽管历代教会聚会的规模、方式不同，但聚集在一起敬拜却从未中断过。

只是近代以来，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教会的地位与重要性在人们（包括基督徒）的观念中大打折扣，信仰的个人化趋势比较明显。例如，自慕迪以来，多以决志祷告这类典型的个人认信方式作为信主的标志，洗礼（这是典型的教会行为）的地位、作用与意义反而不受重视。时至今日，有些人甚至认为不参加教会并不重要，只要个人信就可以了。但这却与圣经的教导不符。

教会根本的特征是认信耶稣基督为唯一的主,在旧约表述为以色列人的“示玛篇”(即申 6:4—5)和十诫的第一诫。由于教会在世界是作为一个当时代的社会组织而存在,因此,教会与社会的张力就不可避免。“政教分离、政教合一”无非就是这种张力的具体表现。尽管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社会,神赋予教会不同的使命,但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建立并坚固神的教会,直到主再来。综观历史可以看出:教会兴则社会兴,教会衰则社会衰(我们现在不正如此吗?)。故对于一个具体的教会来说,清楚知道神在当下给教会的使命并为之全力以赴就是最重要的了。

教会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其“大公”性,在时间中即体现为信仰的历史传承。国度是圣经重要的观念,历代教会共同构成基督的国度。因此,大公教会的传统,不仅是丰富的属灵资源,更是属灵的“根”(罗 11:17—18)。教会可以(也应该)有特色,但过于强调特色以致轻视传承,教会就容易成为一个没有根的教会,这样的教会缺乏属天的国度观,必定不能长久。

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依我之见,正是由于在教会的建造上下功夫不够,导致教会根基不稳、国度观念不强,以致教会比较弱小。尽管近年信徒数量有长足的增加,但教会内在质量仍存在诸多需要改进之处。

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与总结。

历史与国度的反思

新教是在大复兴的年代传入中国的。但在时代观念、民族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多重压力下,中国教会(以下仅指新教教会)在二百年间艰难成长,至今根基不稳。教会建造仍是当前中国教会最重要的任务。

来中国宣教的宣教士在热情、忠诚、奉献等方面非常出色,工作也卓有成效,但其教会观如何,可能值得反思。在信仰个人化、超宗派、反智主义以及西方文化等影响下,中国教会一开始就有些“先天不足”。再加上过度依靠国外的人员与资助,教会的成长多少又有些“后天营养不良”。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信仰的看法是相当实用化和个人化的。时至今日,许多人仍认为自己心里信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聚在一起呢?信教不必太认真,没事时净化一下个人心灵就可以了,有事还是现实些为好等等。而中国的统治者一向视群体的聚集为大患(有一天从电视上得知这是清代不许开矿的重要原因——怕人多方便造反),故对宗教(既没用又聚集)总是多方限制。这些因素对于教会和政府都有相当的影响:历朝政府总是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有权管制教会,教会则自觉不自觉地容易走向信仰的个人化、道德化、实用化。

中国也是一个长期专制的国家,“家长制”等如此深入人心(所谓“民主集中制”不过是其变种),难免影响教会。比如,认错(悔改)对于教会及其领袖还是比较艰难的等等。综观1949年以前的中国本土教会,在神学思想、国度观念、自身组织管理方面都存在不少值得反思之处。

由于新教是在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的时候大规模进入的(其实之前已经进入,但多被压制,难以生根),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敌视与攻击。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信徒在回应时要么放弃了信仰,要么割裂了与大公教会的联系,向民族主义妥协,留下了未竟之工,需要今天继续完成。(我如此说并没有半点轻视或否定宣教士及老一代信徒、教会的意见。只是中国教会走到今天,若要继续前进,就不能不认真而深入地面对这些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教会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

的使命仍是“教会建造”。从外在的角度，这是教会成为一个独立、合法（当然是按教会本着圣经在当时代下的解释——这其实是神在当代心意的表达）、合宜（即由内涵定义的、发挥宗教作用的教会）的社会组织的过程，其直接体现自然是“政教关系”。我们所推动的登记、整合、建堂以及将来的植堂、宣教等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从内在角度看，这是教会神学、组织、牧养等理念与体制形成、改进直至稳定的过程。由于教会是一个整体，对内、对外实质只是同一个建造，不能分开，也不能缺失彼此。外在的过程拓展并验证了内在的实质，内在的实质保证并支持了外在的过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承传大公教会传统、符合时代与国情、成为社会良心的中国教会——“大公教会中国当代分会”。

神啊，你真伟大！神的心意远超过我们所能思想的。也许我们只是想通过建堂获得一个稳定的聚会场所，但神却有更伟大而奇妙的计划。我们难以设想我们微小的工作，将具有如此深远的意义。我们这些没有教会经验的软弱器皿，居然能成为建造神国度的先锋。前面还有什么？只有继续前行才能知晓。路才刚刚开始，前面风景必定更好！

守望教会的异象

经历了30年严酷的历练，中国及中国教会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机。就社会而言，过去30年，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宽松了许多。（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为复兴教会准备的，不然建堂的资源从哪里来？）中国教会同时经历了一个极大的复兴，为教会深度建造预备了条件。

不可否认，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农村教会的复兴使教会内在建造的要求更为迫切。因此，城市教会的兴起就必定肩负着深



入建造教会的使命。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两个教会可以完成的。但圣经记载神做工少有“群众运动”，多是先兴起一些“先知”。

我想，守望教会正是这样的“先知”之一（荣耀归主！），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步领受并实践着建造教会的使命（异象）。尽管我们在决定转型时并没有认识得如此清楚，但我们却在此使命上迈出了实质的一步。这个过程中神清楚的带领与印证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我们最终确定的异象表述（“山上的城”与“教会建造”）岂不正是这一历程的总结？而每当我们面临挑战时，如何聚会、是否继续建堂等与异象相关的问题就会浮现。到目前为止，每次的反思都使我们对异象的认识更为清晰，信心也更加坚定。但愿现在的经历，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不可否认，实现建造教会的使命不一定非登记、建堂不可。但对于守望教会而言，既然要成为山上的城，教会规模太小、没有稳定的聚会场所、只走前人走过的路等恐怕都难以将异象落到实处——异象与使命要求我们突破与成长。作为先锋与拓荒者，在看似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去铺路搭桥，乃是理所当然的。感谢神！我们有幸被主选中（只是

在有限意义上如此说，许多兄弟教会早已走过这些路了）、被主使用，这真是主所赐下的何等大的恩典与荣耀！

不论是登记、整合还是建堂，我们在开始时都认真地寻求了神的心意，也能彼此印证。不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表述、实施的过程、最终的结果存在怎样的问题和偏差，但在我看来，“神施恩的手一直帮助我们”的结论是非常明显、不容否认的。再看看因此而取得的超出我们意料成果（比如这个正在经历痛苦磨合的同工团队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我们尽管痛苦到今天可就是还能坚持下去，谁敢说这不是神迹？），我的信心更为坚定，更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走下去。至少植堂还没有开始，我不相信神带我去纽约学习如何植堂一个月只是为了让我开开眼而已！

登记是第一个主要的行动。尽管结果并未成功（对我而言，重要的是登记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但其意义却非常深远：神的教会终于可以坦然面对政府，不再惧怕公开自己了（“三自”运动中教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惧怕）。这不仅是教会外在环境的突破，更是教会内在生命的突破。

整合是第二个重要步骤，我们今天的大型聚会正是该行动的果实。就敬拜神而言，聚会规模并无实质意义，大、小聚会都可以。但就今天中国教会的现实处境而言，不突破聚会规模的限制，教会就难以健康地成长。就教会历史而言，这是突破“三自”运动强加给教会之限制、并进而解决“三自”问题（只要这个问题存在，中国教会就还没有合一）的必由之路。就教会建造而言，这是探索并形成中国教会神学思想、治理模式、工人培训等的必由之路。就福音的传播与国度的拓展而言，这是建立未来宣教基地的必由之路。就信仰的经历而言，这是学习凭信心持守神的异象与托付的必由之路。就个人生命成长而言，这是使信望爱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的必由之路。就社会意义而言，这是使社会认识教会、教会影响社会、政教关系正常化（小型教会在客观上难以起到如此作用）的必由之路。可以分散聚会吗？可以，但那要等到教会不受限制的时候。那时，教会愿意以怎样的规模与方式聚会，就选择那样的聚会形式好了。但今天的守望教会不可以，这场属灵争战还在进行中。尽管今天我们似乎可以保持大型聚会，但并非稳定，被打压的基本态势仍没变。国家宗教局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希望将聚会再次限定到所谓的“合法聚会点”中。这是魔鬼的诡计，我们要警惕！

建堂是第三个重要步骤。教会当然不等于教堂，但在中国目前的处境下，建堂具有特别的意义（见守望教会建堂报告）。由于教会一时难以取得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在属于自己的教堂里敬拜其实就是教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合法化的最佳形式（以经商为例，对于普通人而言，通常他不关心你是否有“执照”，只要你在哪里经营并无人干涉，你的东西没有问题、价格公道、服务令人满意，他就认为你是合法的，就愿意买你的东西）。同时，建堂的成功也必定为教会建造提供一个稳定的根据地，并为众教会（间接为社会）撑开一片广阔的成长空间，使教会建造更广、更深地进行。也正因如此，这场属灵争战才如此激烈，魔鬼撒旦（政府不过是它的工具）才如此顽强地抵挡教会，阻止建堂。既然如此，教会更不能退后，反而应当信心坚定，坚持建堂，直到成功。

我们正在路上，遇到了困难与挑战，信心有些低落。这没什么希奇，保罗早就告诉我们“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时最要紧的，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具体说就是持守异象），凭借芥菜种般的信心，坚持下去，决不退后。主应许我们“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异象与牧养的关系

这是困扰不少人的问题，似乎正是由于登记、建堂等投入过多而影响了牧养与传福音的工作。这是关乎异象及其实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不清楚，不仅困扰个人，更影响教会。就资源投入而论，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放在教会建造的大背景下，我们又当如何看待呢？

圣经说“耶和華是我的牧者”。从根本上说，只有主耶穌是我们的牧人，能牧养我们。主将具体的使命（异象）赋予一个教会，并通过圣灵带领、扶持、保守教会实现之，这不是牧养吗？不仅是，而且是主要的牧养方式之一。“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与主同工、与神同行，主就在这个过程中牧养我们。登记、整合、建堂这些实现异象的具体事工正是主牧养我们的途径。神训练门徒，主要是将他们放在工场或战场上（想想保羅刚归正就投入战斗的情形），尽管危险，但成长也最快。因此，异象的实现不仅没有影响牧养，相反却是牧养的一部分。

作为教会，既已领受这样的使命，就应当集中全部力量为之努力。我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与神同行。我们的祷告常常是“求主与我们同在”，但其前提却是我们需要站在神那一边。神的心意既已清晰，听命就胜于献祭。这不就是牧养吗？牧养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把我们变成顺服主的人吗？

就登记、整合、建堂而言，主至少在以下方面牧养了我们：

1、通过经历登记、整合、建堂的过程，主使教会和个人的生命都大大成长。我们认真地回顾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信心、爱心、忍耐、奉献、刚强等方面没有突破吗？这些正是一个基督徒的安身立命之本，不仅使我们可以从容面对生活中的各样挑战，而且让我们一生受益。

2、通过登记、建堂的过程，主大大更新了我们的教会观念（在这个时代中，抱持这样价值观的本身就已经让人不可思议了），建立了弟兄姊妹生命上的联结。当然，不少人感觉这方面似乎很差，甚至很不满意。但换个角度，你为什么不满？岂不是因为他们是你的弟兄姊妹，你期望更多吗？这是更新与成长啊！正说明我们有了相当深入的生命联结，也激励我们更深入地建造教会。

3、也许有人觉得教会对个人生命的关注不足，我承认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个牧师，我无可推诿，只有努力作工。但我们也应当思考：一是是否过于关注个人的问题。现时代是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比较关注自我与自我的感受，但圣经的原则却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如果我们能够跳出个人的小圈子，投入服侍他人与教会之中，相信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二是信心与勇气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并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也不是哪个牧师或辅导员指点一下就一切通达了。这是必须由你自己在那个特定的处境中，凭信心勇敢胜过的，这是神牧养你的一部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你不能得胜，再多的关怀充其量只能“挺”你一时，但难以使你突破与成长。

当然牧养是教会永远的问题（只要教会存在）。我们正在教会建造的路上，许多事工还非常不成熟。作为拓荒者，代价是必然的。如果我们知道今天的付出，乃是为着中国教会长久的益处（这当然包括我们个人的益处），更是为着神的荣耀，你愿意吗？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 15:13）

2011年3月■

（作者为北京守望教会牧师）

“反西化”还是“现代化”

文 / 秦晖

一、“拳民”与“教民”的由来

天朝灭亡三十多年后，中国出现了又一次“文化”大潮，只是方向相反：义和团“奉旨造反”，大闹京师，不仅反“洋教”，而且对戊戌维新反攻倒算，要废掉光绪，杀光维新派乃至洋务派“二毛子”，还要“烧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总之是对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从“文化”、“制度”直到“器物”，全都要一锅端。近来有人说，义和团“烧铁道，拔电杆”是军事需要，不能简单视为排斥西方“器物”。其实，除了那个揭帖，当时拳民仇视新“器物”的言行也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如时人所记：“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其痛恨洋物如此。”¹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²。可见其“反西化”之极端。当然，义和团反“西化”的最主要对象还是“洋教”。今天在这个问题上，两极化的“义和团立场”和“洋教立场”都显得偏颇，我们应当平心而论。

应该说在人类文化交流中，信仰（不限于宗教信仰）的传播遍见于古今中外。在中国，早于基督教的有印度“传教士”竺法兰

等传入的佛教，尤其是达摩传扬的禅宗。晚于基督教的，有马林、罗易、吴廷康这些来华传播马列主义的“国际使者”。说实话，与此前和此后的这些人相比，基督教的在华传播不很成功。佛教由竺法兰等人传入后就在中国扎下了根，后来号称“佛教中国化主流”的禅宗，事实上也是由印度来的“达摩祖师”奠定的。

至于苏俄派来传播马列主义并促成了中共建立的马林、罗易等“国际使者”，与来华传播基督教并促成中国教会建立的那些人相比就更有意思了：后者扎根于穷乡僻壤，而前者游走于大都市；后者系政教分离下的教会所派，不像前者那样受本国政府派遣、深涉政治运作、在华也有更大的特权。应当承认两者来华都是出于信仰，一开始也都是未经当时中国政府允许的违禁冒险，两者传入的新信仰也都对中国的老“传统”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最有趣的是：两者传播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多相似性。有一篇为“教民”鸣不平的文章写道，洋教士最开始把传教对象瞄准知识精英，但碰了钉子。于是，洋教士们调整了策略，把目标锁定在底层老百姓身上。

其实基督教在西方最开始也是在穷人中传播的，后来才被上流社会接受。

向底层老百姓传教，仅仅靠连中国话都说不明白的传教士宣讲上帝的福音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教会的主要办法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新教教会的办法主要是办医院、办孤儿院和赈灾等，但不是很灵。那时中国人根本不信西医，只有极少数快死了的人，在中医没有辙的情况下，才送去看西医，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办孤儿院对中国人更没有吸引力，中国人命不值钱，孩子说卖就卖说扔就扔，没有人会因为你收养了孤儿就认定你善，随你信教，没准还怀疑你收养孤儿是为了吃小孩脑髓呢。唯有赈灾救助还起些作用，一些被救助的灾民入了新教。

天主教会的切入点比较切合实际，他们除了做新教做的那些善事外，还增加了一项，就是帮助老百姓打官司。天主教的传教士发现，中国的官吏极其腐败，司法极其不公，办案手段野蛮愚昧，没钱没势的老百姓冤屈太多。于是，天主教教会就常常帮助教民打官司。老百姓发现信上帝可能不受欺负了，于是信教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9世纪的中国是极其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敢于信教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要遭到同村人的歧视、辱骂和孤立。有的村子不准教民用井水，有的私塾老师不教教民的孩子。为什么面临这么大的实际生活中的压力，教民还要加入教会呢？信教的教民大多数是贫穷百姓，是最弱势的群体，加入了教会遇到了难处有人帮有人管，这是最大的吸引力。由于弱势，才找依靠，官府靠不住，只好去信教。³

此文说的基本不错。笔者当年曾在晚清“西林教案”发生地附近插队9年，那是一个

极其偏僻贫困的大山区，自晚清以来直到民国年间一直有法国教会的传教活动。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当地的教民村寨都是瑶族和“高山汉”寨子，即当地最贫困的人群，而条件较好的壮族村寨和坪坝地区似乎没有教民的踪迹。

不过应该补充的是：弱势本身并不是不变的，穷人并不一定是进步的同义词，底层也并不总是意味着正义——当然，这几项不确定也不仅仅对教民有效。

一般来讲，在中国传统秩序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居于优势的阶层无求于教会，并且作为传统社会的受益者，他们通常会敌视传统秩序的可能颠覆者，因此教民以上流社会排斥的弱势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为主，这并不难理解。在一些记载中他们与别人的冲突甚至有点像1950年代的“穷人斗争”叙事：如1900年3月河北清苑教民王洛敏为东家张洛第“铜锅”、“钉火镰”而张“不给工钱”，导致王上门“坐索、口角”，其他教民赶来相帮，遂发展为一场民教冲突。⁴

二、义和团只是“民教冲突”的产物？

显然，教民入教不仅仅是为信仰。不过无论是为信仰还是为权益，本身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就可能要么别人欺负你，要么你欺负别人，阿Q革命成功变成赵太爷，如此反复循环。随着晚清国势衰弱，列强步步进逼，从国际关系中的强势者，通过帝国主义行为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又成为社会上的强势者。教会以列强的政治势力为后盾来传教，就可能走向信仰自由的反面了。传统吏治腐败司法不公，弱者没有靠山会被欺负，但有强势教会做了靠山，就有可能扮演强者的角色去欺负别人

了。同时所谓痞子，既是上流社会对底层抗争的一种蔑称，也不能否认流氓无赖确实在底层社会存在着，他们平时被社会边缘化，一旦得势成为“权痞”，确实可能比传统的“权贵”表现还恶劣。

对于晚清各地多发的教案，如今有谴责“排外”和肯定“反侵略”两种对立观点。实际上恐怕不能一概而论。随着晚清列强势力的增加，我们看到教案出现了类型上的演变：早期教案如“西林教案”，多是官府主动镇压传教士，带有较多的传统统治者排斥异端的色彩。但是到了晚期，“石头剪刀布，百姓洋人官”的局面形成，民间社会挑战教堂，而官府畏列强之势出来保护教堂、弹压百姓的案例（如巨野教案）越来越多。虽然即使晚期教案也不是只有这一种类型，但显然它与一些教堂（以及教民）以列强的权势为后盾行为不公、并招致中国民众的反感有关，不能说教堂完全是无辜的。

不过，仅仅这个因素是不足以造成“庚子之祸”那般大乱的。因为晚清的几个因素使“教民特权”受到很大限制：第一，如果说依靠政治势力强行传教，那么清末的基督教会无论如何不可能像太平天国走得那么远。晚清官府再屈服于列强，也仍然是个“儒



太平天国的礼拜活动

表法里”的朝廷，不可能变成太平天国那样的神权国家，不可能像天朝那样“罢黜百家独尊耶教”。晚清教会再得势，也做不到“焚书坑儒”，像洪秀全那样对儒家进行异端审判，或者像洪那样去打砸“偶像”庙宇。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列强自己都已政教分离，更不可能像16世纪西班牙人征服拉美那样去强制传教。当时的在华教会至少在形式上也承认信仰自由，只能“诱人”入教而不能逼人入教，其“文化特权”是有限的。

第二，晚清教会的新信仰、新观念与教民作为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对传统秩序、主流社会的冲击，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革命”的程度。纵使底层教民靠着教会撑腰，对上流社会表现出不敬，也不是教会传教的本意。教民可能不交迎神赛会份钱、不尽团练保甲义务、不参加宗族祠堂活动，并因此招致反感，但他们不像过去的天朝和后来的“农会”，并没有能力去禁止别人从事上述活动，由此造成你死我活的冲突是不合逻辑的。

第三，晚清教民中的确有借着官府对列强的畏惧而狐假虎威的“权痞”行为，就个案而言，有的行为可能比“权贵”还恶劣，但就整体而言，教民“权痞”之害只是“权贵”之害的一个投影。晚清官府本来不把草民当回事，但“在教”的百姓“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于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出见。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⁵说实话，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官府拿百姓当回事绝非坏事。但只拿你当回事，对其他百姓就构成了不公，倘若你因此自以为成了回事而对其他百姓也傲慢无礼起来，那不是找抽吗？

不过对这种现象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一

种态度是：你本来就草民一个，居然把自己当回事，该抽，抽了你大家都乖乖当草民就好了。另一种态度是：凭什么只有你才是回事，我们就不是？官家必须把我们都当回事，否则咱们就抽他。但是，后一种态度直到辛亥时才比较普遍。而在庚子年间，百姓往往只知道前一种态度。

就以当时最遭人反感的教会“包揽词讼”过问司法而言，本来在“衙门八字开，无权无钱莫进来”的背景下，教会对弱势教民进行“法律援助”不能说就是坏事，当然可以指责他们何以只援助教民，不过普遍援助恐怕谁也做不到。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整个司法体系还是那么腐败、不公，那么得到教会援助的人对其他人而言就等于拥有了司法特权，容易造成恶果。但这里我们仍然面临同样的难题：是让所有人都成为司法腐败的牺牲品而置之不理，还是改革司法体制实行公平法治，让所有人都得到正义？对此，辛亥时人们普遍的回答，同样与庚子时不同。

事实上，如果司法本身是公正的，教会的“法律援助”不会造成问题，如果司法本身不公正，谁有权势就偏向谁，那么教会势力与其他权贵势力干预司法的恶果是一样的。当时教会只能“包揽词讼”帮教民打官司，而不能私设公堂，像中世纪西方教会那样拥有相当程度的司法权。因此关键还在于当时的司法体制本身的腐败。更何况教会涉足词讼也只是天主教会的特点，新教教会一般不这么干。

总之，对于晚清社会上的“反教”风潮，教会与教民方面是有责任的，不能仅仅责备中国人“排外”。但是当时的“民教矛盾”并没有今天一些著述渲染的那么严重。晚清的“教案”尽管有增多的趋势，但直到“己亥建储”时都远没有达到失控的程度，更不必然导致

社会爆炸。而1899年以后“民教冲突”突然失控，很快变成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一场社会爆炸，其实另有原因。

三、关于义和团的“爱国”与“愚昧”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⁶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

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⁷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史料。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⁸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⁹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¹⁰，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¹¹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

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请看当时的记载：“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

倒毙，即反奔。”¹²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

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穆斯林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四、义和团“反西化”：又一次“文化”灾难

综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怙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¹³，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



义和团团民

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¹⁴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得不得了。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

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

在中国“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愣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因为直接下手滥

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不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五、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针对制度而非“文化”。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希望实现“天下为公”。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甚至在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冠县等地，大量的原“团民”也变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

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¹⁵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¹⁶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到了后来的新文化时代，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严厉。如李大钊声称：我们必须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长，“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而陈独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仅全面抨击了义和团的行为，而且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

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碑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但是同时，尽管当时已经兴起了文化决定论，出现了“西化”必须反孔的言论，然而新文化的思想家们从未把“反西化”的义和团和“孔孟之道”相联系，正如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联系一样。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原载于《南方周末》，本刊因篇幅限制有部分删节）。

-
- 1 佚名：《天津一月记》
 - 2 柴萼《庚辛纪事》
 - 3 郭老学徒：《义和团杀害的是什么人》，《杂文月刊》选刊版2009年第7期
 - 4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93—96页
 - 5 见腾讯网：《转型中国第08期：晚清教案：勿轻言乡民非理性》
 - 6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页
 - 7 见《庚子中外战纪》
 - 8 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366页
 - 9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417页
 - 10 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本
 - 11 罗惇融：《庚子国变记》
 - 12 佚名：《天津一月记》
 - 13 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187页
 - 14 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30页
 - 15 康志杰、王威：《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评述——兼论基督徒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 16 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

信心与祷告¹

文 / 倪柝声

《马可福音》11:12—24 那一段故事的上下文，讲“祷告应当信”是相当清楚的。主耶稣和门徒从伯大尼出来，他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但是树上竟没有果子。主耶稣就咒诅它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第二天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门徒就希奇，对主说：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主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人祷告的时候要信，因为你信你所求的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什么叫做信？你信你所求的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盼望人信主后，第一个礼拜，就知道什么叫做信。应该一起

头就能信。主说，你们无论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一、信就是得着

我们作基督徒的人，常常犯一个错误，在老基督徒中，也有这一个错误。主在这里说，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基督徒，不是有信心必定得着，应该是有信心是得着。在这里有两种的信心，有两种可能的信心。主耶稣说我们“得着”是用过两次，一次是“是得着”，一次是“必得着”。如果用黑板就把它写起来，一边写“是得着”，一边写“必得着”。主耶稣所说的“信”，是挂在“是得着”上，这叫做信。什么叫做信？信，就是信是得着。

许多老信徒把这一个“信”字，从“是得着”上拿下来，挂在“必得着”上。我们祷告主，相信必定得着，这一个信心大得很。我祷告主，

叫这一个山挪到海里，我相信一定挪到海里，这一个信心大得了不得。但是，这一个信心却从“是得着”的头上拿下来，戴在“必得着”的头上，像戴帽子一样。我们应当把信戴在“是得着”上，不是戴在“必得着”上，我们把这个帽子戴错了地方。主说一切信必得着的，不是信心。圣经里面，另外有一个信心，这信心，是“信是得着”的，不是“信必得着”的。这二个绝对不一样。不止初信的人得学，就是信了二十年的人，还得学。你们自己得清楚，“必”是要的意思，比“要”还要厉害，但是不够。

我信主，是余慈度小姐带领的。她后来生病，乳房上长瘤，一天流出许多的脓。那时我刚刚得了个医治。她听见我得了医治，就写一封信，叫我到江湾去看她。她信心顶大，说，我相信神一定医治我的病。我说你不能说，相信神一定医治你的病，这不是信心；主耶稣不是把信字挂在必字上，这不是信心。我们谈了好久，后来我就回来。过了两个月，她的病越过越坏。

你们知道，长毒瘤是相当痛苦的，肉腐烂，细胞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又臭又苦。初期的时候，医生说可以开刀，后来就是要请医生开刀也没有用。但是她说神会医治她。我说，这不是信心。在她旁边其他的西国教士也和我争辩。他们说余小姐信心大得很，我说这不是信心。我说，她要相信神医治了她，这才是信心。不是神要医治，乃是神医治了。真的信心，是信神医治了我。神要医治，神必定医治，那是盼望。信心都是对付神的现在和过往；只有盼望，是对付神的将来。我相信神明天要医治我，这就是我盼望神明天要医治。

两个月后，一天，我收到余小姐一封信说：我一定在两三天之内要起床，我相信神必定

医治我，所以我必定起来。那几天，我相当忙，人也累，不能去看她，就复一封信说：信心在前，行为在后，这一个行为是活的；行为在前，信心在后，这一个行为是死的。这是基本的原则。人是先有信心，后有行为。先有行为，后有信心，那一个信心不行。我指明给她看，你如果相信我得了医治而起来，这一个起来是活的。感谢神！他医治了我，所以我从床上起来，这是活的。因为我相信神是医治了我。我如果想，我应该起来，神会医治我，请你记得，我靠着我的行为来保那一个医治，那一个医治是死的。

第二天，我赶去看她，我请求她不要爬起来。我说：你如果得了医治，爬起来可以。你如果要爬起来得医治，不可以。你看见这是基本的分别，你如果得了医治，爬起来是可以的。圣经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你如果爬起来，觉得神必定医治你，结果一定不行。你盼望用行为来叫神医治你，第一天行，第二天就不行。那一天她看见了，她没有爬起来。当然后来她慢慢地去世。

所以，什么叫做信？信，是因你有一种的情形说，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不是神要听我的祷告。当你跪在那里祷告，就是这么一下子，你说，感谢神，听了我的祷告！感谢神，这一件事情好了！这叫做信心。这叫做信“是得着”的。你或者跪在那里祷告，爬起来，你说，我相信神一定听我的祷告，这一个一定不行。你再一定几下，也不发生事情，你的一定并不生效。如果替一个病人祷告，他说，感谢神，我得了医治！也许热度还是那么高，一点没有改变，只因里面清楚，就没有问题。有的人说：唉，我相信主一定医治我的病！你试试看，后面还得有许多的一定。

主耶稣是说，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不



是说信必得着的，就得着。掉一个头就不行。弟兄们，你们看见那一个窍门吗？真实的信心，都是“已成了”，是感谢神，听了我的祷告！

二、祷告的两段落

对于初信的弟兄，我有几句经历的话对他们说，在祷告上，要分两段：

第一段是从没有应许，祷告到有了应许；从没有神的话，祷告到有了神的话。所有的祷告，起头的时候，都是求神，一直求，一直求，花三年也是祷告，花五年也是祷告。像莫勒有一个祷告，一分钟神就听他；有的祷告了七年，神还没有听，他花了那么多的工夫在

那里祷告。这一段是祷告的期间。

第二段是有了应许，一直到应许的实现；有了话语，一直到话语的成功。在第二段里面，不当祷告，应当赞美。

在头一段里面，是祷告；在第二段里面，是赞美。在第一段里面，是从没有话祷告到有话；在第二段里面，是有了话就赞美主，一直赞美到东西拿到手为止。这是祷告的秘诀。

世界上的人，起头祷告的时候，手是空的，这是起点；终点是感谢神，东西来了，神听了我的祷告。世界上的人所看见的祷告只有两点：一点是我没有，我跪下去祷告；一点是我祷告，神给我东西。比方说，昨天我到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表。过

几天，主给了我一个表。这就是从空手到有东西，只有两点。

但在基督徒身上，当中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信，这是世人所无的。我祷告求一个表，到了有一天，我说：感谢神，他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我里面清楚，我有了；但我还是两手空空。过几天，表就到手了。教外人只看见两点，基督徒必须有三点，当中的一点不可少。教外人，只有无表、有表两点。基督徒在无表和有表中间，还有一点，那一点，就是神给我话，神给我应许。

在教外人中间，在属肉体的人中间，他们只看见无表、有表这两点。在我们中间，有表和无表之中分两段，第一段，从没有表到得着应许，第二段从得着应许到得着表。在无表和有表之间，就是有了神的话，有了神的应许。祷告的第一段，是求主给我一个表，祷告到有一天，神说：我给你一个表。你得着了应许之后，就赞美神。第二段，就是说，感谢主！你已经给我了。也许到第三天，到第四天，表才拿在手里。但是在灵里面，是前四天已经得着了；在手里面，是后四天才得着的。基督徒应当有这一个灵里面的得着。如果没有，你一点信心都没有，你一点属灵的窍都没有，你没有路走。

盼望初信的人，能够知道什么叫做信心，也学习祷告。也许祷告了三天、五天、一个月、一年，一直祷告下去，还是两手空空的，可是心里面有一点把握了，事情成功了。可是，那样还不够，还要赞美神，一直赞美到东西拿到手为止。换一句话说，人应当尽力量在神面前求，一直求到得着信心为止。可以说，头一段是从没有信心祷告到有信心；第二段是从有信心，一直赞美到有东西。或者我这样说，从没有东西到有信心，这是第一段；从有信

心一直赞美到有东西为止，这是第二段。

为什么分作两段呢？人从没有东西，祷告到有信心了，如果再祷告，信心就祷告跑了。所以，一有信心之后，就只能赞美，不能祷告，如果祷告，信心就失去了。从没有东西，祷告到有信心；从有信心，就赞美到有东西，不应该祷告了。如果再祷告，就会从有信心祷告到没有信心，也就没有东西。“必得着”是经历上的得着，“是得着”是在当中。信了不是祷告快得着，乃是要用赞美来催他，不是用祷告催他。神既说给我们，我们还能说什么？你里面一有把握说得着，你还求什么？只能赞美。在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经历，就是祷告到一有信心，就不能再祷告下去。你只能说，主，我赞美你！可惜有的弟兄没有知识，神已经应许了，还在那里祷告，以致祷告到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个最大的损失。

你守住那一个信心，赞美说，主，赞美你，你听了我的祷告！主，你前一个月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所以你们要晓得，《马可福音》11:24的话是何等的宝贝。全部新约，没有第二个地方像这个地方，将信心显明得这么彻底的。“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把这里的话分作三点：一是祷告，手里一个东西也没有；一是信，东西也没有；一是信心有，东西也有。初信的弟兄，如果能够看见这一件事，他就能真的知道什么是祷告。祷告在他身上，是一个厉害的东西。■

1 本文节选自倪柝声著，《祈祷与读经》第3章“祷告”。题目为本刊编辑所加。

个人灵修 —— 自我牧养的一种方式

文 / 游冠辉

清教徒牧师巴克斯特说：“基督徒的技巧和责任的很大部分，是做一个向自己讲道的好讲员……每周听别人讲两至三篇的道是比较合适的量；但是每天向自己讲两至三篇的道通常是太少了。”读到这话，我感到十分震惊、羞愧。今天我们离清教徒的标准太远了。一周听一篇道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是正常的。一周要听两三篇道，那就需要参加更多的聚会，或者上网或者找光盘来听。听别人讲道还好理解，可是向自己讲道，这怎么讲呢？其实，自我牧养就是向自己讲道。我们通过个人灵修、读经、研经、属灵阅读来获得圣经的信息，在默想中将这些信息融进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向自己讲道。如果我们养成每日稳定的灵修习惯，每天通过灵修我们可以向自己讲一篇道；如果我们每日读经的时候，能够默想其中触动我们的经节，也可以获得一篇信息；如果我们每天能读几页好的属灵书籍，我们又可以获得一篇信息。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忙碌的社会里，一天要向自己讲两三篇道的确不容易。但我想，一个人至少每天要向自己讲一篇道，这是我们每日的灵粮。这篇道可以透过我们每日的个人灵修来获得。

我们习惯于生活在喧嚣的世界里，总是以各种活动或节目来填满自己的心灵，不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面对真实的自己。安静能使我们脱离世界的喧嚣，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面对真实的自我，并通过默想和祷告回归到上帝那里。

“耶和華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诗 5:3）

如果你心里充满了忧愁和挂虑，清晨醒来的时候，你首先听到的不是窗外小鸟的啾啾，而是你心里的喧闹。起床洗漱之后，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到神的面前来亲近

他。将一天开始的时候分别出来亲近神，是为了让我们一整天都保持活在上帝面前的意识，就像将七日的头一日分别出来敬拜主一样，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怀着敬拜主的心过一周的生活。早上分别出来的这段时间是我们默想主的话语、倾听主的声音的时间，也是我们向主祷告祈求、倾心吐意的时间。我们心里牵挂的事常常会占据了我们的的心思。有时，我们一起来，便想去做我们心中牵挂的事。但是，在这个时候，你要抵制这种诱惑，记住，早上起来后的这段时间是你与神约定好见面的时间。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外，不要把这段时间用来做别的事情。

首先是预备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简短地静默祷告或唱诗敬拜来安静自己的心，除去心中纷乱的意念，放下心中各样的挂虑，让自己的心思能集中在主的身上。

灵修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默想神的话语，因为“默想是心灵消化真理以获得滋养和力量的途径”（巴克斯特语）。《诗篇》开篇就说：“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 1:2—3）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棵树一样，神的话语就是那溪水。没有溪水的滋养，树便会枯干。

默想不是通读，而是集中在较短的经文上反复思想。每次默想经文的长度一般为一两段。深入的默想则更短，有时候一个小时只能默想一两节的经文。

默想的第一步是理解经文的涵义。将要默想的经文读一两遍，先明白这段经文在上下文中的意思。然后反复诵读、观察、思想，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话语中的亮光。一些关键的经节特别需要反复诵读，每一遍可以把诵读时的重音放在不同的单词上。

“光必须发出热量”。光有头脑的理解还不够，还需要让显明出来的真理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心被真理激动，从而火热起来。这就是默想的第二步，巴克斯特称这第二步为独语(soliloquy)，就是在神面前对自己说话。换句话说，独语就是向自己讲道。把神话语中显明出来的真理热切地向自己传讲，让这些真理从头脑中进入到心中。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过程。我们借着默想，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用神的意念来更新自己的意念。

第三步是回应祷告。当我们头脑明白了神的道，心里被神的道所感，渴望活出真道，接下来便要借着祷告向神表达我们的悔改、感恩、颂赞、祈求等。在回应的祷告中，我们特别需要在神面前立定心志愿意顺服他的道，并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活出他的道。

例子：

灵修经文：

“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 5:15）

反复观察、诵读这节经文，我们可能看到以下几点值得我们进一步默想：（1）基督替众人死，也替我死；（2）他要我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他活；（3）他不仅替我们死，也替我们复活。

这些点都可以是我们默想的内容。我们可以默想每一点，也可以默想其中的一点或两点，当然也可以把几点结合在一起默想。

默想话语：

我原是个罪人，犯了很多的罪，是当被判死刑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受死，用他的

宝血将我买赎回来。我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基督的。我是基督的仆人，是他的奴隶，对自己的生命不再有主权。基督才是我生命的主。

过去，我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抱负。我活着是为了满足自己人生的追求，实现自己的理想。今天，我不能再为自己而活。他为我死，我为他活。

我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察验自己。

第一，今天，从总体上说，我是否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主？我活着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满足主的心意，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我是否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了神？如果没有，我就需要在神面前悔改，并反复对自己传讲，主为我死，我为主活。然后，借着祷告，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

第二，如果我整体的人生目的是为了荣耀主，那就需要察验，在我们实际生活的具体领域，我是否凡事以耶稣为主？我是否让主进了家门，但自己手里还攥着各个房间的钥匙，不把房间的钥匙交给主？我的婚姻是由基督来做主吗？基督是我家庭的主吗？我的钱财、我的时间是完全属主的吗？我说愿意为主而活，当主要我舍己摆上的时候，我真的摆上了吗？

我发现自己整体而言愿意为主而活。可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有很多方面，我并没有完全让基督居于首位，时时刻刻为他而活。在有压力的时候，我很想逃避，不愿意承担主所加给的责任。我还是想过得舒坦一点。还有，经上说，“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世代邪恶”，但我还是常常浪费时间，尤其在有压力或状态不好的时候。我还没有实际地将每一分钟都当做是属主的，当按照合主心意的方式来使用。……

回应祷告：

主啊，想起自己过去犯的罪，想起这些罪可能带来的后果，我心里感到不寒而栗。你用自己所流的宝血，涂抹了我的过犯，使我成为新造的人。当你以圣灵开启我的眼睛，让我认识了你的时候，我就在你的面前立下心志说：“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是顺境还是逆境，是结婚还是单身，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我都愿意一生一世跟从你。”之后，你又不止一次感动我，激励我重新确认对你的委身。今天，我依然对你说，主啊，我愿为你而活。可是主啊，还有很多地方，我并没有完全让你来做主。我甚至不愿意时时活在你的面前，因为活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就不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生活。有时候，我禁不住还是想给自己留一点空间，不让你完全占满我的生活。在面对困难和压力的时候，我很容易选择逃避。你为我受苦，但是我却害怕痛苦，不那么愿意为你受苦。主啊，求你不要厌弃我，帮助我一点一点胜过我的软弱……





寻找沉默百年的逃亡日记

文 / 沈颖

2011年5月，一条消息通过网络，牵动了海内外许多基督徒的心：在山西忻州，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当年建造的教堂即将被毁，据说地皮已被五台山的和尚花650万买去，要建寺庙和疗养院。

然而这座教堂并非无主之地，它的所有权属于英国浸信会。在一份寄给山西省有关部门的公开信里，美、英、中三国13位主内学者联合签名呼吁“救救百年教堂”。

12年前，仿佛被8位英国传教士回头瞥了一眼，目光直射入心，撞出了一簇照彻灵魂的火花似的，美国学者张海燕从此记住了忻州。

彼时，在美国底特律克莱斯勒技术中心任高级专家的他，去密歇根大学借书，偶然从一本由英国伦敦宗教读物协会1904年出版的《光绪庚子年在华殉难者》中，读到百年前席卷华北的义和团运动时，8位被杀的传教士在逃亡途中的日记片断。

同为基督徒的他开始收集和翻译与这段史料相关的各种文献、报道和资料，整理出《忻州日记》，试图立体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真相。

众人的目光就此被引回一百多年前的忻

州，那些以自己的生命浇奠在这块土地上的传教士们，通过他们在逃亡中留下的日记，重新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仓促逃亡

庚子年六月初一（1900年6月27日），在新任山西巡抚毓贤的怂恿下，义和团在太原烧医院、毁教堂、抓捕传教士。

1900年6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三。

这天早晨六点，信使带来一个惊人消息：两天前，太原府爱德华医生（Dr. D.H.Edward）的医院被义和团烧了。女传教士爱蒂丝（Miss Edith A.Coombs）本已逃生，但发现一个住院的中国小女孩还没出来，就返身冲进燃烧着的房子，帮她逃出来。爱蒂丝再次出现时，额上遭铁器一击，仰面倒进火里。为了防止她爬起来，有人把木椅和一扇拆下来的门压在她身上。第二天，人们找到她烧焦的骸骨，把她埋在院子中央。义和团和清军到处寻索传教士，并把守了太原城门以防止他们逃走。

传教士们是中国社会现代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参与者。

太原传教站 1877 年于山西旱灾时建立。灾情自 1876 年爆发，一下旱了 5 年，河干地裂，几百万饿殍遍地，野狼因饱食人肉，竟肥得跑不动路。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等进入山西赈灾，灾后寻找预防措施，建议开发矿藏，兴修铁路，兴办教育，启发民智。因为当时山西人吸食鸦片成瘾，传教士又建立戒烟局。1902 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赔款办学，创办了山西大学。

1887 年，邸松牧师（赫伯特·狄克松）来忻州传道，同时开办诊所、男女学校。在忻州传教士中，邸牧师最年长，他早年失怙，在伦敦孤儿收容学校长大，经过三年大学训练，又经两年医药和外科训练之后，他被浸礼会派往刚果，在非洲忘我工作，炎热的气候摧毁了他的健康。两年后，他因四肢麻痹被送回英国治疗。康复后，医生不准他回刚果，他和身为护士的未婚妻威廉斯小姐结婚后就申请来华。

马牧师（威廉·麦克拉奇）是苏格兰人。一次，他听传教士回国述职演讲，中国抓住了这个少年的心。而马牧师的太太克拉娜，从小就梦想成为传教士，她与马牧师在上海结婚之前，已在中国传教几年。

在太原的传教士恩牧师（托马斯·安德伍）夫妇最近来忻州帮忙。任教士（贝茜·任诺）来华时间最短，才 9 个月。燕牧师（西尼·恩纳尔）只比任教士早来两个月。

形势骤变，邸牧师决定带大家到忻州西南偏远山区的刘家山去避难。自此，8 位传教士开始了长达 27 天的逃亡。

这是逃亡第一天。狄克松夫妇心里特别思念在英国的孩子们。狄克松想，要是在中国为主殉道了，孩子们应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又是怎样死的，就开始不间断地写日记，其他传

教士也给亲人们写下了日记。

传道站有两匹马、两辆车，还有一头小驴驹。一行人悄悄从西门出了忻州城，这一带狄克松很熟，走了三十多里地，进入一个又深又窄的峡谷，不能再驾马车了。大家把一部分行李藏在一个山洞里，等在那儿，由几个中国基督徒领他们去藏身处。

半夜时，他们牵了毛驴来，大家顺着干涸的河床前行，狄克松太太病得很重，在马上摇摇晃晃的。拂晓时分，便依稀看见了一个山村，叫刘家山，他们要藏身之处。

重走当年逃亡路

109 年之后，2009 年 5 月，已在美国普渡大学任教的张海燕联系到忻州老记者、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任复兴先生，相约重走忻州传教士当年的逃亡路线，沿途采访村民，对照传教士日记和忻州教案的文献逐一考察。他想写一本关于这段历史的书。回国之前，张海燕仔细比照互联网上的电子地图和传教士日记，逐一确定了他们的逃亡路线。

2009 年 6 月 5 日，他们到了庄磨镇南张村。南张村坐落在牧马河北岸，牧马河是滹沱河的一个支流，百年前春汛时节牧马河悠悠流过河谷，可现在已经断流。

张海燕停下车，想搜集村民们对当年传教士或信徒的回忆。刘振中是教会负责人，村里大约 50 人信教，主日时常坐拖拉机去城里聚会。刘振中并不知道在义和团运动时殉道的张治国，但他从一位 80 岁老汉处打听到，张治国是南张村教会创立人，被义和团杀害后，其尸骨被埋在村外“洋人坟”。

而今，张海燕坐车走的是柏油小路，与当年传教士们在牧马河干涸的河床上的路线大致平行。

传教士逃亡第二天，天既放亮，他们不能



邸牧师夫妇离开英国返回忻州之前（1898年）
与4个孩子的最后留影

进刘家山，那天正值农历六月初四人们祭关帝生日，村民们抬着纸马纸衣去赶付家庄庙会。为了不给刘家山村民们带来麻烦，传教士们退到山里，在峡谷里藏了一整天。

庚子年春夏旱情严重，直至五月滴雨未降，到处传言：“老天不下雨，都是洋人搞的鬼。”

付家庄祈雨唱戏当日下午，却下了一场雨。戏一唱，各村义和团就起来了，村民们开始随伙仇教。而邻近的刘家山因为信教，不赶庙会，不看社戏，也不分担庙会、唱戏的费用，为首的付家庄自然憎恨起不肯附从的小小的刘家山。付家庄后来派人去忻州城迎神拳，请他们来惩罚、杀戮刘家山的信徒、村民们，以泄私愤。

传教士们逃亡第二天夜晚，刘家山的几位弟兄来接他们，带了火把，肩扛手提地带着他们的什物，颠簸了六里多山路，进了刘家山。

一百多年过去，张海燕向村民打听刘家山。他们说，刘家山改了名，现在叫“幸福村”，年老的村民告诉他们，刘家山有“洋人窟”，这就是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

村民说，村里原有150多口人，但如今大多数人已搬到山下平坦之地。向几个村民打听传教士的往事，山村教师戎双文的妻子带他们去看了以前传教士们盖的教室。

教室建在一块稍为宽敞的山坡上，是山村唯一用窑砖砌的房子。经过一个多世纪风雨侵蚀，状况尚好，只是门窗有些破旧，两个房间，一大一小，大的可作上课或聚会之用；小的作祷告房。一个多世纪了，即使在传教士们离开中国后，这个教室还在用，直到近年，没小孩子上学了，才关了门。

当年传教士们到刘家山后第一天，出于对村民们的信任，12天之久，他们栖身在信徒兰

万牛家中。第三天夜晚，他们就在信徒们协助下，在后山坡挖藏身土洞。

翻过几道陡峭山梁寻找“洋人窟”，张海燕两只手臂上划出了网状交叉的血痕，他想起逃亡者中最年轻的女子任教士在写给浸礼会信中的一句话：“神给我们奇妙的力量和安稳的脚步，作艰难的攀登。”

“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张海燕在追踪这段史实时，第一次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年大多数村民信了基督，在反洋灭教的狂潮中，信徒甚至普通的村民都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传教士们，而且官员们也不全在逼迫，其中也不乏同情者。

1900年7月5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九。

安叔根和张林旺出发到保定府、北京或天津，找人救太原和忻州的传教士们。安叔根的草帽缝里藏了一张便条，写着太原和忻州的情况。

他们上路没走多远，就被义和团截住了。没费多大劲，义和团就知道了他们是忻州传道站的厨子和帮手。安叔根对为首的拳民说：“我是五十岁的人，信耶稣的，今日就是我的死

期。只是这后生，刚满十六岁，还没活人呢，求你们开恩让他回家去。”为首的把眼睛眯起来，打量着这两人，稀奇他们竟面无愧色。他冷笑几声，还没发话，就听见少年说：“安大伯，让我和你一起死吧，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在“洋人坟”传教士纪念碑附近东南方，有一块石碑，拭去尘土，碑文显露出来：“浸礼会道友静乐县人张公讳林旺之墓”。

张海燕断定这就是他在《忻州的日记》里写过的乡村少年张林旺的墓碑。张林旺才16岁，是传教士的助手，教任教士说忻州话、熟悉忻州府乡路，传教士在日记里称赞他是“一个聪明的少年”。据 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 记载，张林旺被杀后，尸身被扔进火里烧了。

逃亡第13天，刘家山一个村民到邻村看望女儿却被义和团打了，义和团放话说，后天要到刘家山来。此前两天，太原被囚的传教士及其妻儿们被毓贤杀尽。不仅传教士们再不能藏身刘家山，就是刘家山的信徒和亲洋教的村民们也不能呆在村里，被抓住就意味着死亡。幸而此时，后山的土洞已挖成。传教士们卷起简单行李，带上些干粮和两把防卫的手枪，在夜半时转移到新挖的洞里，村民们随后逃走。

1900年7月11日，星期三，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五。

狄克松盘算了一下，附近每个村都有四十到六十个义和团。加上忻州出来的义和团，会有上千人。刘家山村民就要遭难了。这一两个星期，传教士们犹如在一个避风港中，刘家山的信徒甚至普通村民对他们有非常的情份，自给不足仍然满有爱心地供给他们，冒着杀头危险保护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连累了村民。

中国传道人何全奎要到忻州东面去探路，看能不能为传教士们找一条到海边去的路线，他今年六十岁，以前曾是一家染房的股东，信主后放弃了经营得不错的生意，作了薪金非常微薄的传道人。

邸牧师怀着感恩的心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们被杀，请不要忘记回报刘家山的村民们，他们把所有的无保留地给了我们。”

刚来中国9个月的传教士在给浸礼会的短笺中特别提到：“中国基督徒是了不起的——刘家山村民和我们的助手们，在试炼之中都是忠信的。”还有些基督徒，因为放心不下传教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几十里、上百里之外到刘家山看望他们。

1900年7月13日，星期五，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七。

何全奎老汉到了他妹妹家的村子，想不到村子里几个十八九岁青年，搞起了义和团。他们认得何老汉，把他抓了押到城里。

忻州县衙新上任的徐桂芬，急忙升堂。何老汉戴着手铐，拒绝说一个字。两个衙役把何老汉按在地上，一个衙役挥动竹杖，边打边嘲笑他：“疼不疼？”旁边看热闹的也附和嘲笑他：“你要进天堂了呢！”一直打了一千杖，还没应声。最后，他们把不省人事的何老汉上了脚镣，扔进监牢。四天后，何老汉死于狱中。

在最没指望的日子

张海燕很想知道，在避难刘家山，藏身“洋人窟”的二十多天，传教士们面对生死考验，后悔过吗？惊惶不安过吗？如果除了死亡别无选择，他们会怨恨他们所服事的主吗？

在逃亡后的第二个主日，在似乎最没指望的日子，传教士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竟没一个人后悔来中国。来华不到一年、还在学习语言阶段的燕教士，留下了充满平安和感恩的日记：“如果主要我们前行、去经历严酷的试炼，我们已经准备得充分一些了。深信那有完全的智慧、完全的爱的主，必有最好的安排……如果为了主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加被炼净，我们就更加赞美他，因他看我们值得为他的名受苦。”

妈妈，主是我的平安。”

在写给母亲的信里，燕教士说：“我不后悔到中国来，虽然我的生命也许是短暂的，但它有意义，因它顺着主的旨意。愿主的旨意成就！我恳切地求主的拯救，也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拯救，但我们经过更深的逼迫，也许更能荣耀他的名……当号筒吹响时，我将欢乐地跟随我主，不是以我自己的能力，乃是以他赋予软弱者的能力……主所赐的平安！我们要天天经历它，更多地经历它。如果主呼召，我们将快乐地回答：我在这里，请按你的心意而行！”

妈妈，明天是主日，愿主与你、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不能在地上相见，那就等到我们在天堂同声赞美主时吧！”

来华传教四年的马牧师，留下遗言给母亲：“我们处在丧生的危险之中……这是中国黑暗的时刻！但如果所有的传教士都被杀了，这又将会何等地感动教会！如果这是神的方式，以此将福音传遍中国，我们就决然准备好，为福音的缘故而死。我们中没有人愿意死，但我们都诚心地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1900年7月12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六。

晚上七点，四个村民来看传教士们，告诉他们太原的消息：那里的传教士们周一都被杀了。山西巡抚毓贤到场，没人在屠刀面前畏惧，他们平静地走向刽子手，甚至没一声争辩，洛维特太太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她怀里还抱着幼小的杰克。

她在被杀之前喊出一个谁也不敢回答的问题：“我们到中国来，带给你们耶稣救赎的福音，我们并没害你们，是为了你们的好处，可你们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们？”行刑的士兵一声不响，第一刀落在她的脖子上，但砍得不深，她没死，只好再补上一刀。婴孩杰克随后也被杀了。在太原府殉道的共46人。

“你们蒙召原是为”

从史料中，张海燕获知了传教士们的结局。

据《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和 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 记载，6月25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6月29日，传教士们被官兵捆绑着押回忻州，关在大牢两周之久。

巡抚毓贤派人去太原领10个兵勇来忻州，7月15日，假意传话要派兵护送传教士们逃往天津。传教士们从监狱出来，见州府备好4辆车，就信以为真，坐上车行至城东门瓮圈内，内门和外门一齐关了，忽然有灯笼从城上垂下，都司海英命兵丁放炮数声，又大声命令：“杀！杀！”早有一群义和团等着，伏兵冲出，传教士们一一被乱刀砍死，尸身被暴于牧马河河滩。

令人唏嘘的是，将邸牧师等诱入瓮城之内的忻州守兵的官长，曾被邸牧师救治过。为了让传教士不起疑心，他跪下求他们跟他走，说他会用手中的刀舍命保护他们，不料一入瓮城却杀心四起。

而忻州城一位非信徒学官朱鸿镐却于心不忍，冒死掩埋了8位传教士的尸体，随即逃走，以避义和团惩处。张海燕查找到这件善举记载在恩牧师故乡的刊物《巴思日志》（1901年1月12日）。

庚子之乱后，传教士们殉难的消息传至英国，已退休回乡十年的老传教士德治安不顾体弱多病，毅然和因回英国述职而幸免于难的老传教士苏道味牧师返回忻州，接续未竟的医疗教育事业。

而今，“洋人坟”周围只有几个新添的坟茔，墓地的北侧和西侧已改作耕地，一排排高粱苗开始拔节，残损程度不一的传教士纪念碑石散落在方方正正的基石四周（传教士纪念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毁坏）。

任复兴告诉张海燕，几年前邸牧师后人看望过先祖墓地，庚子之乱之前两年，邸牧师的



4个孩子被送回英国上学，幸免于难。

这座纪念碑不仅以中英两种文字记载了庚子教难中忻州8位传教士殉难事件，更令人感动的是，特别载入了忻州府40位中国基督徒被义和团杀害的史实。

碑冠上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给你们留下榜样”，其上有一行小字注明出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外国传教士及妇幼241人殉道，而中国基督徒有23000人殉道。山西是全国仇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最多的省份（据解放前曾任山西大学校长的教育家徐士瑚先生的《山西大学创办人李提摩太传略》考证，山西殉难的新教传教士及其妇幼占全部外国殉难者的79.3%；而据山西寿阳宣教会英国传教士叶守真医生(Dr. E.H.Edwards)和陈守谦记载，山西中国信徒和慕道友被杀害的人数，有七八千人之多)。

考察时，张海燕得知，有一家忠心看守洋人坟的中国信徒姓张，在此一住二十多年，从晚清到民国。

任复兴先生告诉他，张家的女儿张玉叶从教会中学毕业后，在李提摩太修建的太原桥头街博爱医院当护士，终生未嫁，专心服侍主，年过九旬安息主怀。

返回普度大学后，不忍纪念碑被毁，技术专业出身的张海燕根据他画的传教士纪念碑石残片散落图，并有关照片及其实测尺寸，图测计算了现有型石残片的复原尺寸，确定了

碑身的型石组合关系和碑冠的型石组合关系，终于成功复原了传教士纪念碑。

此次寻访之旅，张海燕验证并绘制了传教士的逃亡路线图，他也欣喜地看到当年传教士建立的教堂遗址仍在。

1899年1月，浸礼会李提摩太牧师在忻州三家店购地四十余亩，作建堂之用。教堂接近竣工之时，义和团运动勃兴，遭到抢劫、毁坏。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教堂得以修复重建。教堂的屋檐微微上扬，如同振翅冲天的大雁。

1900年7月21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是夜，一位村民冒险看望他们，他们就把日记和信件交给了他。

村民把他们的日记、书信埋在地下，待义和团之乱平息后挖出来交给了新来的传教士，转交给殉道者的亲人。

2009年底，美国的张海燕与英国邸牧师的重孙女 Prudence Dixon Bell 联系上了，她和她的先生于2006年曾访问过忻州（Prudence的先生 Rev. Canon Stuart Bell 牧师是英国威尔士的教区长，到第四代，邸牧师的后人依然在服事上帝）。

2011年5月底，张海燕将赴英国与邸牧师的重孙女 Prudence Dixon Bell 见面，邸家后人将把邸牧师当年在逃亡中留给孩子的原始日记交给他阅读。

这些逃亡日记被艰难地保存了下来。■

（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作者特为本刊作了改写。）



我所认识的王明道先生

文 / 林献羔

王明道先生是神在近代中国所兴起、所重用的仆人。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而我对他的印象也很深。凡读过他的《五十年来》和其他著作的人，无不敬佩他。从他在家开始聚会直到建堂，再到解放初期，他一直被神大用。他对神忠心，处事谨慎，对人和蔼，讲道有力；许多布道家各有不同的特点，而王先生的讲道特别清楚。

1991年7月28日，王先生被主接去，息了他在世上的劳苦。当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给上海的王师母刘景文女士打了长途电话，她证实了王先生于7月28日上午九时（夏令时间）去世的事实；当时，他们正在聚会，那个聚会立即变成“告别聚会”。感谢神！王师母是充满喜乐的。

我在广西梧州建道圣经学院读神学的时候（1942—1944），就开始读王明道的著作。我一直喜欢读他的书，凡他所写的书我都卷不离手。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林保罗常说我所写的文章是“猫屎文章”，很臭。但我以

为我的文章很“红”，因为老师用红笔修改的比我所写的还多！但自从读了王先生的文章后，我虽然学他的写作很不够，但却有改善。不过，这一点的影响是算不得什么的。

1949年后，王先生一直屹立不动。他的《五十年来》是分期在《灵食》季刊刊出的。当时，我很喜欢阅读他的作品。当读到他在日军占领北京时所写的“在火窑与狮穴中”一文时，我十分敬佩他在日本侵略时期的坚贞，他突破了许多外在压力，坚决不参加“基督教团”。于是在面对是否加入三自的压力时，我写信问王先生：“你现在有没有参加三自。”他回信说：“我现在仍坚持‘在火窑与狮穴中’的态度。”这就给了我一个坚定的方向。

我在给王明道的信中略做了自我介绍，说我的父亲是林保罗。他在回信中说：“林保罗是你父亲！我和他很熟识。他是广州、香港培灵会的讲员，我在1936年到广州主领培灵会时，到过大马站；我有病，他还服事过我。”

以后，我就一直和王先生通信，我把我

的书寄给他，他也把他的书寄给我；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认为我没有走错方向，其一，是因我有个好父亲。我父亲是美国宣道会宣信博士的学生；他在宣道会神学院毕业（Nyack, New York），曾在澳门白马巷浸信会、九龙城浸信会任牧师。其次，是我入了建道圣经学院和读慕迪圣经函授课程（Moody Bible Correspondence）。第三，是因我出来服事时，认识了王明道先生。他不只信仰纯正、生活严谨，更重要的是持守真道、尽忠为主，在末世教会中是个难得的好榜样。出于以上的原因，特别是王先生的缘故，我没有走错路！

1953年2月19日在北京时，有机会与王先生同往参加基督徒学生会的聚会。那天早上，王先生讲《但以理书》第3章。当时我很留心听课，并大受感动，发出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的敬佩：“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王上10:7）我想：“王明道就是王明道！”王先生那几天正忙于写稿，出版《灵食》季刊，于是我把他的书中那些没有读过的拿来细读、做笔记。我把他所有的著作（指我在广州找不到的）都读完，无一遗漏。王先生说：“我亲自校对稿件，每页校对七次，希望每本书没有一个错字；但可惜，每次出版后，还有两三个错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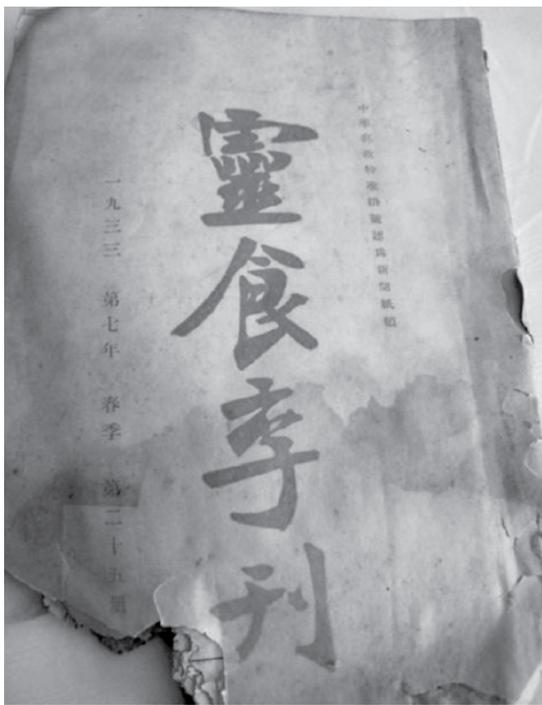
全部稿件送出付印后，他才有机会和我交通，使我不但在灵性上有长进，更重要的是信心被坚固，希望我能至死忠心。而在付校后，他才抽时间带我去游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名胜。我到北京时，王先生说：“你才29岁，我们看你的书以为你已有50岁了！”王师母弹得一手好琴。有一个晚上他们叫我弹琴给他们听，一同赞美神。

我住了两个星期，要回广州了。王先生

叫我久住一些日子，但我不能久留。在我辞别的早上，王师母替我们拍了一张合照，然后王先生送我到车站。王先生对我说：“近年来我很少送人到车站，因为很多人都变了节。”这次他送我前行，还买了月台票。火车开得远了，我虽看不见他，但还看见他的手在扬个不停。我想，我实在算不得什么，但他竟这样待我！

在我回广州后，就经常与他通信，而他在信中勉励我要忠心事主，坚持到底。直到1955年8月8日，正是王先生结婚纪念日那天，他被捕了！那时，我亦知道我们被捕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1955年9月14日晚上，王国显、张耀生和我首批被捕。王先生和我的合照都被搜去了！同年10月间，预审员把一本《天风》给我看，内中有王先生的“检讨书”；我真不明白王先生竟会这样地写检讨。这检讨书没有



王明道主编的《灵食季刊》

帮助我，相反还给了我坏影响，这是王先生的一次失败；后来，他比我们先出狱。

他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往三自会去，准备把教会带到三自的路上去。自他去三自会后（按：参照赵中辉实地访问王明道的记录。他的访问记录可信度很高），有许多信徒就不到基督徒会堂了！从此，王先生就感觉到信徒比他刚强。他一直呆在家里，没有领聚会，甚至准备结束他的一生。王师母在家看守他，她不愿看见他发生什么不幸的事。经过一段时间，他醒悟过来。他起来了！他宁可再受苦，也不愿意做个逃兵。

1958年4月，王先生夫妇再次被捕。他们在山西大同被“改造”。这回王先生在狱中表现坚强，并没有丝毫妥协。他撤回“检讨书”，曾多次上诉而未蒙答允。这次他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80年，被改判为一年有期徒刑，提前一年释放。王先生拒绝获释。他说，我在人面前无罪，有一年徒刑也有一年的罪，我不出监。后来监内负责人把他送到山上一处房子里，这房子原是为安置那些被释放的犯人，使他们住在那里等待家人来接；因为那里没有坐塌，这对于王先生这样一位八十岁的老人来说，真的很难忍受，他于是写信给他上海的儿子，让他前来接他到上海。最先他没有户口，慢慢就落籍于上海了。他就上海开设他的家庭聚会，凡来的人他都接待。

我在监房的时候经常要填写表格。当我填到社会关系的时候，除了我的亲属外，我总得填上两位，一位是北京的王明道先生，另一位是九龙的胡恩德先生。王明道先生是全国“基督教反革命头子”，我的罪状之一是“王明道的爪牙”。当青岛一位弟兄访问我之后，他把这事告诉王明道。王先生说：“万万

想不到献羔还站在我旁边！”

1982年9月，王先生来广州医治眼病，我叫一位梅承恩姊妹往医院见王先生。他本打算在动手术后与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交通，可后来我们听说广州不敢替他动手术，因他年高82岁，若有什么不测，会在国际上产生不良影响。于是，医院打发他回上海去；那天早上，他派人来叫我去见他。我立即通知王大伟等，几人前往梅姊妹家里一同交通；当天下午，王先生下出租车时，我上前扶他。他问：“你是献羔吗？”我说：“是。”他说：“我现在看不清楚了。”下车后，我们前往梅姊妹的家里。在上屋外石梯时，王先生问：“这里是大马站吗？”我说：“这是中署前路一号三楼梅承恩家里。”

王先生一生经历过五个时期：清初、国民党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胜利的光复时期和解放时期。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被捕算是最大的失败；当他第二次被捕时，他已站起来了。当他第二次出狱后，他常对人说：“我是鸡叫前的彼得。”而现在我可以说：“他是倒钉十字架的彼得！”他也可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后4:7—8）

他息了劳苦，这真是好得无比了；但对中国教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在同路的人中，又少了一个，而且所少的是一个末世不可多得的勇士！我们会感到孤单！但有主的同在就不觉得孤单了！除了他一点的软弱，他的一生可说是我们的好榜样，正如保罗所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11:1）



被劳动改造的岁月

文 / 杨毓东

一、初到北京

1948年，大批的传道人早就已经进了关，我因为新婚，所以离开较晚。时值内战，东北与华北之间铁路交通断绝，为了我们能进关工作，我弟弟卖掉了口粮，给我们买了飞机票，实际上那是一架货机。

7月30日，我们终于踏上北京（当时称北平）的土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家当就只有30斤行李和10块美金。与我一同事奉的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他是通过别的途径，费更大的周折才来到北京的。

我们有幸能够来到北京，深感是上帝的恩典。到了北京之后，除了对这个古都的名胜大有兴趣之外，就是对这里的教会进行了全面的观摩和了解。北京教会当时有16个宗派，也就是说由不同的外国差会形成的，如英国的伦敦布道会、圣公会（原名安立甘会）、救世军；美国的长老会、卫理公会、公理会、安息日会、

远东宣教会；分别由美国、挪威、瑞典三个系统组成的神召会等等。这些差会各行其是、各自为政。

此外，还有一些中国基督徒自办的教会，如基督徒会堂（王明道主持）、基督徒聚会处、真耶稣教会、圣城新教会等等。

当时北京共有66个礼拜堂，其中有些礼拜堂修得很漂亮，但聚会的人数并不多。超过100人的有几处，最多的是王明道在东城区史家胡同的基督徒会堂，有400人。最少的只有几个人，甚至于根本就没有聚会，北京这66座礼拜堂可以说是非常冷落。

北京有好几所神学院，宗派不同，程度不等，有高有低。其中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是北京最重要，也是学历最高的神学教育学府，正式成立于1919年，原名“燕京大学神科”，1925年改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该学院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学习3年神学课程，学成毕业生获神学士学位。其次还有卫理公会创办

的北京神学院，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4年；公理会联合卫理公会、长老会创办的联合女子圣道学院；神召会的真理学院；远东宣教会圣经学院，也称为圣洁教会的北平圣经神学院；此外还有安息日会办的一所三育学校，培训教牧人员。

各公会大多都有自己办的普通中学，如公理会的育英（男校）、贝满（女校），还有卫理公会的汇文（男校）和慕贞（女校）。其名声、质量都是当时北京中学里最好的，所以受到社会的好评和承认，品学兼优的学生都争取进入教会学校。

北京教会有不少医院，出名的有卫理公会的同仁医院，分男院、女院；有长老会的道济医院等等，各公会办的医院总共有7所。此外还有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圣经会等基督教团体。基督教刊物则有《灵食季刊》、《恩友团契月刊》、《田家》半月刊等等，可谓应有尽有。

这是不是说北京教会就完美无缺了呢？远远不是。因为我认为北京教会有几个致命的缺陷：第一，一些教会的高层领袖虽有知识，但没有灵性，我不敢说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的出国留学，还有好几名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他们的派头十足，却没有传道的热情，生活优越，脱离信徒。第二，北京教会有很多满族八旗子弟进入教会当了牧师。他们祖上多为清朝皇族，吃皇粮俸禄，游手好闲，架鹰提鸟，只知享受，不知劳作。虽然清朝已经覆灭了，但是这些没落贵族、遗老遗少恶习不改，劳动无力，讨饭怕羞，还要追求奢侈的物质生活，一些投机者便纷纷趁机进入外国人办的教会，靠吃教过活，有很多人还当上了牧师。这种情况当时在北京比比皆是，拿我们长老会来说，就有许多八旗子弟，有的作传道人，有的当了牧师，有的当了长老。他们能够作一个虔诚的信徒，刻苦而热情地传道吗？就我所

知，在教会作圣工的八旗子弟中很少有尽心竭力去做传道工作、为主忠心献身的工人。这也是北京教会一个致命的缺点。

但这并不是说北京教会没有好牧师，这里也有热心传道、虔诚信主的好牧人，另外从外地来了一些牧师和传道人，在信仰、生活、工作方面都有很好的见证，他们多少改变了一些北京教会的不佳状态。

以上就是我初到北京时对北京教会的观察和评价。

东北苏格兰长老会把我和那位同学介绍到北京的北美长老会，但是那里的牧师们持有排外思想，他们勉强决定给我们三个月的实验期，可是由于当时内战，北京城被共产党军队围困，三个月实验期满，他们自顾不暇，就把我和另外的同学无情地解雇了。我们怎么生活？往哪里去呢？当时北京长老会的外国牧师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只要我们愿意，他们可以把我们送到世界任何的地方，但是我想我传道要在中国，中国人必须在中国传道，所以没有接受他们的好意。

后来我的同学结婚有了孩子，生活无依无靠，于是就把自己穿的用的拿到破烂市去卖，做起了小生意，勉强维持生活。后来共产党南下工作团招收工作人员，他就考上了南下工作团，里外周转，成为一个随军的记者，他的文学功底还是很不错的。后来他到了朝鲜，叫他批判基督教，被他拒绝了。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后来他得了心脏病，终于在五十岁出头就离开人世了。

我和妻子在西城新街口教会只是临时居住，并不是那里的工作人员。等到1949年初兵临城下，新街口教会一位来自外地的青年传道人不辞而别，教会的长老、执事们也不来教会了，那里的聚会当然就自动停止了。新街口教会有礼拜堂，还有很多的房子，院子也相当大，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时候，当时党、政、军

都想占用这些教会的房子，既然没有人负责，我就自动出来应酬、交涉这些事，因为教会是主的，我有这种责任和义务。

由于对未来的担忧，当时有很多传道人改行，也有朋友介绍我去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我自己则考虑到中学教书比较合适，身为基督徒是不能担任讲授无神论的语文、历史等文科教师的，那么教数学总应该不涉及信仰问题，于是我便买回一些数学参考书进行准备。然而，圣灵紧紧抓住我的心，良知的争战使我战胜了未来的担忧，决心终生献身事奉，最终放弃了当教师的计划。这个决定，使我遭受了几十年的苦难。

二、事奉之途

等到共产党的政权逐渐稳定下来，也宣传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时候长老、执事才陆续回来，教会的聚会也开始恢复了。他们见我这个 28 岁的年轻人还是真正信主传道的，于是便请求区会批准我在新街口教会主持工作，就这样我在新街口教会一干就是十年。

新街口堂始于 1915 年，是长老会鼓楼西堂的外堂，1925 年正式成立堂会，1927 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改名为中华基督教会新街口堂。

我在新街口教会开始工作之后，就进行了改革，因为过去那里有两个长老、一个执事，长老之一是满族旗人，主要负责教会事务，执事是拉洋车的，他们经常聚在教会里喝酒聊天。我认为这样的人组成的长老执事会不能代表信徒意愿，也不能为主做工，所以我就逐渐把长执会取消了，成立堂务委员会，或者叫堂议会，让全体信徒民主选举有德行担任同工，民主管理，吸收那些真正热心信主之人来管理教会。教会宗旨绝对自立自养，不接受外国差会的资金也不出租教会房屋（当时有的牧师靠房租养

尊处优），经费全部仰赖上帝的恩典、信徒的奉献。经调查统计，当时北京真正自立、自养的只有 12 个堂，新街口堂就是其中之一。教会工作按照基督的精神改革，体制逐渐完善，工作也就顺利起来，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十年间这个教会一直都非常稳定。我在这十年间虽无大的建树，但在忠心上于神于人都问心无愧。特别是对教会的民主管理，取得了初步的经验，为后来中国教会的改革模式，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探索，但也是十分有益的探索。

当时很多大教会的青年团契都停办了，新街口教会却成立了青年聚会，参加者有医生、教员及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当然那时候大学生被控制得很严，来教会的还是比较有限的。我们每年到春节期间，就张灯结彩（因为礼拜堂是临街的），召开新春布道大会，在当时北京没人敢这么做。此外还坚持过圣诞节，来参加的人能超过 20 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基督徒过圣诞节压力很大，新街口堂能如此行，当时在北京是唯一的。我们有时候请其他教会有灵性、有名望的牧师来开灵修会和普通的布道会。每天早晨都有晨更会，九点打钟，信徒来灵修一个小时，然后开始各自的生活和工作。

我刚接手时教会规模很小，全部信徒仅 30 多人。后来逐渐发展到 130 人，我每月都轮流去信徒家中探访一次。除带领礼拜、家庭会、青年团契（妇女会由我妻子带领）之外，打扫教堂，乃至冬天生炉子都由我亲手去做。为了发展教会，生活上我拒绝接受区会的补助，而且也不接受信徒对我的任何捐献，让他们将奉献全部交给教会，只靠我的妻子参加医院的工作来支持我工作和养家。后来信徒逐渐增多，奉献也逐渐增加，所以教会才每月给我 50 块钱的生活费，而且又请了一位女传道人与我同工，教会就这样逐渐地发展起来。

三、成为“右派”

“十年一剑，砥砺以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树立的凌云壮志。我既然到了北京，并开始事奉，就一心一意要用十年功夫装备好的这口为主工作的宝剑，施展一番。可是我在新街口教会的表现，却引起当时政府管理部门和三自机构的不满，三自的那些“专业人员”把我看成异己分子，无论什么学习会，我都坐在被告席上。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一时间举国上下开始“鸣放”，沸沸扬扬。一些教会领袖也在不同场合发言，指出中共并没有真正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可人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信誓旦旦的“双百方针”，到了1957年夏天突然一变而为“反右派斗争”。为了配合这突如其来的局面，北京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于12月26日开始举办“北京市基督教界社会主

义学习会”。我也应邀参加，经过学习、引诱、让你说话、让别人揭发；当开始批斗的时候，我在我们那个小组会上第一个被打成右派，从此这个学习也就不允许我参加了，同时不准我参加教会工作，而我也只能面对这种无理的对峙。既然热心传道不被政府所接受，也受到三自积极分子的敌视，终止了我为主做工，我该怎么办呢？当时只有默默地祷告，准备自己忍气吞声。记得在第一次教会大门对我关闭，不许我参加礼拜的时候，我带着妻子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痛哭一场，那是我有生以来两次痛哭之一，另一次就是我母亲去世的时候。这两次都是触及灵魂的痛哭，虽然平时也经常落泪，但与这两次相比都算不了什么。多少年来风雨无阻地做礼拜，突然作为一名基督徒连敬拜神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其伤心程度可想而知。

1958年7月15日，学习会结束，学员中被划为右派的基督徒有45人。教会揪出来划成右派的人相继增加，所以又把这些被划成右



派的人组织起来进行专门学习，其中神学院的三自主席王梓仲也在其中，这些人和我一样都落到囚犯的地步。

右派学习的时候，让我们向党交心，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我们心里的反动思想，以及犯罪的行为一一不落地向党交代，而且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至少要写 500 条，我是一个城实的人，要我写 500 条，我就写了 510 条。就是把我有生以来遭遇的一切，包括信仰上的、政治上的、在当时那个环境当中的有些认识，比如说对当年苏联军队在东北杀烧淫掠和当时苏联专家在中国的霸道行径的反感，我也都交代了。这是我的爱国民族主义的表现，以后才知道毛泽东与苏联的决裂，也是早有此心，由来已久的。

他们说交心没有罪，说出来就没事了。结果这些交心的人，以我为首的都变成有大罪的人。这在当时叫“引蛇出洞”，实质上就是赤裸裸的欺骗。我先是被降职减薪，停止工作，后来处罚继续升级，撤职查办，直到会后宣布我被判劳动教养，同时开除出教会，我连作个信徒都不行了，还要去接受强制改造。从此我看清了他们言而无信的嘴脸。

这是受苦受难的开始，也可以说迫害之火已临到我的身上，当然受到相同处置的人还有许多，有的甚至被判刑，最严重的有两个人，他们被判了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最高者 20 年，还有些判 15 年的，如王明道。

既然在政治压力之下不能反抗，就必须接受这个迫害之火，先划右派，接着被捕入狱。当时有一个特殊的办法即按照《劳动教养条例》（这是世界少有的），不经过审判，不经过核实，党政机关、工作单位都有权把人送到劳改营去劳动教养。当时苏联赫鲁晓夫来了，也反对这样一个严重侵犯人权的法规。现在这种办法还继续存在，可以不经审判，判你个劳动教养，且时间很长。对右派一般要给予 5 年的劳动教

养，他们才感到解恨。有的人在我去之前就被判劳动教养，接着加了又加，仅劳动教养就闹了 9 年。头 3 年是白干，不计算在强迫劳动之内，3 年之后才宣判劳动教养若干年，可是《劳动教养条例》上却明明规定劳动教养的最高期限是 3 年。

由于我没有其他任何历史、政治问题，强制劳动 3 年之后，宣判我劳动教养 1 年，这算是比较轻的。劳动教养还有一个特殊的待遇，就是日期满了之后，还是不释放，那叫留厂就业，就是被迫在公安五处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就业。这些人永远享受不到一般公民正当的权力，他们在政治节日期间要被看管起来，他们不能随便回家，家远的一年只给 12 天探亲假，到家后还得向当地派出所报到。

当时我还比较幸运，因为被宣布劳动教养那年我才 38 岁，比较年轻。北京附近的劳改工厂要 40 岁以内的，比较年轻的可以在北京参加劳动改造，因此把我分配到当时德胜门外的铁工厂，被关押在德胜门外德国为中国建造的第二监狱。在道理上讲劳动教养还应有公民权，但实际上后面还要加上一句话，就是停止使用，既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也没任何的人权。由于反右运动的扩大化，这个劳改工厂急剧地发展壮大，开始重新建厂，盖了很多的楼房和车间，规模不断扩大，从只有几十人最后发展到几千人。这里是高墙电网，武装岗楼，与世隔绝，强迫劳动。

当然这里的生活非常艰苦，在名义上我们有工资，一个月十几块钱，但我们得自己负担伙食费、服装费，我们和那些政治犯、各种刑事犯、被判 10 至 20 年甚至无期徒刑的都在一起劳动，一起睡觉，一起接受公安人员的管理，我们实际上就是囚犯。

当时与我一起的劳改犯大部分一进来，妻子就被迫提出离婚，可我的妻子却始终含辛茹苦地操持着这个不幸的家庭，忍受着巨大的精

神痛苦，当时我的三个儿女分别只有9岁、8岁和5岁。这令看守们都大为感动，说：“谁离婚，杨毓东也离不了。”

我入狱的第二年，全国就开始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百姓生活陷入巨大困境之中，但每月一次的探视，她都给我带来一些吃的东西。有一次看守队长感慨万分地对我说：“你知道这些吃的是怎么来的吗？这都是从你老婆孩子嘴里省出来的呀！”感动之余，队长经常从长长的探视队伍中，将我的孩子们领到前面来，以便让我多看他们一会儿。

1962年，劳动教养终于期满了。释放吗？不能。政府把我先送往北京附近的团河农场。5、6月间，我们坐了25个小时的火车，被送到吉林白城子以北的一片荒地上去建造劳改农场。那里是纯粹的北大荒，我们在那里受尽了折磨，饮食异常艰苦，甚至连盐都需要家里寄，住的也很简陋，我们每个人领到一个蚊帐，睡在帐篷里的草地之上，夜里睡觉的时候，蛤蟆、各种昆虫爬进被窝与我们同眠。

我在那极端恶劣的环境里进行着超强的体力劳动，又严重营养不良，身体承受不了这样的折磨，终于病倒了。我年轻念神学时曾得过肺结核，现在结核病转移到腰上，疼得没法参加劳动也就没了生活费，又得不到治疗，反而受到更多的管制。我妻子向政府请求批准我回家养病，但他们不允许。后来我妻子做了一次手术，让我紧急返回北京，他们通过电话联系，证实确有此事之后，这才允许我回家看顾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于是我在1962年圣诞节的早晨回到了北京。

他们不再给生活费，没有北京户口就没有粮票和其他副食、生活必需票证，我们怎么生活呢？那是必须靠粮票买粮的年代，我们只能忍饥挨饿。他们把我交在当地派出所，负责监管我的警察叫尚常明，是派出所的副所长，他经常到家里来监视我。看到我可怜的孩子，

看到我所受到的痛苦，腰上有结核病，身上带着一个钢架来固定，他动了恻隐之心。他是一个善良的警察，主动写报告把我的户口迁回北京。那时彭真正在北京搞“水晶石运动”，认为北京应该是清一色的好人，坏人不许进北京，阶级敌人、吃闲饭的人要迁出40万。就在这场荒唐绝伦的运动当中，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我作为一名劳改期满的右派，且又无背景后门，户口居然还能回北京，这不能不说是神迹。我在感念神恩的同时，至今对尚常明仍是念念不忘，他是一名能够体恤百姓痛苦的好民警。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腐败盛行的环境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四、遣返回乡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属于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五个被专政的阶级敌人中的一员，自然在劫难逃。尤其是我还信耶稣，传过道、读过神学，更是罪上加罪。那时候凡是和教会有过关系的人都被打成帝国主义的特务，所以他们在我身上又下了不少工夫，他们开大会搞宣传，用喇叭对我进行批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当时镇压取缔“一贯道”等“反动道会门”，将一切宗教都视为“反动道会门”，也把我归入他们的行列之中。尽管我挨斗挨整，我的妻子还是忠诚于我，所以他们称我的妻子是什么“保皇派”，连她也一块批斗，“红卫兵”前后三次来抄家，甚至连孩子们也受尽附近居民、居委会主任们、无知儿童的攻击，在学校里也受到打击和歧视，情况特别紧张，终日生活在恐怖当中。

我既然是五类分子，理当遣返回乡，但是他们不明说，却用逼的办法让你自己自动离开，所以今天斗、明天斗。后来我看形势不好，便跟妻子、孩子们商量说：“我现在不走，你们

将来在北京也留不下了，我现在走也许能保住你们。”当时一起挨斗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明明不是地主，硬被说成是地主，尽管他们的成分好，且做过很多的好事，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硬要逼他们走，不走就打，我一看要打到我身上了，我就同意走了，同意走了就不打了，也不斗了。我就这样被迫遣返回乡，在文革中这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所谓还乡就是回到自己的老家，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劳动。

回到故乡，我的父母还都健在；那里有我弟弟一家人，人口很多，有7个孩子。我弟弟是个乡村医生，与当地农民相比，生活条件还算不错。我又跟我的父母在一起团聚了几年。这也是上帝的恩典。

母亲对我还像以前一样关怀备至，时常给我一点吃的，看我的腰上无力，就给我做一个棉护腰。弟弟虽沉默寡言，对我也是毕恭毕敬，因为他比我小不到两岁，从小一起生活，兄弟感情一直很好。前几年他故去了，直到现在我仍非常想念他。

我是在8、9月回去的，正赶上秋收。母亲领我到我们那个生产小队的队长家，让他多关照关照我，大家都是老街坊、好邻居，而且当时大队的书记还是弟弟的同学，也信过耶稣，人特别厚道，在文革中保护了不少受屈受冤的无辜百姓。

我很快就参加了劳动，但我既不会干农活，又无体力，队里的亲朋好友就都热情地帮助我，小队长给我安排比较轻省的工作。当我完不成任务的时候，很多人就来帮我干。比方说收割时需要抢时间，尤其是割高粱、割豆子，我根本无法胜任，结果他们割完了，上来一群人几分钟就帮我完成了任务。虽然当时我才46岁，但大家都尊敬地叫我“老杨头”。有亲戚关系的，论大论小，叫我叔叔或大爷，没有亲戚关系的，就叫我“老杨头”。虽然当时不可能传福音，我以身作则，把一个基督徒的品行展现

给人们，我这个46岁的老杨头竟然很受这些乡亲的爱戴。

那个时候我还算幸运，北京街道办事处按照当时的政策开的遣返回乡的理由不是右派，而是“思想反动”。思想反动和右派有点区别，右派是敌我矛盾内部处理，思想反动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可以保留公民权。结果我便没有进一步成为专政对象。回乡对我的身心都有好处，实际上我的身体健康在这种劳动中受益不浅，在农村，清晨起来空气新鲜，终日生活在绿色植物当中，又有一些青年经常到我那里去玩，下下棋，打打扑克，我那地方还真像是一个俱乐部。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非专政对象，那些苦活累活以及义务劳动，都由地、富、反、坏、右去干，我则可以免受这种待遇，且和乡亲们关系又都那么好，所以我每年冬闲的时候还被允许回北京探亲；秋收以后，打完茬、卖完粮，会计就提前给我支取工分。我一年的劳动所挣的工分，至多够我回家的路费。这样我每年冬天还能回到北京的家中度过三个月，到第二年春耕的时候，我又要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当中，我能得到相对宽松的待遇，这一切都是出乎意料的。

当时国内政策不断地改变，有时每户农民都有点自留地，但有时由于很多人在自留地中种植经济作物，又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自留地后农民没有收入，零花钱、粮食就无从补助了。当有自留地的时候，队里也给我分了一块，方方正正有400平方米。我种得很好，收获颇丰。后来在外甥的帮助下，利用废弃的木料盖了一间半小土房，我便在那里正式安家了。

在极度清贫当中，我度过了十几年的农村生活，也度过了那个置无数人于死地的“史无前例”的浩劫。感谢主，是他保守了我，也磨练了我，使我能为今后的事奉准备了健康的身体和清净的心灵。■



在天国相会

文 / 喜乐

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唱着一首诗歌的副歌——“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内，因主慈爱常覆翼，我心必得安慰。”不知唱了多少遍，也不知到底给谁唱，只是想唱——不停地唱，时而眼泪就流下来……

8月16日晚上，有个弟兄告诉我们，袁牧师当天下午归天家了。太突然，太突然了。我们夫妻赶紧换上衣服，一边嘱咐孩子们几点注意事项，一边拿着雨伞出了家门。因孩子也认识袁牧师，一听到老人过世了，就没有拦阻我们，只问了几点钟能回来。外面继续下着小雨，这雨已经下了一整天了。啊！原来它也是在为他哭泣，为他惋惜呢！

到了马路边没等多久一辆出租车就驶过来，我们顾不上那是什么牌子的车，就招手坐了上去。车开得很慢，一路上堵车，直到南三环。在车上我们彼此没有说几句话，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面。我是多么希望袁牧师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我们家庭教会不仅被兴起，而且神的儿女公开自由敬拜神的那一

日！像当年袁牧师在福音堂门口敲锣打鼓来吸引一些好奇的人们来听耶稣基督的福音一样，有那么一日，老人家看到一群年轻人也在以同样的方式来传讲天国的福音，那该多好！其实，这也是我的祷告题目之一。为这福音的原故，他奉献了他的一生，投入了全部的精神。为此，他不仅走上了艰难的信心生活之路，也经受了冷酷的监狱之苦。在监狱里一呆，就是二十一年漫长的岁月——把年迈的母亲和尚未成年的六个子女托付给瘦小的妻子，不，是交托在神的手中！在监狱里没有诗歌本，没有圣经，只有记忆中的一些诗歌和经文。后来，他告诉我们，当时只有一句话——“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诗29:10）从此，这一句话激励了我们夫妇许多次，每当面临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重复这一句经文来重新得坚固，重新得力继续为主做工。不知袁牧师美好生命的见证激励了多少年轻人兴起来为主做工。

我们认识袁牧师夫妇已经有十三年了。刚认识他们时，我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他们会给我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忘不了，白塔寺的一间简陋的小房；忘不了，床边挂着的印满葡萄的帘子；忘不了，那里的饭桌；忘不了，挤满了的人群；忘不了，在外面站着听道的经历；更忘不了，那里的温情。每当去袁牧师家时，总是看到有弟兄姊妹在那里，有的人是北京的，有的人是从外地来的。有时我心里想：他们多累呀，有没有休息时间哪！但，他们始终热情地接待每一个人，细细过问每一个教会的情况和个人的一些琐事。后来我还发现，只要去过他们家一次，师母就能记住、不忘记，还准确无误地叫出名字来。刚开始我很纳闷，师母年纪那么大，接触的人又那么多，她怎能记得住那么多的人呢？因为好多像我这样的人又不经常去，过一段日子才去一趟。我想，那是神赐给她的恩赐。

车终于到了洋桥，外面还是下着雨。我们摸着记忆，敲了袁牧师家的门，已经将近半年多没有来这里了。门很快就开了，师母平静地坐在餐桌的正中间，几位家人坐在旁边。师母看见我们进来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怎么来了？怎么知道的？”我们走到身边时又忙问：“孩子呢？”师母还是非常清醒，平静。我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我没有说一些安慰话，因为她比我还安稳。家里人忙着翻电话簿，通知追思礼拜事宜，我想帮忙却帮不上。座机一直不停地响，几次师母也过去接电话，耐心地告诉对方袁牧师当天下午已经被主接走了，有时还用广东话来讲。她还安排一些事情。虽然从她的脸上能够看到一些虚弱，她却以惊人的毅力来支撑着。耶和華神是她心里的力量！

坐在那里看着饭桌，就不知不觉想起上

一次我们一家人来看望他们的时候，在那里吃午饭的情景。那时，袁牧师还在家里，但身体虚弱，只能喝一些清汤和牛奶。吃饭时师母不停地往我们的碗里夹菜。好久没有人给我夹菜了，我也好久没有给别人夹过菜。每次上午来袁牧师家，他们总是留下我们吃完中午饭再走。过去是师母亲自下厨房做菜，后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就由别人来做。有一次，老姊妹悄悄地告诉我：你们来了师母多高兴，要亲自做鱼给你们吃。师母的做菜手艺真是非常好，不仅颜色好看，还特别好吃，做饭速度也快。没想到那一次是与袁牧师的最后一次共餐。每次去袁牧师家，都是他们请我们吃饭，所以我们一直想请他们夫妇吃一顿饭，以此来表达我们的心意。上上一次拜访时，我们就硬请他们夫妇到附近的餐厅吃过简单的一些饭菜，总算了了我们的心愿吧。

从袁牧师家回来时，他们总是不让我们空手回家，总是往袋子里装这装那，有时袁牧师还说要多装点回去给孩子吃。有一次，我们带孩子去看望他们，袁牧师就非常高兴地与孩子说话，临走时还把冰箱贴取下来送给了孩子。平时看起来比较严肃的老人家还有如此可敬可爱的一面，使我的内心再一次深深地被打动。他心中多么喜欢小孩子啊！偶尔在外面见面时，没见孩子和我们一起来，他们就问起孩子的情况，所以每次去看望他们时我们都带着孩子，也希望孩子记住中国家庭教会领袖的形象，以此激励孩子用一生忠心服侍主。

现在我们多么幸福，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能和孩子在一起，但袁牧师却曾被无情地剥夺了作为父亲应有的权利，失去了疼爱儿女的黄金时间。他从狱中被释放时儿女都已经长大，虽然有幼年的孙子辈，却没有安静

的时间与他们单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家里天天来弟兄姊妹，又有聚会，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1993年的元旦，我们几个人去了袁牧师家，刚进门看到屋里来了好几位，仔细一看刚好都是他们家里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家里人单独在一起的情景。难得看见一家人在一起。心想：糟了，打乱了他们的美好聚集。我们一行还在不知所措时，一溜烟，他们都静静地走出去了。他们的年龄都比我们大多了，有的和我们父母的年龄相仿，但他们总是那样谦和，使我不得不从内心深处敬重他们。也许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的尴尬，但看得出这对他们家人来讲是常有的事。

我总是忘不了过去我们刚出来服侍时，袁牧师夫妇对我们的接纳和鼓励。他们以无愧的良心来坚持他们的立场和圣经的真理，使我深深地感动。当时我就告诉自己我们夫妇的一生也应该像他们一样，全然奉献自己并以无愧的良心来持守真理。

我们结婚时没有买戒指，就以圣经经文来代替戒指，彼此交换了“信物”。一处经文是《撒迦利亚书》4：6：“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句经文也是袁牧师最常用的。另一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3：4—8：“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处经文也是在袁牧师的聚会中常唱的一首经文诗歌，每当唱这首诗歌时，师母清脆的声音格外地好听。袁牧师夫妇不仅常常讲这两段经文，唱这两段经文，也用他们的一生活出

了这经文的真谛。他们夫妇实在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效法的榜样。

我时常感谢神，我们刚出来服侍主就认识了袁牧师夫妇。因为他们，我们不仅明确了我们侍奉的方向，也坚定了基督里面的无伪的信心，这也让我们少走了弯路。每当遇到极大的困境时，我就常常想起袁牧师夫妇，想起神用一路的吗哪来带领了他们，相信神同样会带领我们。从他们夫妇的真实生命中，我们看到和学到了好多好多极其宝贵的东西。他们走过的路我们不一定会再经历，他们受的苦难我们不一定会再品尝，但他们坚贞的生命使我们后人继续效法，并在各样艰难困苦和新的挑战中仍然持守纯正的信仰，并且为着信仰奉献自己。

我们刚结婚时，生活上非常艰难，每当我们去看望他们时，知道我们状况的师母总是往我的手里塞一些钱。虽然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宽裕，但他们总是以爱心来关心我们。有一次，我们去袁牧师家时，刚好家里有一些钱，我就高高兴兴地把其中的五十元钱装在信封里，心想终于如愿了。可是，当我们要起身离开，正要拿出我那精心准备的信封时，师母却把一张五十元的钱悄悄地塞在了我的手里，我忙说我们很丰富，她却笑着小声说：“拿着吧。”我只能收下，并赶紧用另一只手拿出信封交给了师母，她会心地笑了，我也不好意思地向她笑了一下。同样的五十元钱，却彼此接受了基督里面的关爱；似乎是在交换，却彼此表达了基督里面的记念……

快到晚上十点钟了，他们家人仍在打电话、又接电话，他们家里又来了一些弟兄姊妹。我们简短地说了一些话以后，就离开了袁牧师的家。小小的雨滴不停地滴在我们的头上。

这几天里，一想起袁牧师，里面就出来



1990年代，袁相忱梁惠珍夫妇合影

圣经《提摩太后书》4：7—8的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有时，在我一时的错觉里面好像觉得袁牧师没有离开我们，如果我去他们家还能见到他，他还在洋桥。但是，追思礼拜的日子越来越临近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他已不在这个世界，回到天家了。

今天，天空格外晴朗，连着几天下的雨水把京城空气洗得清清爽爽。

中午，我们早早地从家里出发，一路上因走错了路耽误了一段时间，但还是及时赶到了。已经来了好多人，不少人我也认识，但没有来得及与他们一一打招呼。我一直站

在殡仪馆竹厅门口等着开门进去。我要最后一次再多看一眼袁牧师的仪容，要好好与他告别，心中还有好多好多想说的话。因为人多拥挤，我就不断地往后退，又给老人让着位置，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很后面了。心想：后面就后面吧，仪式结束后还能看一眼。后来，我还是被安排到非常好的位子，我看到了他那安详的面容。当唱第一首诗歌《全路程我救主领我》时，因哽咽无法继续唱下去。我真的舍不得他离开我们，好怀念他；好遗憾他在世时没有看到黎明的到来，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十字架高高地立在北京城的上空，那些蒙救赎的灵魂涌入神的殿，神的百姓在圣殿里高声颂扬主的名……

师母一直到仪式结束都静静地坐在轮椅上，她的表情非常安详。她在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靠着神度过了艰难的时期；在各种搅

抗面前仍然忠于了他们的婚姻；袁牧师出狱后她又细心地照料了丈夫；如今又亲自送走她最亲的人。她用她的一生陪伴了袁牧师。在袁牧师一生的服侍中都有她的影子——她那瘦小坚定的身影。她是所有传道人妻子们的榜样！

师母的旁边站着他们的子女。为福音的缘故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心灵里经历了当时他们无法完全理解的因信仰所带来的残酷的现实。有一次我们去袁牧师家，刚好他们的两个女儿也在。吃过午饭后袁牧师进房休息了，我们就与她们两位姐妹聊天。我问她们两位，袁牧师被捕以后她们在学校和单位里怎么度过的。她们轻松地告诉我们说：“没什么，大家对我们不错，只是学习再好，工作再卖力也评不上优秀。”我想，现在她们如此平静地回忆，但当时她们又有何等深的感触呢？！

我的耳边回荡着她们母女的一段对话——

“妈，明天的午饭您就给我带一次白馒头吧，好堵住那些同学们的口。”

“……不行啊，给你带一次，他们（其他孩子）也要带啊。”

此时，哪一位母亲的心不会痛！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痛苦，母亲有母亲的苦衷。她们所经历的生活和心灵的坎坷何止这些？

的确，在袁牧师得胜的信仰历程里深深地印着他们六位子女们留下的大大小小的脚印！

袁牧师不仅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了神的祭坛上，也把自己的配偶、子女——整个家庭全然奉献在神的祭坛上！他并不是一个人服侍了主，而是带着全家人忠心地服侍了主。谁不爱惜自己的妻子，谁不疼爱自己的儿女，谁不知道要珍爱自己的家庭，谁不知道青春

时光一去不复返？然而，为福音的缘故他却摆上了这一切！信实的神也兑现了自己的应许，他们度过了足足 67 周年的婚姻生活，他们的儿女也都健康地生活到如今。

听啊！天使美妙声，传来颂歌嘹亮，
越过那荣耀福地，越过碧波海洋。
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内，
因主慈爱常覆翼，我心必得安慰。

尊敬的袁相忱牧师——我们众人的好牧者，我们的好前辈，我们的好弟兄！到那日，我们在天国相会，再相会！！

……

我想，我们年轻一代该站起来了。老一辈们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持守了纯正的信仰，把福音的火把传递给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我们应该站起来，并且站稳了，继续把福音的火把传递下去，一代又一代，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

兴起，兴起为耶稣，尔等十架精兵！
尔王战旗当高举，不可使之倒倾；
主要领你战诸敌，必定连连得胜，
直到诸敌尽降服，惟主大奏凯功。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来 12:1）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耶 33:3）

主啊！求你兴起，兴起我们，使用我们！

附：天明牧师在袁牧师追思礼拜上的祷文

慈悲怜悯的天父、永生的上帝，我们的救贖主：

你伟大、荣耀的名在我们中间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在过去九十三年时间里，你一直带领了你的老仆人——袁相忱老牧师，大大地使用他，透过他赐福了许许多多的人和许多的教会，今天你终于把他接回你的天家，你使他脱离了世上的缠累和肉身的苦痛，进入你的永恒，在你的怀中永享安息。

主啊，这是何等荣耀的安息。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老仆人一生没有违背他年轻时所蒙的恩召，一生服侍了你，并且用他那夸胜的生命见证着使徒保罗在经上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提后4:7-8上）

主，面对这样一个荣耀的安息，我们想起经上的一句话，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7-8）

主啊，我们在你的老仆人几十年的事奉

中，看到了你坚贞的生命、你福音的大能，以及你荣耀的作为。面对逼迫和无期徒刑，你的老仆人用无畏的生命见证了你的话：「你要把你的教会建造在，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面对漫长的监狱生活，你的老仆人不仅没有绝望，反而用向环境自由的夸胜生命来见证了你的话：「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華仍坐着为王，仍坐着为王。」面对出狱后的事奉环境的艰难，你的老仆人仍然对你充满信心，用他的信心的生命唱出了「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圣灵方能成事。」

你的老仆人，整个人生，就见证了你自己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下）

为此，我们今天聚集，为着你在你老仆人一生中的作为来感恩，也为着透过他向众教会所施的恩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在这时刻，我们愿意在这里纪念与你的老仆人一同生活29年、为着信仰、为着主你自己，与他同甘共苦，默默忍受各种痛苦和漫长艰难的你的老使女——我们尊敬的

袁师母。愿主你自己的安慰在这个时刻临到他，擦干她的眼泪，因为在那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分离和悲哀。

主啊，我们也愿意在这里纪念你的老仆人——袁牧师的所有儿女们。他们为着他们父亲的缘故，夺去了童年的快乐，在他们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历程中失去了父爱的激励，他们年轻的生命经历的是无助、留下的是奋斗后的失望。为着你教会的成长，他们有意无意中与他们的父母一同在他们的家庭中、在他们幼小和年轻的生命历程来「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乏。」（西1:24）为此，主啊，你的众教会在这里纪念他们；并且切切地为他们祈求，愿主你纪念他们为着父亲的信仰经历的一切，亲自擦去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留下的那些一道道泪痕，亲自把他们的心从无法忘记的痛苦记忆中带回到你的美好，求你亲自赐福他们每一个家庭，在你的爱里美满、幸福，用你的道养育敬虔的儿女。

主啊，我们知道今天不是一个悲伤的日子，而是一个荣耀的日子。因为你的老仆人走完他事奉的人生，荣归天家。他虽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却永远随着他。

主啊，你伟大荣耀的名永远配得我们的赞美！

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生命的乐章

——追思主的使女、一代忠仆杨心斐

文 / 基立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 13:7—8）

2011年7月23日，我们所敬爱的心斐姨卸下了世上一切的劳苦，带着丰满的生命果效荣归天家，得享主耶稣所预备的永恒荣美的安息。我们都爱她、敬重她，因为她曾经为主的缘故，用爱、用真理、用生命服事了我们众人。她实实在在是我们大家的“心斐姨”。神在最适合的时间接她回家休息，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份难以割舍的伤痛。甚愿这几天来的追思礼拜，能激励我们与主更亲，爱主更深，事主更诚，见证更美！

心斐姨 1928 年出生于福建厦门港礼拜堂一位牧师的家庭，从小就接受很好的属灵的熏陶和严格的训练。15 岁时在一次夏令营会决志悔改信主，重生得救；18 岁蒙主的呼召，并考上福建音乐专业学校；22 岁时院校合并，到上海音乐学院继续深造，25 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音乐学院，是全系第一名。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文化局工作。在圣灵的引导下，她响应神清楚的呼召，毅然放弃文化局的工作，回到厦门家中，那时她 26 岁。她一边教几个学生学声乐和钢琴，照顾供养家庭的需要，一边在教会里参与服事。30 岁那年，因着坚守纯正的信仰，不加入“三自会”的缘故而遭逮捕，监禁于劳改农场。12 年后

被流放到福建山区武平县永平公社插队劳动。那时她已经42岁了。1974年46岁时，终于获得释放，回到厦门到今日，一直是以自由传道者的身份在厦门和福建各地服事主，服事弟兄姐妹。她的足迹遍布中国的许多地方，也到过香港、新加坡、以色列、澳洲、美国、俄罗斯等许多城市和地区，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留下了佳美的脚踪。

1958年，就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岁时，为了持守纯正的信仰，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她被投进了暗无天日的监牢里。被人视为人生中最宝贵的一切，全然被埋在荒凉混乱、阴暗潮湿的监狱里。很多次她被审问：“你还信上帝吗？”只要她说一句“我不再信了”，第二天就可以解除镣铐回去与家人团聚。但在这关键的问题上她一点也没有妥协，没有让步。情愿为着信仰而放弃自由。她牢记主所说的话：“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路12:8—9）审问人员恼羞成怒地吼叫：“那你就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吧！”她被判定是出不了监牢的人。当她从监牢获得释放时，曾有一位在大学历史系当教授的亲人很尖锐地问她说：“你是从大门走出来的，还是从狗洞爬出来的？”她坦荡地回答说：“那是因为‘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诗124:7—8）无论是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她都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

在劳改农场劳动时，曾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她要翻山越岭，独自一人看守六百亩渐渐成熟的

果园，防备猴子和野兽毁坏果树。每一个三更半夜她都要忍受露水、寒风、蚊虫、疲乏的煎熬，还有难以忍受的饥饿。面对着极大的诱惑，几个月下来，她一个果子也没有偷吃，连一个也没有。始祖亚当、夏娃因树上的果子而失败了，心斐姨却靠主胜过了。漆黑的夜晚、起伏的山岭，成了祷告和赞美主的地方。在那里只有她与神在一起，这是在劳改农场劳动时最享受的时刻，她将从小时候到长大所学的诗歌一首首地唱出来，用最美的歌声唱给神和天使听。

从1958年被捕到90年代，她的家曾多次被抄、被搜查，然而除了信仰问题之外，人们再也找不出她有任何错误过失。她圣洁的生命见证了自己的信仰，见证了主耶稣的名，连逼迫她的人也从心里佩服她。她无所畏惧，就怕得罪神。光明磊落，常存交账的心态，在神在人面前，存着一颗无亏的良心。她记牢主说的话：“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作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路12:4—5）

1974年，她回到厦门家里，就全身心地投入教会的建造。她先在自己的家中开始家庭的崇拜与儿童聚会。几年辛勤地服事与祷告，逐渐地建立了各种不同年龄段的小组聚会。不仅有儿童主日学、还有少年人、青年人、姐妹、大学生、中老年人及传道人的小组。基本上是以祷告、查经为主，加上专题的分享与交通。在那个时期，学习材料奇缺，她自己编制教材，按序有效地牧养带领各个小组。这些小组的聚会人数不多，活动比较方便，

出入自由，很有活力；也让很多人有学习服事和操练的机会，可以发挥各人的恩赐，肢体之间关系密切，彼此关怀；同时也适合当时的环境。这些小组、团契就是形成今日教会的雏型。记得当时有一位海外教会杂志的主编来到厦门，参加了家庭式的聚会，惊叹说：“这真是原始教会的模式！”

80年代后期，沿海一带家庭教会兴旺起来，得救人数不断加添，这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他们采取了种种的逼迫、打击、限制的手段。面对着有关人员的劝说和恐吓，她坦然平静地回答：“从上到下各个部门常常开会，大会小会开个不停，各种宗派也都在开会，就连街道、居委会也在开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就不允许开会？圣经明白告诫我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来 10:25）国家宪法赋予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有集会言论等等的自由，这是每个公民拥有的权利。你凭什么不允许我们聚会，是根据哪一条‘法’？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开会，直到今天也一样。”这些前来劝阻的人吓了一跳。怎么这样一位老太婆竟然有如此高水平的言论，真不可思议。

心斐姨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她同样有人的种种需要。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她曾有一位男朋友，只因为彼此所选择的道路不同而分手，她为此曾经很伤心难过。她从劳改农场和山区获释回到厦门后，也曾有过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的念头，只是神在她身上并没有这样的安排和带领，她顺服神在自己生命中的引导和计划，一无挂虑地为基督和他的福音效力，专心讨主的喜悦。她没

有成家，却是帮助引导许多的弟兄姐妹建立了基督化的家庭，并教导年轻人如何按圣经的真理过好婚姻与家庭生活。如今在教会里服事的姐妹们有许多都是她一手培训出来的。

和她在一起服事，你能够感受到稳妥、安全和喜乐。她在三个弟弟、弟媳和许多的侄儿侄女的大家庭里过家庭生活。可贵的是，就在这个大家庭中，她建立了厦门最早、最美的家庭教会。她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了无数归向神的人，栽培、建立了各种年龄段的人。一批又一批的传道人从这个家庭教会成长出来，分布遍及了许多地区。三个弟弟、弟媳和他们的后代都在她的影响之下，投入教会的各种事工，其中有三个侄儿、侄女成了全时间事奉神的传道人。她将家庭与教会紧密地联结在基督耶稣里，更是将“家庭教会”的内涵，活泼生动地呈现在众人面前。她帮助造就了许多人，在她年迈患病期间，就有四面八方的亲友和主内肢体纷纷给予多方的关注和照顾。神为她预备了一位忠心的姐妹，前后几年，日夜守候陪伴在身边，一直到她走完人生的路。

90年代初，神忠心的仆人、主内的前辈戴绍曾牧师和心斐姨等人看到了中国家庭教会发展的趋势和需要，把握时机，及时举办密集的神学培训，使那些已经在工场上服事的传道人能接受比较系统的圣经神学培训。从1992年至2002年，整整十年间，栽培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注重生命品格、有正确的圣经基础和神学观念的时代工人，他们分布在各个城市、乡镇、山村、海岛，为基督作美好的见证。

在整整十年神学培训过程中，心斐姨每



2001年，杨心斐来北京，在守望教会（前身）退休会上与理工团契的弟兄姊妹合影

一期都和学员在一起，就像学生一样，专心地听课，认真记笔记。培训期间每天下午都有一个完整的时段，各地的学员相聚一起，每个学员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在教会里的服事、与同工之间的关系、家庭夫妻的关系、儿女的教导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她与大家一起讨论、思考、分析、辨别，最后再整理出正确的答案。这个时段也给学员带来极大的帮助，许多学员心中的困惑和难题获得化解，同工间的关系被理顺，道路也更加清晰。

心斐姨不仅和大家一起学习、做作业、讨论，并且提供处理难题的方案，也帮助扶持一些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学员，不断地给予支持和鼓励。心斐姨非常注重学员生命品格的塑造，严格要求大家必须遵守课堂纪律，按时上下课、完成作业、按着规矩休息、睡

觉、灵修。衣着要干净整齐，房间铺盖、被子、洗手间等等都要整洁、有序。每一期的学习虽然只有几天的功夫，然而却是一次非常棒的训练过程，对以后的生活与服事有难以形容的影响。她的家，不仅是一间教会，也是一间学校，在这里训练出一批批神国的工人。她是最好的牧师、教师，也是最出色的辅导员。

从1997年开始，我们从已经受过比较系统神学培训的学员中挑选一些灵命成熟、有教导恩赐的同工，一起举办在各地地区的神学培训班。心斐姨与我们一同策划、安排、设计各地的培训事工。她自己也亲自到各个地区的培训班去教导学员，她教的科目是“基督教伦理学”。这一项培训事工给各个地方的教会带来复兴与拓展，其影响非常深远，直至今日这项培训事工还在继续。

2003年12月，她应邀参加《生命季刊》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中国福音大会。在会上有非常宝贵的见证和分享。从美国回到厦门后，她显得比以前更加繁忙。海内外有许多主内肢体纷纷前来拜访探望她，带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渴望与她交通、谈论。她也乐于接待每一个到她面前的客人，用心聆听，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她实在太忙了，负担太多了，太重了。2004年，她突然脑溢血住进医院，经过抢救终于从监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那天下午，恰巧是每个周五下午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同工会（这是从1974年回厦一直到她离开世间，几乎没有停止过的聚会）。在病房里我们见面时，她舌头还有点僵硬，却清楚说出第一句话：“生为主生，死为主而死！”接下来她非常诚恳地说：“我要悔改！”那个时刻我深深地受震撼了！我觉得非常地稀奇，她这样将自己的一生全然奉献，为主的缘故，舍弃一切，此刻她所想要表达的话竟然是“我要悔改！”她实在是一位敬畏神而且有神同在的人。

2007年12月，她坐着轮椅和我们一起参加《生命季刊》在香港举办的中国福音大会。她在大会上讲道和带领祷告，恳切勉励众教会、众信徒要悔改归向神。她讲解了《启示录》第二章，并以丰富的生命经历和阅历，列举许多事例作为鉴戒，提醒众信徒当谨慎自守，不要贪恋恶事；她以犀利的洞察力剖析了混杂在教会里的错误邪僻的教训，提醒教会要警醒，要抵挡假先知的教导。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纯正全备的善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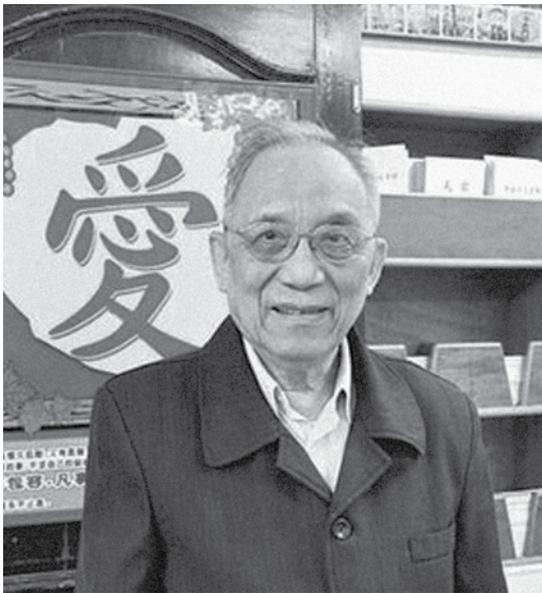
从2004年起，她曾多次患病住院。神也

一次又一次将她从极重的危险中抢救出来。长期的牢狱折磨以及不辞辛劳的服事，使她的身体非常衰弱，内脏的一些器官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脑溢血致使她一手一脚麻木，行动很不方便。然而她依然把握每一个机会，参加各种的聚会。她实实在在成了轮椅上的传道人。只是每一次讲道、作见证时，她一定是从轮椅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传讲真理的道。

心斐姨安息主怀后，她的侄儿按着她生前的心愿，在她呕心沥血亲手建立起来的教会会堂里，举办了追思安息礼拜。六堂的追思礼拜，有六篇信息，传讲神在她身上奇异的恩典和作为。更是有众多的同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讲述了心斐姨伴随着他们一同学习、生活、事奉的经历与感受，追忆了她爱心的付出和美好的生命见证，感人至深。接连六堂的聚会之后，我们依然觉得言犹未尽，尚有许多话要说。神召回自己忠心的使女，一代人过去一代人又来。神的工作仍在继续，新一代已经兴起，生命在延续，一刻也没有停歇！

回顾心斐姨生命历程的片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神的确是将她作为荣美的恩赐和见证，赏赐给中国家庭教会。她以生命为讲坛，以生活为讲章，传递生命的信息。无论走到哪里、摆在哪里，都是那么美，叫神得荣耀，叫人得益处。她的生命也像一首美歌，平凡的生活和服事以及漫漫的苦难历程，就如一串串的美丽音符，谱写成美妙的生命乐章。现在她已经回到为她舍命的主耶稣那里，在神的宝座前与众圣徒一同唱更美的新乐章。■

（本文原载于《生命季刊》，获准转载。）



“我们经过水火”

文 / 林献羔 Sarah 整理

去年10月份，赴穗出差17天，幸遇林牧师带查经与主日证道。

他将自己三层楼的一二层改成聚会坐排，二层放满了福音小册子和属灵书籍。聚会坚持每周四次主日信息，合约共4000人。每年，都有数百人奉耶稣的名，在此受浸。

林牧师近日刚步入八十七岁，每月和同工轮流带查经与主日证道，声音铿锵有力，面光红润，完全看不出病痛对他身体折磨的痕迹。每次聚会完，必亲站门口，同每一位弟兄姊妹握手送安。

林献羔牧师自家的大马站聚会点因拆迁自2001年移至广州市中心繁华路段德政北路荣桂里。

下文节选自林牧师赠阅的灵音小丛书之二十四《林献羔见证》，个别字句因粤语与普通话有异而略有修改。

一、抄家

广州大马站家庭教会被指进行非法宗教活动（那时每周3次，共900人左右），于1990年2月22日晚遭抄家，我被拘禁21小时后才获释放。

2月22日晚大马站福音聚会散会后，到11时半，60多名公安人员上楼，出示搜查令，将聚会用的麦克风、录音机、录音带、诗歌及所有书本等用品全部没收，并把我带走。临走前在门口贴出告示，谓该处是非法宗教活动，屡劝不听，实行取缔。

他们把我带去问话计21个小时，我睡了几分钟。到了夜半，某公安员问我是不是真的有一位神。我向他传福音，他称我为“林伯”。

2月22日，广州市郊聚会点亦遭搜查，属灵书籍被扣，与市郊聚会点相关的其它聚会点也停止了聚会。

1、逮捕因由

他们究竟以什么理由拘查我及取缔大马站聚会？是据1988年3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所颁布的《广东省宗教活动场所行政管理规定》（简称《三十三条》），取缔大马站传教点。《三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政府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凡未履行登记手续的，须向人民政府主管宗教部门补办登记手续……未经批准而擅自……组织宗教活动的，由人民政府主管宗教部门责令停止。不服从者由公安机关根据情节轻重强制处理。”

《三十三条》属地方文件，反观中央颁发的宗教文件——《十九号文件》则谓：“关于基督徒在家里聚会举行宗教活动，原则上不允许，但也不应硬性强制。”《十九号文件》自发出后，至今仍是中国宗教政策的主导文件。至于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亦明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依此看来，广东地方与中央的宗教政策有明显的出入。如今取缔大马站家庭聚会就是根据地方的宗教文件，令人质疑的是地方为何有

这样大的权力？地方政府的《规定》究竟有否经中央的程序立法？当中央与地方看法不同的时候，究竟什么是最终的依据？现正草拟的《宗教法》究竟将会带来更大自由抑或是限制？

2、非法的定义

我被指为非法传教，大马站被定为非法传教点。这里涉及一个问题，究竟何谓“非法”。依《十九号文件》的意思：家庭教会只要不做违法的事，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就是合法的活动。（注：如此看来，取缔家庭教会便是不当的。）

若依《三十三条》非法的意思似乎是指未向人民政府主管宗教事务部门登记，故对未办理登记手续的聚会点要强制处理。事实上，若宗教活动必须向有关当局登记的话，那就不能算作宗教自由。从这角度看来，中央的《十九号文件》要比地方的《三十三条》开明得多。

自20世纪90年初我遭到公安局拘查问话后，多年以来，我不时要接受传讯问话。从1990年3月至1991年1月，竟先后被问话达10次之多。在这期间，国内外关心我处境的人士纷纷到访探望，了解我的生活近况。

拘查后，大马站只举行祷告聚会，弟兄姊妹仍可再次祷告、敬拜神。归荣耀与神。

二、问话纪实节录

1、1990年（共接受10次问话），背景：89事件刚过。

10月31日，黄华路看守所第八次问话。问我有什么人来访，特别是有知名度的来访者，他们有什么反应？我答复以后，反问：“为什么连前总统利根（里根）所送的纪念品也取去？”当局说：“你是否想取回这些东西？”我说：“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你们问我他们说什么，我就把他们的话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叫我登记，交由两会管理。但三自是被利用来消灭基督教的。如果这样，我们不受外国基督徒管理，反要受本国非基督徒管理，这怎能是自治呢？我们守法，也不参加游行。如果与圣经冲突时，

我们是顺从神的。”

他们叫我去大礼拜堂讲道。我说：“我们不能和尚等混在一起。”他们说：我听从外国人的话而不听从本国人的话。我说：“我没有听从外国人的指挥。在对外开放的今天，他们来与我有交通，不是控制我。10月5日，海外有人来电话，问我是否这两天要被处决？”

2、1991年，背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夕。

1991年5月10日，越秀区召集许多信徒开会，叫他们不要来这里聚会，并介绍他们到其他地方聚会。会中，他们请人发言。一位医生说：“我到其他地方聚会我会睡觉，但这里讲圣经真理，我听得明白。最近我还帮助残疾人，因为我信耶稣，所以我才乐意这样做。”有一位姐妹说：“几年前我的儿子发生车祸死了，有人叫我信耶稣。我到了大马站听福音，信了主，现在很喜乐，我不到其他地方去。”还有几位举手要发言。据说时间到了，散会。

9月13日，有两位女人来，叫我学习六号文件。

9月25日，上午11—12时，广州市人大代表13人来和我谈关于“登记”的事。我说：“我若登记，就把我们交给三自会管理。”某说：“不是‘管理’，而是‘指导’。”他们的态度也不错。

10月4日，传闻全市都赞成整我们。

11月1日，宗教事务处和越秀区5人来和我谈登记的事。我说：“不要因为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事，而认为我们也是这样。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有混政治的基督教和纯基督教。我们在‘六四’没有参加游行，证明我们不是混政治的一类。”某答：“我听你讲了三次。”我说：“我还要讲，因为不参加游行是个铁的事实。”我又说：“你们各居委会四处叫信徒不要来聚会，还有些单位威胁信徒，若到大马站聚会就没有奖金等。”他们说：“我们没有这样做。”我说：“这是各单位利用这个机会来威吓的。”他们说：“我们没有叫他们不给奖金等，但我们实在叫他们不要来聚会，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叫他们。”晚上派出所5人配合前来，但他们的态度就不如宗

教事务处的了。

12月15日，在一些礼拜堂公读文件，说明年要整我们。

3、1992年，背景：苏东剧变。

从3月17日到4月10日，不到一个月，我被叫去问话，计五次。这是最频繁的一个月，从来没有像这样频繁的。

第一次问话。1992年3月17日下午，宗教事务处叫往谈话：内容是有关“登记”和“三自”等问题。我说：“我们顺服政府，纳税、救灾、交保安费等。但我们的信仰是不应与不信派混合的。”他们提到广东省44号文件，叫我们登记。我说：“1991年11月4日，中国人民白皮书与宪法都没有提家庭聚会要登记。白皮书反说‘信教公民有权组织宗教活动’。这就说明家庭聚会是合法的。我们以圣经为标准。如果……我们宁可殉道。丁光训曾说过：‘1990年取消三自会’。”他们说：“你有没有看丁光训近日的发言？”意思是他已经改变了。我说：“耶稣叫我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说：“耶稣也没有拒绝法利赛人；保罗是在迦玛列门下的。”（这是其中一位牧师说的）。我说：“法利赛人是个教派，不是所有法利赛人都是假冒为善的。耶稣是责备他们的‘假’。保罗本身也是法利赛人。”他又说：“亚伯拉罕也没有拒绝罗得，而是救罗得。”我说：“罗得不是不信的，他只是属肉体。”

第三次问话。1992年3月28日，宗教事务处叫往谈话，也是关乎登记的事。他们说：“今年或明年会出宗教大法，到时就实行行政处理。”我还是说：“宪法和白皮书没有提登记，相反说家庭聚会是合法的。”他们说：“家庭聚会是指一家说的。”我说：“全世界的家庭聚会都不是一家。圣经里的家庭聚会也不是一家。五旬节在马可楼有120人聚会，哪里会是一家的呢！如果一定要登记，我充其量殉道就是了。”他们说：“三自会不指导信仰，只强调自办教会。”我说：“我们已经是自办教会，我们没有受外国或外地人指挥。”

他们说：“我们翻过卷宗，没有说你是右派

分子，是《南方日报》弄错了。”我说：“我被斗为右派分子后，不久升为反革命分子，就被捕了。”他们说：“可能在文革时弄错了。”

他们又说：“你对政策是不大相信的，你受帝国主义指挥。帝国主义初期是借宗教来侵华。”我说：“我们没有受帝国主义指挥。我们现在不要继续说帝国主义以前利用宗教的事，这是过去的。正如我们也不要吧文革的错误算为今天的事。”

4、1993年。

6月3日。在安静了14个月之后，这是在星期四早上，从8时45分至11时，4位公安员突然叫我到派出所去谈话。他们一开始就说：“你们的聚会仍是非法的。”我说：“丁光训说过：现在到处搞‘取缔’，这种‘取缔风’是不对的。”他们说：“你们不应设有儿童聚会。未够18岁的儿童不要向他们灌输有关信仰的问题。”我说：“未够18岁，你们也向他们灌输马列主义。”他们说：“没有。”

他们又问我们的经济来源。我说：“是信徒奉献的。虽然外籍人士来聚会也有奉献，但我们没有外国任何一个团体，作长期的支持和供应。”

他们说：“你们油印那么多的书，甚至有人在垃圾堆所拾到的，又是‘大车站’的书。”

我说：“我们油印100本书能有一人信耶稣，也是值得的。”

他们说：“你们聚会，噪音太大。”我说：“以前我们的主日聚会是在下午2时开始的。后来报纸登载，每日12时至下午2时不许有噪音。我们为了顺服政府就把聚会改在上午8时至10时。况且，我们唱诗只有半个小时。但在我们后边拆掉房子的空地改为卖衣服时，音乐声从早上直到晚上响彻全地，无人禁止，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他们又强调顺服政府。我说：“我们在‘六四’没有游行，怎么不顺服呢？明天又是‘六四’了。”他们说：“如果美国叫你们游行，你们会游行吗？”我说：“美国也有游行的。我们是听神，不是听美国或看美国。”

这次问话,总的来说,他们的态度是不错的。

5、1994年。

1月12日,居委会有两人带越秀区两位统战代表来问候我健康并谈登记问题。

3月23日,公安来取了三箱书。

6月3日。上午9时25分,公安员叫我往北京街派出所谈话。

他们先从油印书刊谈起,说我们非法。我说:“全世界都没有以油印为非法的,况且我们印的是‘非卖品’。”

他们问有什么外国人来。可能因为6月1日晚上有一个外国人在这里问安几分钟,所以他们问及此事。我说:“经常有外国人来聚会,有时在我们讲道后有几分钟的问安。他们回去后说我们这里有信仰自由。”

他们叫我要遵守两个规定,特别是关于登记一事。我说:“这不合乎大多数基督徒的需要。(家庭聚会占90%) 在登记后受地方法规限死,使福音事工不能发展。我宁可再坐监或殉道。”我说:“‘六四’我们没有参加游行。我们不是反政府,而是政府不理解我们。”他们说:“美国或香港也要登记。”我说:“美国或香港也有没有登记的。”他们说:“我们不是学美国或香港。”我说:“当然我们不是学美国或香港。原是你们先提起美国或香港要登记,那我才用美国或香港来回答你。”

这次问话,他们都很客气。直到上午11时我才返回。

6、1998年,背景:香港回归之后第一年。

2月10日星期二早上聚会后,三位宗教事务局人员来,把《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给我,叫我学习。我说:“我们不登记。《宗教白皮书》(1997年10月16日)第三点说:‘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根据《宪法》第五条:‘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作为公民,我们是服从政府,1989年‘六四’我们没有游行,但我们的信仰是自由的,我们只能顺从神。”

他们说,不应有儿童聚会。我说:“儿童信教受法律保护,引用《国际法保护》,经联合国

大会通过的规定:‘所有儿童均应有按照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愿意接受有关宗教或信仰方面教育的权利……’”我说:“登记是要限制我们的信仰,我宁愿再坐监也不登记。”

他们问我的健康状况,我说:“我患了脑动脉硬化、腰椎滑脱和椎间盘突出。”他们要我小心保重。我说:“谢谢!”

8月20日上午9时至10时半,宗教事务处4人与我谈话。他们问我对《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有什么看法。我仍然说:“我宁可坐监也不登记。因为这些条例是限制我们的信仰。公民既有‘信仰自由’(不只是‘信教自由’,‘信仰’应是包括圣经全部教义的),我们就照圣经而行。”我还说:“圣经有家庭聚会,都不是指一家人,五旬节在马可楼有120人,当然不会是一家人(徒1:13—15)。圣经有4处提到‘家里的教会’(罗16:5,林前16:19,西4:15,门2)都没有登记。罗马迫害基督徒最甚,也没有登记条例。”

他们说:“18岁以下的人没有分辨接受能力,所以不要给他们施浸等。”我说:“为什么你们向18岁以下没有分辨接受能力的人宣传马列主义,他们又可以成为共青团员呢?”

他们说:“不要批评其他宗教,应当团结。”我说:“只有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的,人人都有罪,需要耶稣的拯救。”他们说:“你说人人都是罪人,难道我们也是罪人吗?”我说:“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神说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最好你们也信耶稣得着拯救。”

末了,他们叫我回去再详细研究《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下次再谈。他们的态度还是很好。

此后,直到2009年,有关部门仍不停地找已入耄耋之年的林牧师“谈话”,要求“登记”。林牧师每次耐心解释后,仍如前所说:宁可被捕也不登记。他的回答谦卑柔和,却字句有力,坚守正道,却又智慧灵巧,颇具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愿神用厚厚的恩膏恩待他的老仆人,继续地赐福于他的老仆人。阿们! 📖

回忆谢伯伯

文 / 许波

初识谢伯伯是在天明牧师的按立仪式上，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了，只是依稀记得在弟兄姐妹的赞美诗中一位白发苍苍、身材瘦削但精神矍铄的老人按立了天明牧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谢伯伯。当时并不知道这位老人的姓名，问及认识的姊妹后才得知是谢模善牧师——一位为着信仰的缘故受了很多苦的老牧师。

之后，为着求教如何向家中的父母传福音的缘故第一次去到了谢伯伯家里，房间的摆设简单整齐，而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客厅里竟摆了两个大小不一的书桌，大书桌是给谢伯伯读经灵修准备的，而对角的小书桌则是师母用来读经灵修的，两位当时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都一直坚持每天读经灵修。两位老人得知我的来意后，不仅跟我谈了很久，而且送给我一些很实用的传福音书籍。就这样，渐渐地我成了老人家的常客，当他们得知我独自一人在北京时，常常带我去吃各种好吃的，我也因此第一次尝到了狮子头、三



黄鸡等很多江浙菜。

2003年北京非典，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我必须每天坚持上班，尽管我自己对此并不以为然，但真正让我心里平安的是我在非典期间探望谢伯伯时，老人拿出圣经翻到《诗篇》91篇告诉我神看顾我的确据：“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诗篇 91:7）在那个恐慌的时期，这种确信告诉我神在看顾我，神在我身上的旨意还没有完成，即便我被传染，神也一定会医治我。

2004年因工作原因离开了北京，2008年再次回到北京工作时，我第一时间通知了老人家我回来的消息。再次看到两位老人，看到年迈、浑身是病的师母尽心尽意地照顾谢伯伯，我的心里说不出来是啥滋味，只是在心中告诉自己要尽可能地多来。碰巧主日聚会地点——华杰大厦离谢伯伯家很近，每次聚会结束，我都会问问他们是否在家，是否方便过去？每一次我去谢伯伯都会让我告诉他



聚会谁讲道、讲了啥内容等等问题。九十多岁的他已经不太有力气讲很多话，但却常常让我告诉他教会的点点滴滴。守望教会 2008 年建堂，2009 年 10 月底被迫离开华杰，2009 年 11 月的户外敬拜，他都一直在关注，每天都和师母为教会祷告。当我将 2009 年 11 月教会户外敬拜的光盘给他时，他让我马上放给他看，并且不顾身体状况，含着眼泪一口气看完了整个光盘。在从谢伯伯的追思礼拜回来的路上，我从一位常去他家的姊妹那里得知，那张光盘他自己不知看了多少遍，而且让他身边的弟兄姐妹也看。

今年 4 月，谢伯伯因病住院，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去看他时，他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饮食也只能靠一些半流质和流质食物维持。但他见到我首先问的却是教会如何、弟兄姊妹如何、天明牧师如何、恩平师母如何……并说他和师母一直在为教会、为他们祷告，可否能在回扬州前见他们一面？当我从教会网站中得知谢伯伯为教会在呼吁书上签名时，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当时已经起不了床、话都没力气讲的他又是如何费尽全身余力在呼吁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6 月 30 日 12 时 20 分，在弟兄姊妹的赞美诗中，谢伯伯回到了天家。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我真不愿也不想接受谢伯伯已经回家的事实。十年来我已习惯他就去看他，已习惯每一次灵性低潮都会去他那里，已习惯碰到不知如何是好的事情都去找他。每一次只要看到他坐在那里，我对神的信心和仰望就会再一次地油然而生。与其说我常常去看他们，倒不如说谢伯伯和师母用他们的生命以及对神的坚信吸引了我的脚踪。认识谢伯伯十几年，

他从未在我面前提过半句他曾经为着信仰的缘故所受的苦，听到的只是老人对教会、对弟兄姊妹的无比关爱。

正如在谢伯伯追思礼拜上周明牧师所说的，谢伯伯的英文名叫摩西，谢伯伯的回家代表了一个时代——摩西时代的结束，摩西时代的结束意味着约书亚时代的开始。就像神当年在约旦河边、在摩西离开后对约书亚说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书 1:1—9）今天，当神的老仆人谢伯伯离开了我们，神似乎依旧用同样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书 1:1—9）

看，圣灵的感动

——读优西比乌《教会史》

文 / 小雪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会史家，被人称为“基督教会史之父”。他生活在公元3世纪到4世纪，大约是中国三国末期到晋朝。活了近80岁。

什么东西占了第一就大不一样了，难怪新时期文学开始的头十年，有不少聪明的作家跑马圈地，占领某某写作第一人的位置，那是一个不断突破禁区的时代，第一如雨后春笋（真俗的表达）。不过当第一也并不那么容易，后人可以对前人诸多挑剔，就如我们曾经特别不屑那些第一个写爱情，第一个写性，第一个写乱伦，第一个写反右，第一个写红墙内幕等等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有时候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文学史上留下的那些痕迹是无法抹掉的。今天的史学家也可以就优西比乌的《教会史》提出有理有据的批评，姚西伊的“中译本导言”就针对其中“西方中心”、“精英焦点”及对君士坦丁带来的“基督教王国”不遗余力的吹捧等多有针砭，实在是极有学术分量的好文章，对我们这些对于教会史的研究成果几乎一无所知的读者来说近于振聋发聩。我对该书的编者能收入这样犀利

的“导言”而深感敬佩。但是这不会撼动优西比乌教会史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在读这本大部头之前我就已知许多早期教会的殉道资料被收集在其中，一读果不其然，殉道的过程描写确实很血腥，是一种直接的生理刺激。但是让我内心震撼的却是书中的一头一尾。

一头是书中的第一卷：耶稣其人其事。

大凡刚信主的基督徒多从《马太福音》开始查经，也就常听到关于耶稣家谱的一个解释：为什么《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的家谱不一样呢？因为马太记载的是约瑟的家谱，路加记载的是马利亚的家谱。当我开始带领《马太福音》查经时，读到丁道尔的《马太福音》释经书，那里面认为这个说法没有根据，犹太人没有记载母系家谱的传统。作者认为马太记载的是耶稣的法统——即约瑟属于王室的家谱，而路加记载的是耶稣的血统，即约瑟的真实出身。造成这个差异存在但又能够合理解释的原因是：约瑟被过继给了王室后裔。

我为这个解释雀跃不已，以为这是很有创

见性的发现。读了《教会史》才知道，在优西比乌时代，家谱问题就是用这个思路解释的，实在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们使劲儿努力，以为跑了很长的一段路途，殊不知只是跑了一大圈儿，回到早期教会的释经思路中去了。上帝真幽默。这让我想起我一位搞社会科学的朋友，他经常的苦恼是：不知道自己苦心孤诣的研究发现是否早已经被前人讲过了，而自己囿于视野局限还在那里孜孜以求。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常常不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是照着前人的屁股狠狠地踹上几脚。谁敢说自已一定比两千多年前的墨子、庄子、韩非子——孔孟就不比了——高明？悲剧的是一脚踹空，闪了自己的腰。

优西比乌的《教会史》最让我震惊的还是末尾部分。

在君士坦丁执掌罗马政权并优待基督徒之前，罗马帝国范围内最后一次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是戴克里先执政期间。这也是优西比乌亲身经历的大逼迫。

（虽然优西比乌“偏好记录光辉故事”，但是他还是如实记载了一些人被酷刑和死亡吓倒，由此放弃或暂时宣告放弃信仰。度过了极端严酷的逼迫进入相对和缓期时，如何面对软弱跌倒的肢体几乎造成教会的大分裂。而某些异端也遭到与基督徒同样的迫害——说起那些“弗吕家异端”，他们沉溺于癫狂状态，竭力追求灵魂出窍、说方言等等，似乎让人看见当下极端灵恩派的影子。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

优西比乌这样说：“在我所处时代的迫害到来之前，敬畏上帝的消息借着基督在全世界的传递，所有的人，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都把此消息当作荣耀与自由。统治者们一方面将我们的人民从异教献祭的折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善待他们，甚至容许他们掌握行省大权。在皇宫中，皇帝们容许

皇室成员——妻子们、孩子们和仆人们——公开践行信仰……所有总督都对教会领袖礼遇有加，每座城市都有大型聚会，会众进行崇拜的旧教堂已被宽敞明亮的新教堂取代。”

但是，优西比乌敏锐而且勇敢地指出：“更大的自由也带来傲慢与懒惰。我们开始互相嫉妒和彼此攻击，以语言为武器的战争由此爆发。教会领袖攻击教会领袖，平信徒之中则派系林立、彼此对抗，那种不能言喻的伪善与借口都已达到了罪恶的极致……由于身陷愚昧，我们没有努力向上帝赎罪，而是像无神论者那样，假想我们的事不会被上帝注意到，于是我们从一种邪恶步入另一种邪恶。那些被当作牧师的人，丝毫不因敬畏上帝而受到约束，彼此之间激烈争吵，只是为冲突、威胁、妒忌和怨恨添油加醋，并且还疯狂要求得到梦寐以求的残暴权利。”

这还是早期教会光辉灿烂的模样吗？优西比乌不怕被他的读者谴责他抹黑殉道者吗？我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哦！

且看优西比乌老人家的胆大激烈：

“最后，当仍然有很多人参加聚会时，上帝的审判以其惯有的怜悯逐渐开始介入，迫害从我们军队中的弟兄开始……于是，正如耶利米所记述的，主在羞辱自己的女儿锡安城，并且将以色列的荣耀从天扔下（哀2：1—2）。而且，正如《诗篇》所预言的，他弃绝与仆人所立的盟约，并且——通过毁坏教会——把自己的至圣所践踏于地，高举他仆人仇敌的右手，不在战斗中扶持他仆人，让他仆人蒙羞。”

看，圣灵的感动让优西比乌写出了什么？没有比真实更合乎上帝心意的写作了。优西比乌如此热衷描写殉道者们的勇敢，坚定，圣洁，面对死亡时的从容无畏，他怎么会容许这些有损教会形象的文字记录存在？但是，他写下来了。我只能相信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上帝要借优西比乌的笔让我们知道：早期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其中就有这样的教会领袖，这样的平信徒。但是上帝的工作就在这样的人中间显明，他拣选那些未向巴力屈膝的勇士，保守他的教会有根有基地传承下来。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教会领袖和信徒们不犯错误上，而是建立在上帝超然的工作上。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为尊者隐，为长者讳的。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思想，从来没有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对于基督徒来说，为尊者隐更加上一层属灵的意味，为尊者隐就是为教会隐，为教会隐就是为上帝隐。问题是上帝需要我们用隐瞒的方式去维护他的名声吗？恐怕我们常常只是窃取了神的荣耀，却

羞辱了耶稣基督的名。

上帝恨恶罪恶的本性没有变，他的审判总是先从他的家开始。教会想得到圣灵的恩赐吗？想得到使徒们那样的能力吗？想具有初代教会那样的复兴吗？让我们先从清理教会的罪开始。历世历代的教会复兴也是从认罪悔改开始。别让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恩典和作为变成我们骄傲的资本，别把教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事业，而要对上帝的托付恐惧战兢，小心谨慎地传递圣言。哦，愿曾经感动过优西比乌的圣灵今天依然感动他的教会！■

（《教会史》，优西比乌著，瞿旭彤译，三联书店）





百年余音今犹在

——读《回首百年殉道血》有感

文 / 凯文

当年纪念义和团事件一百周年的种种热闹仿佛还历历在目，转眼之间，如今又到了一百一十周年的纪念日了。十年又过去了，百多年前那场骤然而来的腥风血雨留在国人脑海中的印象依然那样鲜活，它在后人中所引起的争论依然热度不减。对海内外的华人信徒来说，它依然在不断引出无边的怀念和反思。

特别让我想到最后这一点的是住在美国的黄锡培弟兄。他原本是一位土木工程师，退休之后，致力搜集和整理内地会传教士传记材料，成绩斐然。他的《舍命的爱——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小传》一书在2006年出版之

后，以其详实的内容和对传教士事迹的感人叙述，获得了华人教会读者们的一致好评。之后，他又再接再厉，编写完成了《回首百年殉道血——1900年义和团事件殉道宣教士的生命故事》（美国中信出版社，2010），该书于2010年年初问世。

从性质上来说，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一部关于在义和团事件中死难的基督新教宣教士的资料汇编，其内容十分丰富。此书的篇幅长达近八百页，共有十一章。其中第三至第八章是本书的主体。在这几章中，编者大致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在山东、

河北、北京、山西太原和其他县市、内蒙古诸多教案中西方宣教士殉道的故事。全书的最后三章可算是总结，分别讲述了义和团事件平息之后的赔偿问题，传教士在教育、医疗、赈灾和社会服务诸方面的贡献，以及教会在大难之后的恢复和成长。这本著作虽篇幅浩大，但绝非流水账式的资料堆砌。它对中国基督徒的灵修和如何认识义和团事件都极有帮助。

在基督教的灵修传统当中，殉道者历来是极受尊崇的对象，所谓“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德尔图良）。故而讲述殉道者事迹的文字从早期教会时代起便不绝如缕，成为历世历代信徒的极大鼓励。改教运动以来，这方面的经典著作当推主要记载16和17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殉道者的《殉道者之镜》（*Martyrs Mirror of the Defenseless Christians*, Thieleman J. Van Braght, 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1951）。在中国教会史上，为福音抛头颅、洒热血的基督徒也是成百上千，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殉道之事尤为集中。过去，也一直有相关的文字陆续出现，但是集中记载中国教会史上殉道者的著作并不多见，特别是20世纪下半期之后就更为罕见。《回首百年殉道血》的问世可谓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为华人教会灵修传统的延续和当代建构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源，其内容和行文可读性强，可说是中国教会的《殉道者之镜》。

《回首百年殉道血》这书记载了全部189位西教士殉道者，当中以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宣教士居多。编著者在收集编纂过程中的态度极为认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前，无论是教会界还是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之中蒙难传教士的了解和研究十分零碎、片面、有限。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第一次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如此详细和全面的图画，让我们对这批蒙难的宣教士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

诚如该书中的一篇序言所言，“他们从此不再是模糊不清、遥不可及的无名殉道者，而是有血有肉地活画在我们眼前的人物。他们殉难前留下的书信、手札、遗言，经过百年沉寂，终于重新发出嘹亮的呼声！”（VIII）最让人惊奇和感叹的是，当他们蒙难之时，只有五人年龄超过了五十岁，成年人当中有77位女性，儿童殉难者占到了全体的四分之一！这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各差会及其宣教士们所遭受的创伤之大，以及义和团之暴烈冷血、滥杀无辜的行径！

不过，最会让今日的信徒们震撼和感动的是当年那些殉道宣教士无怨无悔、视死如归的精神。譬如，1900年8月初，爱尔兰籍的宣教士艾丽莎（Mrs. Lizzie Graham Atwater）师母在临刑前写给亲人的信中说：“我腹中的婴儿会与我同去，我想神会在天堂里还给我，同时，我亲爱的母亲会欢迎我们。我不能想象救主将怎样来迎接我，但深信一定能补偿现今那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悬念。亲爱的，多亲近主，少抓住世界。除他以外，再无别处可以寻得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了。……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670页）这样的血泪文字读来让人心酸泪下，更让我们体会到西教士对中国的大爱，以及背起十字架的坚毅不屈。大难过后，内地会拒绝就西教士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向清政府索赔一事更是体现了基督徒爱邻舍的宽恕精神（695—696页），但可惜此事至今尚不广为人知，值得今后大书特书。

毋庸讳言，如何看待义和团运动历来都是极有争议的，非常容易出现两极化的现象。基督徒与世俗学术界的某些人物往往各执一端，自说自话。前者多强调义和团事件中西教士和华人信徒的英雄事迹和牺牲，以及针对他们的种种暴虐和杀戮；后者则只看到西方列强对中国多年的侵略和欺凌才是义和团

爆发的主要原因，而基督教作为列强的帮凶，也难辞其咎，甚至咎由自取，而义和团本质上是反侵略的正义之举。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看法和评价虽趋于客观，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义和团的落后、野蛮和盲目排外的性质，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和思想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对义和团的肯定，以及对基督教宣教事业的批判之声又开始有所增强。例如近年来有论者称：“义和团兴起，说明民心未死，天地间良知尚存。”（颜炳罡：《心归何处？——儒家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115页）可以说，教会与社会在义和团问题上的认识落差依然相当明显而深刻，结果是双方在此问题上极少面对面地认真对话，偶有碰面，也往往流于情绪化的抨击，甚至擦出活火。这个死结的存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会在中国社会中展开冷静而有效的对话和护教，阻碍了教会正面社会形象的树立，给了那些攻击基督教是不知爱国的“洋教”、“外教”的人士以口实和弹药。

在今日纪念义和团事件110周年之际，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呼吁中国学术界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另一方面也要问我们自己，基督徒在缅怀为福音摆上生命的西教士和华人信徒，指斥撒旦借着义和团之手所施的暴行的同时，是否也可以直面宣教士与西方殖民势力一起来到中国的不幸历史事实？是否也可反思部分宣教士对福音事业与列强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处理失当，而使得前者与后者扯上了不清不白的瓜葛？是否也可以更多地承认导致那场大事变的中华民族在列强手中所遭受的多年屈辱，以及无辜的非信徒同胞所遭受的苦难？是否也可以带着饶恕的心，看到当年的义和团成员“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否在向外界澄清当年的历史真相，传扬西

教士的美好见证时，能够采取更为客观和冷静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从教会先辈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在事奉中变得更有智慧，对历史的认知更为全面，并且因此能够化解部分国人对教会的偏见，这不正是对当年的那些殉道者们的最好纪念吗？

正是在这个方面，《回首百年殉道血》的编者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虽然主要是为信徒和教会而编著此书，但对社会上各家各派之说不回避，力求公允。譬如，在义和团事件的整体评价问题上，能够把各主要派别的立场都摆出来。在材料的搜集、阅读和选择上，除了依靠教会和基督徒的出版物之外，也收纳教外人士的记录和研究成果、清政府的档案、甚至某些反教人士的言论。而且，对于西教士某些错误的做法和说法也能够予以指出。譬如在提到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在1900年10月23日回到纽约时特意身穿在北京被围时的衣服，挎上当时所使用的步枪，并照相留念时，编者便颇不以为然(684页)。这些处理方法都有别于以往由信徒执笔的文字中容易出现的一味颂扬，为尊者讳的习气，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所走出的难能可贵的一步。

总而言之，黄锡培编著的《回首百年殉道血》一书雅俗共识，在华人教会灵修传统、中国教会史和义和团研究方面均有建树，值得推荐。透过这部书中大量的见证和其他材料，110年前那场举世震惊的事件仿佛又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拳民的呼喊声和宣教士的祷告声仿佛又在我们的耳畔响起。读罢掩卷，我们悲愤，我们痛心，我们沉思，我们奋起。我们也切盼着，在120周年纪念日来到之时，我们也能听到百多年前伴随着西教士一同殉道的诸多华人信徒们的声音。■

(《回首百年殉道血》，黄锡培编著，美国中信出版社—海外基督教使团)

山西忻州百年福音堂 保护活动始末

文 / 麦克



忻州传教士纪念碑现状

一、忻州百年福音堂沿革

忻州基督教会早是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设立的。1883年，时在太原的李提摩太赴忻州布道后，即请浸礼会总会派人到忻州设立教会。1885年初，德治安 (Joshua John Turner) 牧师来忻州传道，有来自山东的信徒赵夏云同工，将福音传至南张村、庄磨镇、刘家山一带。1887年，邸松牧师（赫伯特·狄克松）从太原来忻州医疗传道，不久德牧师回国述职，邸牧师就此负责教会的工作。马牧师（威廉斯·麦可拉奇）、燕教士（西尼·恩纳尔）和任教士（女，贝茜·雷诺）等前来协助。1899年1月，浸礼会李提摩太牧师在三家店购地四十余亩，作为建堂之用。这年春天即开始建造教堂及其配套建筑，经一年多的土木建设，至光绪庚子年五月，教堂接近竣工之时，义和团运动勃兴，教堂遭到抢劫、毁坏。邸松牧师等八位传教士在城东门瓮圈被义和团残酷杀死，为主殉道。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教堂得以修复重建。教会事工日

益兴旺，除传播福音外，还开学校，办医院，做慈善，造福忻州民众。抗日战争时期，福音堂一度成为当地居民的避难所，教会给难民无偿提供住宿和饭食。1941年，日本侵略军驱逐英国牧师，强占教堂，将它改为当地侵华日军司令部。1948至1966年间，又成为中共晋中一地委（后称忻县地委）和公署专员的办公室。前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曾经在这里担任过宣传部长，在这里留下许多活动足迹。后来，此地又为忻州纺织厂占据。近年，该纺织厂（现名云河集团公司）以650万元的价格将此地卖给五台山普寿寺。2011年2月29日（正月十九日），普寿寺主持率四百多僧众举行开土动工洒净活动，宣告投资8800万元的五福清泰安养园正式启动，园名取自《五福经》，五福是指：一长寿、二大富、三端正、四名闻、五智慧。据规划书介绍，五福清泰安养园建成后主要用于养老，其中还包括寺庙建设、老人饮食起居、定期举行的居士学习班、平时接引居士来修学及世间的旅游等。忻州教会一直存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没

有能够及时收回教产，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2006年9月16日，忻州基督教会正式向忻州市政府提交《关于请求归还教产报告》，并附上了《忻县志》、《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等证明材料，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批复，而佛教安养园很快开工。

二、保护忻州百年福音堂活动始末

2011年5月3日，山西忻州一信徒以“一粒麦子儿”网名发出一条微博：“山西忻州有座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盖的教堂，连院子占地40亩。当年8名传教士为了传扬耶稣，被义和团所杀。这块地方今年被五台山和尚花650万买走，据说要盖庙。当地基督徒心痛，心急，可苦于没有地契等证据，眼睁睁看着遗迹被拆，被毁。”

5月4日晚7点，我看到了此条微博，随即予以回应：“希望当地教会根据历史资料与当地政府和买家交涉，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个人，取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愿主纪念你们的忠心！”并且转发了网上安东尼博文《1900山西忻州教案》和博凡博文《忻州教案圣徒殉难碑寻访记行》。

5月5日上午，又发微博呼吁大家起来保护：“请大家都来尽一份力。‘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来13：7）该站出来的时候，请站出来。儒家们为不让在曲阜盖教堂都组织起来发动一波接一波的签名运动，难道基督徒只能眼睁睁看圣地被毁吗？”并且提出具体行动方案：“曲阜教堂还在规划中，儒家们就起来联名反对了；忻州教堂屹立了百余年，基督徒就一声不吭让它被毁掉吗？建议给山西省文物局、宗

教局写公开信，征集基督徒和各界热爱文化、文物人士签名。要求：1、保护文物；2、落实宗教政策，还教堂给教会；3、让基督徒与佛教徒和平共处。”随即有30多人跟进。

5月6日，向网友推荐任复兴先生博文《追寻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者们的血迹：山西忻州礼拜堂、洋人窟和洋人坟掠影》和美国普度大学张海燕博士博文《忻州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传教士遗迹考察记》；下午6点多，“一粒麦子儿”上传忻州百年堂今昔照片，其中高高吊车与被拆教堂残破景象并陈的照片尤其引人注目，令人痛心。一时间，大家对忻州百年福音堂关注度上升，3个小时内，就有122人转发，46人评论。

5月10日，何光沪、张海燕、赵晓、谢文郁、石衡潭、李广平、查常平等十三位文教人士在博客上连署发表《尊重历史文化遗迹，救救百年福音教堂——就山西忻州英国浸礼会百年福音堂行将被毁一事的建议书》，并且通过微博予以宣传和寻求支持：“有人不让我们盖教堂我们不吭声，有人要拆我们的教堂我们也不吭声吗？我们已经发起抢救忻州百年福音堂活动。请大家予以支持！”随后，关注此事和响应的越来越多，到5月26日，已经有一百多人在建议书上正式署名。相关的宣传活动也在网上展开，如“教牧杂志”提供了介绍殉道传教士的系列图片与文字，其中包括在忻州殉道的马牧师等人，还有人提供了有八十多年历史的武汉救世堂因学者和网民的呼吁而被保护下来的情况，关于忻州教堂的更多照片与材料也上传到网上，特别是五台山普寿寺佛学院的运输车在忻州教堂工地的照片也传上来了。这些都使忻州百年教堂保护事件不断升温。各界人士也在通过不同渠道多方努力，5月13日，天津市人大

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杨佳智先生私信山西省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李俊峰主任请求对此事予以关注；5月20日，忻州基督教会向山西省基督教两会提交报告请求支援；还有人通过忻州市市长信箱和山西省省长信箱递上建议书。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网上和他处，而处在现实漩涡中的忻州，还不见有任何动静，不见有政府方面的任何表态。忻州教堂及其附属建筑还在一间一间地被拆，佛教工地还在一层一层地建，忻州弟兄姊妹心急如焚，欲哭无泪。这时，有个博友“耶稣爱你 70x7”说：“真的是很可惜，不过，大家一定不要有怒气，要安静下来，寻求神的心意，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为此事来祷告。”我忍不住予以回复：“怎么不能有怒气，为什么要安静下来。不知道耶和華神有烈怒吗？不知道耶稣掀翻圣殿内做买卖的桌子吗？都不做声，都不行动，如何能够保护耶和華的产业！”

5月25日，佛教工地施工人员就要拆毁百年福音堂主殿了，忻州教会的弟兄姊妹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集合起来，走上了工地，打出了三条大型横幅：“尊重历史文化遗迹，救救百年福音教堂。”“信仰自由，理当尊重，不可偏废。”“珍贵文物，觅且不得，毁之何忍？”这三条标语出自《尊重历史文化遗迹，救救百年福音教堂——就山西忻州英国浸礼会百年福音堂行将被毁一事的建议书》的三个标题。5月26日上午，忻州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忻州百年福音堂事件，对佛教工地作出暂时停工的安排，也告知教会李雁堂长老等4人，不得继续打横幅到工地。5月27日上午，施工方人员再次试图拆毁福音堂大殿时，被在此值班的忻州基督徒发现，十



几个姊妹立即自发前来，对他们的行为予以阻止，使百年圣殿暂时免于被毁。5月31日，《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特约记者沈颖采访张海燕博士谈八位殉道传教士《忻州日记》的文章《寻找沉默百年的逃亡日记》，中新网山西新闻网站等重要网站也对此文予以了转载，王志安、薛兆丰等知名人士也大力推荐，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忻州教会与当地政府继续交涉，政府终于勒令佛教工地停工，并限教会在1个月内提供忻州百年福音堂的教产证明材料。

寻找教产证明材料的重任落在美国普度大学张海燕博士身上，正好，他6月份要去英国出差。为了寻找证明材料，他修改了自己的旅行日程，去威尔士造访了在忻州殉道的邱松牧师的曾孙女，得到了邱牧师家信照片等珍贵材料；又访问了英国浸礼会总部，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卷帙浩繁的档案文件（包



李提摩太所建百年福音堂即将被毁

括财务报表、书信、教会杂志、报纸等等)中，终于找到了有关于忻州百年福音堂教产证明的原始文件。回到美国后，张博士又加班加点将文件整理编号成册，并且一一翻译成中文，终于编成长达 65 页的忻州福音堂教产证明材料。他将材料电子版传给忻州教会，同时，把原件快递回来。

这期间，忻州教会一直在焦急地等待，也在为张海燕博士迫切地祷告，同时，他们也在搜集当地一些历史见证人的口述史料，如王喜娥老人(91岁)证明：“我是个老忻州人，从小跟爷爷多次上三家店聚会。那里有四十亩地，是洋人牧师买的。洋人出钱盖的，有教堂、查经房、育婴房、住房，有很多、很多房子。三家店的事情我什么都知道。我去的次数多，那里的事情我都知道。后来日本人来了，忻州很多老百姓到三家店避难，洋人给吃，给住，洋人帮助了受难的老百姓很多。我还在三家店

住了三个月。我特此证明，三家店是洋人买的，盖的，必须还给基督教会。”李慧杰老人的证明：“我今年 92 岁，在年轻的时候，去过三家店，知道那是英国人所买的地方，并与中国的基督徒共同建造的，是耶稣教活动的场所。有牧师，有聚会，敬拜神。礼堂很多，还有学校，医院和养婴堂。”等到证明材料比较齐全了，他们马上编辑打印，拿出了三大册材料，及时提交给了忻州市政府相关部门。

为了把忻州百年福音堂保护下来，推动基督教文化建设和造福于忻州当地，十六名文教人士连署发表了《关于建立“忻州记忆”中国近代史遗迹主题文化公园的建议书》，也得到了各方人士的积极支持与响应。当然，其具体实施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与讨论。之后，此事进入等待期。6月18日，我们发出《关于“忻州记忆”义演活动致北京市基督教会倡议书》，希望以北京的教会为起点来支持忻

州教会，并引向其他重要城市。因种种原因，这一倡议没有得到积极回应。7月14日，我们再次发起《唱响“忻州颂”，重走殉道路》活动，得到了各地部分基督徒的响应，不少人已经买好火车票准备去忻州，由于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他们最终没有成行。但7月31日，“忻州颂”还是在忻州教堂唱响起来，有900多信徒及各界人士参加了这一赞美会。弟兄姊妹以朗诵、唱歌、跳舞等形式来赞美主恩，纪念宣教士，气氛庄重、欢乐、昂扬、热烈，催人奋进，引人深思。在当年传教士颠沛流离、躲避残杀的七月，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传唱红色歌的七月，“忻州颂”以赞美诗唱响了最美的音符。

7月12日，《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刘栋文章《恢复忻州百年堂的努力》(Attempting a resurrection, Global Times, July 12, 2011 19:07 By Liu)，继续对保护忻州福音堂事件予以报道。

8月16日，基督徒演员孙海英在其微博上评价了诗人沙光6月8日对忻州百年教堂事件的报道：“谁敢夺这地就要付出代价！他们不敢！”再次引起热议。不少好事者试图引发基督徒与佛教徒的大战，但没有得逞。

时至今日，忻州百年福音堂的最终地位尚未确定，还需要大家的迫切代祷！

三、对事件的反思：

忻州百年福音堂在行将被毁、千钧一发之际，得蒙保守，体现了神的慈爱并大能的护佑，也包含了众弟兄姊妹的与神同工，也有社会各界正义之士的鼎力相助。在这件事上，有这样几点值得肯定。

1、发现问题，及时回应。当今之世，事

件繁多，纷至沓来，牵涉到教会的事情也有不少，如果不及时发现和提出，并采取果断措施与行动，就可能事无补，永留遗憾，但如果拍案而起，就有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2、网上网下，互相配合。由于互联网的存在，特别由于微博的兴起，人们的信息传递与交流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忻州教会收回教产的请求在2006年就正式书面提出来了，为什么那时候没有什么效果，而到2011年就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呢？不能不说是互联网和微博起了很大的作用。微博在很短时间内把力量凝聚了起来，又发散开去。通过互联网，异地的人能够及时传递信息，形成一致的决定与行动，这都影响了最终的效果。

3、相对中心，各自为阵。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事件产生，一项活动的发起，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绝对的主导者。这就需要每个人发挥自身积极主动性，敏锐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行动，这样，就有可能推动事件，产生良好果效。

当然，在这一活动中，暴露出来更多的是问题。有如下几个问题供思考。

1、在神学思想上混乱，缺乏应对这种事件的一致的合理观点态度。从保护活动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存在着争论。争论的核心还不是如何保护，而是要不要保护？该不该保护？有不少人发表这样的言论与观点：“神不住在这人手所造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当以天父家的事为念！”“神岂住人手搭建的庙宇么？这种文物，不重要，我更关心100年后福音在当地人民心中的鲜活果子，而不是迟早败旧的殿堂。真正的行动，应该是去那里，与弟兄姐妹交流分享学习属神的话语。”“反正末日来临一

切都要毁坏。世间之物转瞬就腐朽。唯有圣灵充满的灵魂才是永恒的。”还有人质问：“在圣经中哪里有用这种方式来跟政府交涉的？”为此，我们不得不在5月27日这个保护活动最关键的时刻发表《保护忻州百年教堂活动不符合圣经吗？》一文来统一大家的认识。“大家一起来讨论：到底保护忻州百年教堂活动是不是人意？基督徒应不应该参与社会活动又应该如何参与？什么才是多做主工？难道只有在教会内敬拜、赞美、祷告、读经才算吗？什么是传福音？难得只有一对一地传讲、一个一个地发福音单张才算吗？什么是做见证，难得就只有说疾病得医治、先抗拒后悔改才是吗？”由思想不一致而带来的是缺乏连接，合一不够。在征集发起人时，有的一听是李提摩太创立的教会就退避三舍，不愿再言。后来，在寻求支持时，也有的因派别不同而不屑一顾，甚至恶语相加。殊不知，耶稣曾说：“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路9:50）

2、行动能力不强。不少基督徒习惯于封闭式的教会生活，而不愿参与社会活动。对于这种事情，也不知如何应对。很多人在强调祷告，多祷告。我们并不反对祷告，而是呼吁大家迫切祷告，可是反对只祷告而不想采取任何行动。我们认为，在具体事件中，祷告应该为行动开路，如果在需要行动时，完全以祷告代替行动，并且反对别人采取行动，这是不太合适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行动，而是如何采取行动。总的来看，我们提出的三大目标基本合理，所采取的行动还是比较妥当的。关于公开信，2010年底有十位儒学学者的《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他们提出的要求比较直接，也比较硬。我们写的是《建议书》，措辞比较温和，语气比较委婉。以微

博作为主要阵地也是适应时代的体现。在活动过程中，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方案，不是为反对而反对，而是希望有利于教会和政府、社会各方。但跟进的人还是不多，特别是在建立文化主题公园的设想上，愿意真正把它变成现实的人很少，愿意真正付出的人更少。

3、视野比较狭窄。不少人认为教会要做的是建造教会、传扬福音，而这样的保护工作充其量只是保护文物，没有更大意义与价值。殊不知这不仅是保护文物，保护基督教文化，也是在建造教会，振奋人心，更是一场传福音的活动。就目前情况而言，这次活动已经初步达到目的。（1）暂时保住了教堂。（2）加强了弟兄姊妹的信心和热心，特别是对于忻州教会而言。在这次活动中，差不多每一个信徒都被调动起来，积极参与，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光“忻州颂”那天的活动就达到了近年之最。（3）使传教士事迹广为人知，也传扬了福音。但是，更多的人眼界没有打开，对教会的事工还停留在传统的理解上，所以，没有更积极地参与。这次活动还只是平信徒散兵游勇式的参与，而作为整体的教会没有参与进来，也关注不够。

总之，通过这一事件，我们要看到教会在面向社会、应对事件、拓展事工、更新观念、寻求合一等诸多方面的不足。我们所面对的是瞬息万变而又息息相关的世界，教会更要有大公意识、肢体意识，不能光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能只以地上的事为念，也要以天上的事为念。同时，教会要有面对新时代、新世界的新态度、新方法、新观念、新胸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12:2）

换药不换汤



在纪念中国的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
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关于变革的洞见值得重视

文 / 许宏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人免不了不满。因此，人要改变现状。然而，真正的改变是不容易的。形式也许变了，实质往往还是那样。

是否可以先让形式保持不变，而改变实质呢？对于推动实质上的改变，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曾经分享过他亲身经历中的一个发现。

在当今世界，汉迪可能是欧洲最富盛名的管理学家。在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于 2005 年去世之后，汉迪大概是在世的著名管理学家中最接近德鲁克思想的人。但是，对于汉迪的这个发现，人们大多似乎还没有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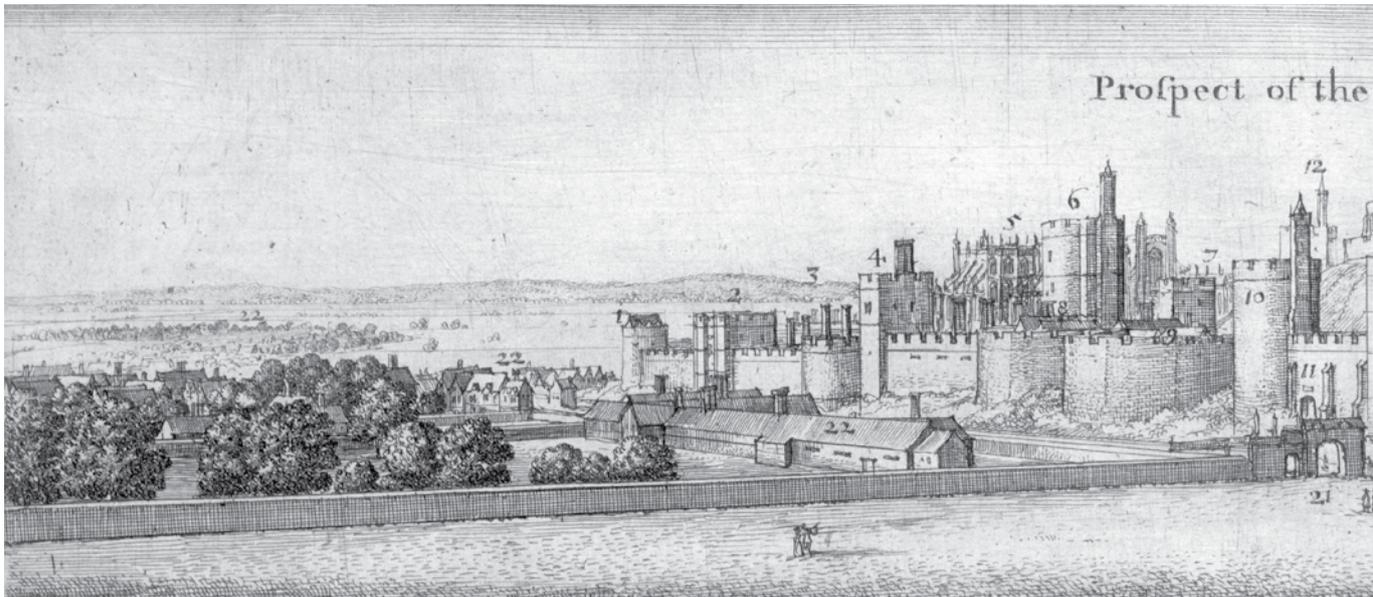
温莎城堡的不变和变

1932 年 7 月 25 日，汉迪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附近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是当地基督教会的一名牧师。上大学时，汉迪在英国的牛津主修古典学（包括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历史和哲学。

毕业后，他在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工作将近十年。接下来，汉迪去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管理学，回到英国参与创办了伦敦商学院，并在那里讲授管理学。

1977 到 1981 年间，汉迪从伦敦商学院离职，担任圣乔治学房（St. George's House）的学监。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校，是一家位于英国王室温莎城堡内的培训机构。1966 年，英国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公爵在城堡中的圣乔治教堂创建了圣乔治学房，目的在于组织关于信仰和其他各种公共话题的讨论。

汉迪在温莎城堡工作时，也住在那里。他经常邀请参加圣乔治学房讨论的人参观温莎城堡。他告诉人们，这座城堡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英国王室的住地。到如今，不仅城堡还在，城堡的主人依然是英国王室。表面看来，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英国王室的实质却大不一样了。形式上，英国国王仍然是英国国家元首，但这个职位的权力已经大大受到限制。



从这个发现，汉迪引申出一个建议：当你身处的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你让形式保持不变而改变实质，真正的变化可能比较容易实现。

王国=封建专制？

习惯了换汤不换药的改变，汉迪在温莎城堡看到的历史变迁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从国家的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地方在过去上千年已历经很多治理形式的变迁，不仅君主制已被推翻，共和制的政权也已经历若干更迭，但是统治的实质却变化不大。

比如，仅仅在 20 世纪的 100 年当中，中国就经历了至少三次形式上的大变化，国家的名称从大清王朝到中华民国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 年就是标志中国从君主制向共和制转变的辛亥革命 100 周年。然而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真正改变统治实质的变化。

英国是如何实现保持形式而更换实质的改变的？汉迪给出的答案仍然跟他曾经工作和居住过的温莎城堡有关。他说，在 121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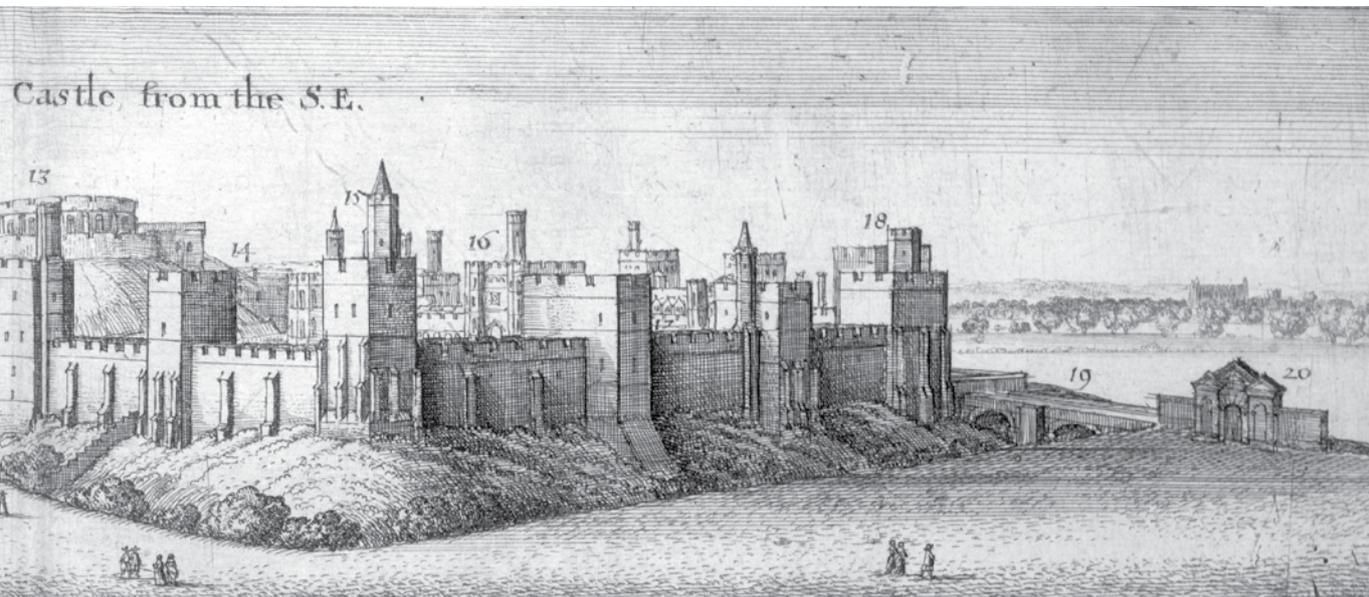
的一天，当时的英国国王约翰从温莎城堡的院子出去，在泰晤士河附近的一处草地跟教会和贵族的领袖们签署了一份旨在限制君主权力的文件。

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大宪章》(Magna Carta)。当时，英国跟法国作战，英国国王约翰因为需要更多战争经费，就向公众提高税收。以教会和贵族的领袖组成的公众反对国王的做法，最终迫使国王约翰在 1215 年的 6 月 15 日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要求。

《大宪章》规定，国王提高税收必须经过议会通过，不经法庭裁决，不得将任何自由人逮捕囚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

在约翰王统治的时期以及之后的几百年，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行。但《大宪章》却影响深远，17 世纪英国的《权利法案》和 18 世纪的美国宪法都是《大宪章》的重申、修订和补充。今日世界，那些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秩序都跟这些规定的推广有关。

在英国的历史上，虽然也有查理一世这样的君王在 1649 年被砍头，但总体却保持了



实质大于形式的变化。直到今天，英国仍是个王国，但恐怕很少有人会把它跟所谓的“封建专制”联系在一起。

不过，改变统治实质而保留形式的做法却不是英国的独有现象。在国王约翰当政前后，欧洲大陆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从12世纪后期到14世纪初，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匈牙利，以教会领袖和贵族组成的公众都曾经迫使君主签订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宪章。

当然，比较欧洲其他地区的宪章，英国的《大宪章》更为世界所知。在《大宪章》之后的几百年，英国的动荡相比欧洲其他地区要少，这使得英国得以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实现持续的发展。到了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权的更替基本排除了通过暴力取而代之的方式，保持形式而改变实质的做法得到比较完整的贯彻。

总体来说，相对世界其他地区，欧洲在对政治变革的问题上比较倾向于走保持形式不变而改变实质的道路。这跟欧洲所在的社会土壤有着直接的关系。汉迪本人在欧洲社会的生长历程就很可能说明这个土壤的不同之处。

“我”的改变

在去温莎城堡之前，汉迪是他参与创建的伦敦商学院教授。他从小在父亲做牧师的爱尔兰小镇生活，不满于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待在小地方，也对每周在教会的生活有抵触情绪。他曾经发誓，等他长大独立了，再也不愿像他父亲那样在小地方过清贫的生活，也不再不去教会。

成年后，汉迪从著名的牛津大学毕业，去了同样著名的壳牌石油公司，又在世界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管理学，然后帮助建立英国第一家提供管理学研究生课程的伦敦商学院。可是，就在汉迪看起来实现了他小时候的愿望时，真正改变他一生的时刻才刚刚到来。

有一天，汉迪在巴黎开会时收到了他父亲病危的消息。汉迪坐飞机赶回爱尔兰。等他回到家乡，父亲已处于昏迷状态，到第二天，就去世了。按照习俗，葬礼安排在父亲过世的第三天。就在葬礼上，汉迪看到了改变他后半生的一幕。

在他父亲生前所在的教堂，成百上千人聚集在那里，有些是当地小镇上的，有些来自爱尔兰和英国的其他地方。地方警察为人们前往教堂开辟出专门的通道。汉迪惊奇这些人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听到父亲去世消息的，又是怎样从各地赶到这里。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在欧洲也仅仅是电话的时代，还没有如今更加便捷的通讯工具。

汉迪站在父亲的墓旁。他看见周围的人们眼中含着泪水。他们中间，有许多都是父亲生前帮助过的人。父亲为他们举行洗礼，为他们主持婚礼，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父亲在这个小地方，做了40多年的牧师。

谁会参加我的葬礼，谁会在我的葬礼上哭泣？什么是成功？谁是成功的，是我还是我的父亲？人活的一生为了什么？汉迪问自己。他小时候去父亲所在的教堂做礼拜，他在大学学习哲学，他在工作上研究公司如何能够管理得好。汉迪发现，到了此刻，他才开始真正认真地面对这些问题。

父亲是个安静的人，却在一生中安慰帮助过成百上千人的灵魂。汉迪很喜欢他的父亲，但在他去世之前却一直对他安于在小地方生活很失望。其实，父亲有机会在大城市做牧师，但他都拒绝了，甘于在不起眼的小镇过一辈子。对这一切的不满，使得汉迪立志去大地方做一番不同于他父亲的伟大事业。

就这样，在大约四十五岁的时候，汉迪的一生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汉迪思考如何像父亲那样真正地生活。他考虑过去读神学，也像父亲那样做牧师。但教会的朋友建议，如果他想服侍上帝，继续做本行比做牧师要更加适合他。他们鼓励汉迪申请圣乔治学房的职位。

温莎城堡中的圣乔治学房，位于圣乔治

教堂背后的院子里。这个学房的名字是为纪念一位叫乔治的人，他是3世纪罗马帝国的一名士兵，因为坚持基督信仰而被当局杀害。这个学房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教会的领袖和社会各界当中有影响的人，讨论的问题包括信仰、公义、工作的未来、权力和社会责任。

汉迪没有想到，他违背了年轻时再也不去教会的誓言。他在圣乔治学房工作生活的四年里，几乎天天都在教会当中。而这为他下一步的人生做了准备。到1981年，汉迪49岁，他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靠撰写文章和图书以及为公司做咨询获得收入。

这意味着汉迪的生活将不再像在壳牌、伦敦商学院以及温莎城堡那里的稳定。他离开了这些所谓的大地方。他没有了学监、教授的头衔。他告诉朋友，“我将仅仅就是查尔斯·汉迪。”他的妻子很支持他的决定。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妻子，她一直是汉迪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帮手。他们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平均一年中，汉迪大约要花一半的时间用来思考、写作、做咨询和演讲。另外半年，他会更多地帮助妻子来工作。在过去的30年间，他写了将近20本书。其中最为世界读者所知的有《工作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非理性时代》(*The Age of Unreason*)、《饥饿的灵魂》(*The Hungry Spirit*)、《大象与跳蚤》(*The Elephant and the Flea*)。

这些书中传递的观念已经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家关心的事情。父亲在乡镇做牧师的生活在中年之后的汉迪那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迪说自己心目中的“公司应该是一个社区，你有归属感的社区，就像一个村落”。

长期在商业世界穿梭，汉迪厌倦了那些单单追逐利润的股份制公司。他认为公司应该像

一个村落那样，没有人拥有这个村庄，每个人都是其中的成员，每个人都有权利。公司股东可以按照承担的相应风险获得回报，但他们不应该是公司的拥有者。

对待找他咨询的公司客户，汉迪都请他们到家里来，面对面听他们讲公司的一切。汉迪说自己不愿意像一个咨询师一样出没在这些公司中间，而是想了解公司中的人心里的所思所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想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他们的组织。”

在一定程度上，汉迪在后半生的工作像他的父亲在社区做牧师那样，帮助职场上的人们找到各自的方向，找到生活的意义。著名的美国商业管理杂志《战略+商业》(strategy+business) 就曾经将汉迪比作现代管理学界的“牧师和先知”(vicar and visionary)。

汉迪自己也认为他所做的可能像先知的工作，他不是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的人，而是一个有些像圣经中那些劝人悔改回归正路的人。他想提醒在当今商业社会生活的人们，不要被现有的社会情绪和所在的组织淹没，而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在世界的丰富维度中生活。

从汉迪的一生，人们大约可以看到一个不满现状的人如何通过改变自己的内心实现他的理想。父亲在乡镇做牧师的生活出乎意料地成为汉迪后半生的榜样。汉迪并没有改变自己工作的领域，他还是在做管理学家的的工作。可是，因为汉迪内心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生和世界看法的变化，汉迪的管理学工作已经与他年轻时很不相同。

虽然事情的大小和范围可能完全不同，汉迪在温莎城堡看到的英国王权在实质上的改变其实也在相当程度上跟汉迪自己的变化如

出一辙。英国人没有同心协力地去废除王权，而是通过沟通的方式去限制王权，这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在做治标不治本的事情。然而，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他们的做法却取得了改变实质的效果。

致力于废除王权而建立新政权的人可能有些像年轻时的汉迪，他们认为应该从自己开始建设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年后的汉迪发现，自己所向往的新生活不过是浮光掠影，很经不起推敲。相反，他默默无闻的父亲其实早就在做一件改变人心而因此影响深远的工作。

是什么让英国人以及欧洲很多地方的人们没有习惯性地致力于推翻现状而是在现有的框架内改变实质？简单说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近一千多年来的历史上，英国以及欧洲的很多地方有为数众多的人像汉迪父亲那样在做改变人心和看顾人心的事情。

这里的人心当然包括温莎城堡的主人以及英国社会的各界人士。当1215年国王约翰迫于压力接受教会和贵族领袖提出的《大宪章》时，英国的每个社区大概都有教会和牧师。而发生类似《大宪章》事件的那些欧洲国家也是相近的情形。

温莎城堡内的圣乔治教堂就是英国王室成员参加教会生活的其中一处地方。他们虽然是君王及其家属，却跟其他很多英国人一样承认他们共同信仰的上帝是最终的主宰。这为国王跟公众之间解决争执提供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谈判平台，如此《大宪章》的签订才成为可能。

这样，不仅王权没有取消，甚至国王也可以不换人，公众继续尊重国王的权柄，国王承认自己的权力界限。汉迪所谓保持形式而改变实质的变化也就实现了。■



百年辛亥 ——我们往哪里去？

文 / 傅国涌

按：此文应《商务周刊》之约而写，是他们关于2011年的猜想之一，写作之时，钱云会还没有死，寨桥村还没有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如果此文写于钱云会惨死之后，也许会有一些不同，从那一刻起，历史进入了“后钱云会时代”，历史的方向变得更加暗淡、更加不确定，我们往哪里去？因为钱云会的惨死，这个问号变得更为沉重，更为沉痛。毫无疑问，钱云会成了这个转型时代最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他的死亡每天都在拷问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官员还是民众、富人还是穷人。我不知道，钱云会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

大雪纷飞之中，2011年的脚步已逼近我们，在每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要说房价，就是大米、食油、蔬菜、汽油的价格就足以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日子充满不安，“这个世界会好吗？”“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世纪之问已穿透黑暗的时光隧道，迄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回望历史，改变了王朝体制的辛亥革命马上就是整整百年，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依然生活在与百年前惊人相似的历史困境中，曾苦苦地困扰过梁启超、张謇、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的问题，今日仍苦苦地困扰着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焦虑的人们。

在一百年的历史尺度之下，这块土地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百年前那种民族危机的压力消失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防卫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随着整个世界政治生态的变迁，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想占有或瓜分中国的版图，有的只是想瓜分这个巨大的市场，“拼经济”不仅是东亚的现实，也是世界目前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面临一个百年未遇的最有利时机，

甚至是一百五十年来、更长的时间尺度以来最有利的时机，相对而言，此时的外部环境空前地安全，就连与我们相邻的百年宿敌日、俄两国都不再觊觎我们的领土，更别说遥远的欧美各国了。从经济发展上说，虽然1927年我们的财富总量就达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美国（当时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披露过详细数据），不过，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刚刚起步，工业化程度较低，虽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企业，尤其是纺织、面粉等轻工业领域，在与外国企业的市场竞争中也站住了脚。相比之下，这三十年工商业的发展及带来的变化，尤其从物质生活层面来看，恐怕超过了以往百年发展的速度。尽管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等沉重代价，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已逐渐摆脱长期的农业社会状态，开始进入工商业和信息社会，在有形的物质、技术层面呈现出与世界高度接轨的态势。这是百年前参与辛亥那一轮社会变革的先辈们想像不到的。1902年，梁启超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只是设想未来60年后的政治制度变化，立宪党与革命党的竞争，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等等，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位农业文明孕育出来的一代骄子还缺乏那样的想象力。

我们的巨大缺失也正是在这里。梁启超、宋教仁这些曾为自己的国家设计了不同蓝图、方案的先贤们，他们试图为这个在王朝循环中打转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找到全新的制度，让他们的同胞和后裔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也更富足，一句话，更像个人样。所以他们的努力主要是围绕着如何保障每个国民能活得更好这个角度出发的，个体的权利、自由始终是他们改良、革命的出发点，他们的立足点放在民权上面，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命

运是从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尊严之下的，无论是梁启超、严复等人长期努力引入的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宋教仁等人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具体尝试，都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可惜，他们的理想都流产了。宋教仁1913年春天遭到暗杀，梁启超在经历许多的政治挫败之后，于1917年黯然离开权力舞台，转向学术文化。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在往后的时间洪流中，有的线索被展开了，有的来不及展开或没有机会展开。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开的线索。老大民族依然深陷于“成王败寇”的古代观念中，不论是非，只认成败。即使是历史研究也往往与普通民众一样超越不了这一巨大的心理陷阱，这是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的沉淀，几千年来，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都未能改变它。这是中国困境的深层因素。这个古老民族处在成王败寇的核心价值支配之下，现代文明当中那些最基本的价值很难成为主流价值。比如，林昭痛切肺腑地指出的，“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心理中就很难找到生根的土壤。

我对辛亥革命有个基本评价，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换制度，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几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没有绝对优势，最后只能达成政治妥协，所以，民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在这个历史环节当中，我们还不能忽略最高决策者隆裕太后的作用，她在位不过三年、真正干政不过几个月，但她对历史的贡献要远大于掌权47年的慈禧太后，正是她，清朝才接受了和平退位的安排，尽管是被动的、无奈的，但能走出这一



步的统治者还是值得肯定的。中国由帝国顺利进入民国，这当中就有她的一念之间的选择，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由此，弱勢的她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主要是正面的，而强势的慈禧却主要是负面的。

无论孙中山有多少缺点，他提出的“三民主义”还是富有概括性的，不要把民族主义狭隘地解释为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民国创立之初就在提倡五族共和，以五色旗为国旗，将满、蒙、藏、回这几个主要的民族都涵盖进来了，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联合国的创始国，这一步可以说已完成。民生主义在台湾早就解决了，在大陆最近的三十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改革开放

迄今最大的成果就是在民生层面，当然也伴随着大面积的、深入骨髓的腐败。今天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民权主义，宋教仁、梁启超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民权主义，袁世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跌倒，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上，孙中山也未能在这个问题上获得进展，反而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包括“党在国上”、建立党军，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台湾民主化进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这方面的成功突破。反观辛亥以来百年的成败得失，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在这一轮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能避免走弯路，尽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会代价，以节制的、渐进的却是坚定的

方式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抵达民权主义的彼岸，建立起一个新的制度，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的制度。这是百年来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题目，也是一百多年没有做完的一张考卷。今天能交给后人、交给世界、交给历史怎样的一份答卷，不仅取决于掌握着权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支配权的那些人，也不仅取决于各个领域有影响的那些人，同样取决于无权无势、无可奈何地被日常生活压弯了腰的普通人，因为正是数亿这样的人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本土壤，他们的态度、心理、愿望、要求、声音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未来的走向，决定这个民族的命运。我从来不认为，普通人是可有可无的，每个人都是在场者，每个人都是不可忽略的，也许隆裕太后的态度，袁世凯的野心与谋略，孙中山、黄兴他们的勇气和行动远比一个普通人重要，也有影响得多，但是离开了海沙般的普通中国人内心的所思所想、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也注定无所作为。总而言之，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塑造着一个新的时代，而不是某些人可以单独完成这个过程。

2011年，距离辛亥革命一百年，百年前的问题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仍陷在百年前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在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之后，民权主义是我们最紧迫的也几乎是最主要的目标，民权，多么美好的词汇，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前提。未来的这一年，也许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强制拆迁、征地、司法不公、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将继续以更剧烈的方式演变，全国各个角落的个案、群体事件将会层出不穷，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与日俱增，官场腐败一如既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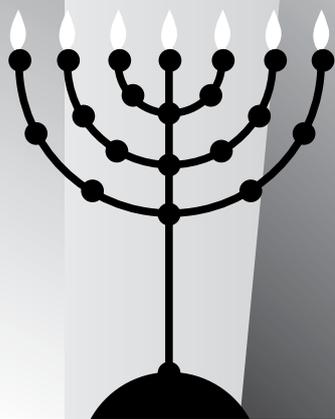
层权争暗斗会继续发酵，行政和司法权力对公民的蔑视和侵害也不会收敛，普通公民对权力的不信任感会持续加深，权力公信力的雪崩过程不会停下来。与此同时，掌握了财富的特权阶层从官员家属到暴发户移民海外的进程会大大加快，普通公民与掌握权钱的特殊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年不仅不会得到缓解，而且会加深，社会的鸿沟将越来越宽，许多矛盾的积累已像山一样压在这个民族的头上，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特殊利益集团之外，几乎都在等待改变，中国需要改变，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呼声。不久前，一位1985年出生的女孩在林希翎追思会上说出这句话时泣不成声，她的哭声打动了全场，感动了许多八十几岁的五七一代老人。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坚持不变的人也知道，脚下的地在变，这个社会在变，时代在变，人心在变，变是不可抗拒的。2011年，……中国已在转变的过程中，只不过万众瞩目、期待的一夜突变还没有到来而已。今天，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变还是不变，变是确定的，我们早已处在变的过程中，需要担心的只是变的方向不要偏离历史的正确轨道，往民权主义的方向变，这是百年辛亥未竟的使命，保障每个人作为个体的权利、自由与尊严，高于民族共同体的任何其他诉求，个体无尊严，就是民族无体面；个体无自由，即使国家再怎么强盛也与我们每个人无关。说到底，民权主义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限制权力，保护权利。这一步的实现当然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除了靠我们每个人，别无其他依靠。

2010年12月18日

（本文经作者同意摘自其博客）

怀念战友

文 / 书拉密



收到亚萨离去的消息，我正在超市，看着架子上红红绿绿的东西，心思漂浮着，等着远方的来信。对于这个结果，我并不震惊，我只是攥着手机，一时间觉得那个旷大的超市离我越发地远了。我推着车，茫然地在几排架子之间走来走去，顺手拿些东西放进车里，又顺手拿出一些放回去。

我始终不能确认，从此不会再见到他。

那个时刻是11月1日20点30分。

8年前，父亲也是在这一天去世的。

这一次，我失去了一位战友、一位弟兄、一位牧者。

周四凌晨接到他出车祸的消息，是X教会一个小妹妹发来的。

我打开短信，反复地看着，希望那只是一场严重的车祸，却不至于危及生命。我把短信内容重新编辑了一下，发给所有我认识的信徒，希望因着众人的代祷，我的弟兄可以平安。

但祷告中的直觉让我知道，天父已经定意要带走他了。我不情愿确信，我认为那只是我缺乏信心的结果。

我很想哭，却没有眼泪。

在单位终于熬到中午，我没有吃饭的愿望，既然如此，索性就不吃了吧，至少上帝知道我愿意以虔诚的心来求取一个平安的结果。我匆匆赶往北京教会的一间祷告室，希望能在那儿放声大哭一场，我实在需要一个空间，可以向我的上帝好好地哭诉一番，请求他将这位忠心的仆人留下来……

我请求他说：“为我预备一间屋子吧，让我可以和你大声地说几句话！”

我满怀期待地穿过中午的走廊，却看见祷告室横插着一把大锁。那一刻，我简直要崩溃了，已经郁积到将爆发的情感霎时间遭遇冷冻，我仿佛被抽空了一般，沿着阴暗的楼道一步一步地挨下去，一直走到熙熙攘攘的

大街上。阳光明亮，到处都是人，我很想拉住谁说点儿什么……

自然不会有那么合适的人，大家都很忙，走在马路上的人都很忙。

可是，即便有可说的人，我又怎么说呢？说——我的牧师突遇车祸，危在旦夕？如果那个人不信上帝，他/她的本能反应就是——“他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上帝不保护他呢？”

这一刻，我不想为我的上帝辩护。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天晚上，他要带领一个小组。他本来可以不过马路的，大家猜测他之所以要过马路，可能是为了到对面的打印社复印材料发给众人，因为从前他做过这样的事。

他是沿着人行横道走的，但那辆丰田吉普车的速度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

那一瞬间，我的上帝，你的手没托护他。你任凭他被撞上半空，然后重重地摔向了马路。就像你当初任凭那三根钉子把你的儿子牢牢地钉死在十字架上，鲜血迸流。

开丰田吉普的司机只有22岁。据目击者后来说，他当时看见撞了人，本能地想逃跑，私自挪动了亚萨受伤的身体。有几位出租车司机看不过去，将他逃跑的路堵住了，他才给家人打电话，才在家人的提醒下报了警。

从傍晚7点送入医院到夜里3点，在8个小时内，医生为亚萨做了两次开颅大手术。而这一切，我们全然不知。

大家回忆说，当天晚上，小组成员们等他聚会，他一直没来，打电话没通，大家按照惯常的理解，认为他有可能因为其他的事耽搁或者忘记了，就继续聚会，没再联系他，也没想起来告诉他的妻子洁。

洁回忆说，当天晚上，她也在带一个小组聚会，结束后回到家中已经10点了。看到亚

萨还未回来，她便四处打电话联系询问，最后一直追问到市内各大医院，直到夜里三点半，才得到消息，附近一家军医院傍晚时收治了一位车祸重患。

他一个人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接受8个小时的大手术，没有任何亲人、朋友和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在旁边……这件事，每每想起来，就让我们愧痛无比。

是的，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他的疏忽得太多了，多到如果没有这场事故，我们可能一直不会有这样的反思和悔痛。

那么主，仅仅为了让我们能够反思我们对牧者不够关心和关注，你就要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把他带走吗？！

不记得曾经和他谈过死的事。只记得有一次，似乎因为一边带教会一边做杂志而倍感疲倦，他在一次小组的分享中说，如果有一天见主，他希望能够带更多的灵魂而不是更多的杂志。但此后，他还是一边带教会一边做杂志，仍旧疲惫，却依然隐忍地坚持着，因为一直没有合适的人来接替他。他在编辑部中所做的工作，直到他走了之后，我才真切地知晓。一位编辑说，其实亚萨承担最多的工作还不是看稿子，而是亲自给每一位作者和读者写信，尤其是经常坚固那些向他倾诉软弱的作者。我打开编辑部的信箱，看着一页又一页做了各种标记的信件，不知道说什么。在此之前，愚钝且漠然于责任的我，总是有意无意地认为那些事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又自然而然地消失了的。

那些杂志感动过多少灵魂，抢救过多少灵魂，我们无从知晓。好在上帝知道。好在上帝只在乎他是否忠心，而不像我们那么在乎他是否做得成功，并不断用各种标准和数字来衡量和要求他。

在H市的教会中，亚萨带领的教会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成熟的，它很普通，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名气，但它的确在稳定而单纯地成长着。

第一次见到亚萨，是我从北京刚回H市的时候。有过一次误入异端教会的经历后，我惊魂未定，经一位老姊妹介绍，找到了X教会。那时，这间教会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他们租的是一间小小的民居，平时聚会的成员大约二十几人，多的时候能有四十人左右，基本都是大学生。大学生教会的特点就是成员流动性比较大，信徒一旦毕业就会奔赴到各地，留下来的人比较少。

我相信亚萨曾经受到过教会人数多少与教会是否成功之关系的困扰，因为在H市教会中，同样建立五六年的教会，人数之多有时需要租用一间大型写字楼的办公室才能放下。而X教会一直很小，但也因为小，信徒之间反倒更容易建立深入的关系。亚萨一直认为关系比人数更重要。

这样的牧会观自然让他更注重人的需要而不是事务的处理。不过，也许是因为他一向过于温和了吧，很少会从他的嘴里听到过于严厉的批评或责备，教会中总有一些信徒有意无意地滥用他的谦和，令我深感愧疚的是，其中也包括我。

我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带我去的姊妹向我介绍他说：“这位是教会的牧师。”我看见他很羞涩地笑了一下，纠正说：“我只是大家的仆人罢了。”后来我发现，他这么说，绝非故作谦虚，他真是这么认定自己在教会中的位置的。他的谦卑是一种很自然的流露，自然得令人羡慕。

到X教会大约三个月左右，他建议我带一个查经小组。小组一开始建在我家，但家

里只有三把椅子和三个圆凳。有天下午，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到门口接一下，我跑下楼，打开大门，看见他推着一辆自行车，两边挂满了塑料凳子。我依然记得他站在楼门口的样子，在北方深秋的风里，他的短发被吹起，人瘦削，却充满喜乐。

不过，似乎从性情来讲，亚萨并不是一个乐观的人。他曾经说自己常常容易从悲观的角度考虑问题，很本能地先想到不行，很容易就让一项事工不了了之。但从他后来在教会和编辑部的服侍看，他的确在不断地与自己天性中的悲观情绪做着抗争。他开始进行一些“改革”与“变化”，同时努力地向前推动。比如借用一家书屋的咖啡室举行具有福音内容的电影观赏活动。当然，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也不少，但他能够坦然地承受着失败的结果，至少表面上，他表现得很坦然。

我是后来从与其他人的交流中才发现，他很少与同工分享他的难处，包括受到的攻击与轻视。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他从来没中伤过别人，从来都尽量地包容与体贴。她说，他这个人好到这样一个程度——在的时候仿佛不存在一样，可是真的不在了，才发现到处都是他。

是吧。

他在的时候，我与他的联系并不多，尤其离开H市之后。除了因为稿件的事，彼此通个短信或者写封信说明一下，我们基本没有太多的交流。

在个人交流时，他的声音向来很轻，很温和，很有教养，而且不乏一点儿冷幽默。他不是一个善言的人，但他总有足够的耐心与智慧，能够一言不发地听完所有冗长、琐碎和自以为是的倾诉，然后用简短的一句话指出问题的症结。他的表达方式未必尖锐，但

表达的内容绝对让听者无法忽视，更无法逃避。他对罪极端敏感，绝不替人找借口，但对犯罪的人绝对宽容。他指出问题后，最常说的就是“我为你祷告”。我从他身上学会的代祷方式就是，无论何时接到别人请求代祷的信息后，他都会放下手中的一切，立刻履行代祷的信托与职责。

站在讲台上，他的声音会变得异乎寻常地高亢和坚定，不容置疑。我仍然记得10月3日最后一次听他讲道，他站在讲台上挥舞着手臂，很坚定地向空中扬起——落下，再扬起——落下，以加强他的语言表达。那天，他讲的内容是“从电影《盗梦空间》看我们的价值观”。我坐在台下，看着他有力的手势，听着他激动的声音，心里想：他真是一位有风格的讲员啊！站在台上的他比台下的他更活跃，而且更多了一股澎湃的激情，那个时刻，他更像一位诗人。

亚萨的确是一位诗人。

我们曾经在同一所大学读书，我高他两届，我是87级中文系，他是89级法律系，但彼此并不认识。我一直听说学校有一个“冰帆诗社”，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那儿的成员。他的诗歌曾经被省内一家文学杂志专门推介过。

不过，这些事，我从来没听教会的人提过，偶尔几次向人说起，听到的人都很惊讶，不知道自己的牧师曾经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青年。这段历史，甚至包括当时的那些圈中人，多年之后，他似乎很少提及，也很少联系。我能知道这些，是因为有一次，在准备办一本刊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从前的理想工作就是做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在成为一名律师之前，他特别希望能够进入某个文学杂志社工作，却最终未被录用。当时，他心灰意冷到极点。认识主之后，他也是挣扎了很久，

最终决定放弃诗歌写作，在教会中专职服侍。

显然，他的顺服与放弃蒙得了主的喜悦，并为他量身打造了一个“职位”。我认识他不久，就听说有人在筹办一本主内刊物，而亚萨自然而然地成了最合适的主编人选。从此，在正常的教会服侍之外，他又开始带领几位从未做过杂志的弟兄姊妹每月编辑一期杂志。虽然是本小刊物，篇幅不长，但属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型，每月一期，每一栏目都需要精心策划，疏忽不得。

亚萨那种流露自然的谦卑品格，在做杂志的过程中再次显现出来。

尽管做每一期时，编辑们都自认为尽心尽力了，但仍然会有读者写信表达不满与责备。尤其对于杂志本身的定位很不理解，有读者认为刊物缺少神学研究、解经学、灵修学之类的文章，总是一些小故事，读着感觉太简单不深刻；有读者认为有些文章过于迁就非信徒，不能更深地造就老信徒；有作者认为杂志的篇幅过小过短，写起来不过瘾；有作者认为自己写得已经很不错，编辑们太挑剔了……有一次，一位姊妹来信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如果还这么办，干脆就别办了；如果真没好稿子，干脆把几期合到一起算了。”

曾经有位做杂志多年的姊妹告诉我——主编是做什么的呢？主编就是用来让读者和作者骂的。

我读这样的来信和反馈，第一反应就是挺身而出，为心爱的刊物大声辩护，为编辑团队大声辩护；但亚萨的第一反应从来都是——“先看看是否有道理”，然后再按照实际情况或悉心解释或表达歉意。而且，从来是亲自执笔回信说明。

他走后，我找时间到编辑信箱里浏览了一遍，看着那些标注着各样记号的书信，我的

杏花

◎

心情特别复杂。不知道他在日常的教牧之外，用了多少时间和心思，阅读各方的来信与来稿，而且常常以怜惜和智慧来劝勉、安慰那些陷入灵性低潮的作者。在许多受过劝勉的作者的心目中，他不但是一位尽职的编辑，还是一位成熟的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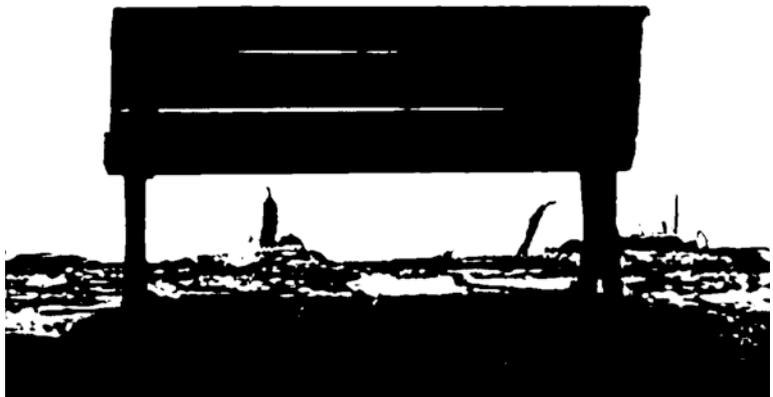
不过，相对于他的文字能力，亚萨不算是一位有恩赐的讲员。曾经有过一次，我们坐在矮凳上听他布道，忘记是讲哪段经文了，我拿着笔，习惯性地准备做记录，却在艰难地听完之后，发现纸上没写几个字。他说的话听起来都是对的，因为都是从圣经中摘录出来的，但那场布道的内容似乎非常混乱，缺少集中性，也没给出闪光的、令人警醒的结论。

他讲完后，自己也感觉到这一次的布道不算成功，便笑着自嘲地说：“唉，讲什么呢，都讲乱套了。”但从那以后，他似乎常常会事先预备极精细的讲章。我后来在网上读到他每周提供的讲章，都能看到他的精心与深入的思考。他很注重在讲章中融入时代的因素，尤其注重文艺方面的动向，比如一部新上映的电影或者刚刚引起轰动的图书，在他看来都是比较好的布道切入点，而且会引起年轻信徒的兴趣和热情。

他离开后不久，网上出现了不少纪念他的文章，基本都是他过去的诗友写的。从那些充满感伤的抒情文字中，我看到了另一个亚萨：豪情而善饮，在内蒙的大草原上驭马而奔；敏感而执著……但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一个词来描述他——“单纯”。

是的，我很少能够在已届四十的男性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他的微笑总是很单纯，仿佛孩童。

接到他离开的短信后，我拉着丈夫，在小区树下的长椅上坐下来。我坐在那儿，闭着



眼睛，感受着北方的夜风凉凉地拂过。我在记忆中捕捉着他的表情，我努力地寻找，以致于不由得模仿起他的笑容。有那样单纯笑容的人，他的心会是怎样地清澈啊……

我坐在冬天的树下，对丈夫说，我惟一记得亚萨说起与爱情相关的话题，就是有一次小组分享时，他说最近特别幸福的一天，就是与洁一起，坐在某个小区的树下分吃一块饼，感觉特别像一对老夫老妻。

我至今仍然记得他说这段话时的表情。

倘若能够假以时日，相信他和洁一定会相濡以沫、相守到老的，而这的确是让亚萨深感幸福的事。他一直想要个孩子，他非常喜欢孩子，但未能如愿。

他离开后，我们时不时地陷入到一种自责的情绪中。他在的时候，我们对她不够好，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多些、更好些，但没去做。

在中国，即便是已经进入21世纪，一位全职传道人的生活之难也是超过我们想像的。姑且不说乡村传道人了，那得另文描述；就是在中等城市里，许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其社会地位之低、生活水平之差，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被划为“弱势群体”、被定义为社会的“边缘人”。

X教会是一个以大学生为主的教会，工作的信徒很少，这意味着她的十一奉献不会太多。更何况，不是每位信徒都有十一奉献的意识和愿望。

曾经有过一次，我刚从外地探亲回H市，小组里一个姊妹告诉我，她想在晚上查经聚会结束后，倡议大家为亚萨和洁进行一次奉献。我对此感觉有些奇怪，她告诉我，亚萨和洁接二连三地病倒，虽然不是重病，但已经到了无钱去医院开药的地步。当时亚萨因为身体过于虚弱，只能躺在家里；洁的呼吸

道严重感染，嗓子哑得完全说不出话来。但即使这样，身为教会的带领人，他们夫妻两个仍然强撑着轮流参加不同小组的周间聚会。

直到那时，我才想起去问其他同工，教会是如何供养他们的，才知道，除了每月为亚萨提供200元的手机话费和500元的日常费用外，什么都没有；洁虽然也在教会服侍，但在分配费用时，大家很自然地把这对夫妻看作是“一体”，每月只给她100元钱。好在亚萨在当年做律师的时候买下一套房子，房租自然就省了。2005年的H市，其生活水平在全国省会城市里算中等偏上；每月600元的生活费，养活两个人，生病不敢去医院，是自然的事。

但即使是这样，一年后，当同工小组开会谈及为他们增加费用的话题，仍然有同工提出异议，异议的核心观点是：从前老一辈传道人完全依靠信心活着，根本不拿教会提供的固定工资。

但对此，我从未听亚萨和洁说过任何一句抱怨或不满的话，我此刻想起来的，仍然是亚萨谦卑的笑容和坚定的手势——“要相信，主会供应的！”他会那么向下一挥，加重他的语气。

如今想起他，我总不免为当初心里对他的过高要求感觉深深的愧疚。

尽管我表面表现得很温顺，但内在的孤傲和自义使我很少会把谁看作是权威，更不愿意“崇拜”谁，但也正因此，这种心理让我对带领者有更多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逻辑很简单，倘若他连那个或那些都做不到、想不到、讲不出，怎么能来带领我呢？这是常常会在我的意识深处涌流的想法。

同时我也发现，中国基督徒看待带领者的方式是比较容易把对方当作完人和圣人来追

随和推崇的，隐在地要求带领者不能个性太强，不能有脾气、不能有缺点、不能有软弱、不能说错话、不能办错事、不能……但凡有一点不合我们的理想模型，我们很自然地会对牧者、带领人不满，甚至会因此感觉受到伤害，认为他们破坏了我们的理想和对他们的期待。

我们挑剔他们的言辞，要求他们不能说错别字、不能弄错圣经引文出处；不能表达得不属灵——牧者怎么可以有世俗倾向呢？也不能表达得太属灵——牧者就可以不照顾我们的世俗需要吗？不能太严厉——牧者怎么可以缺乏爱心？不能过于温和——牧者也不可以纵容犯罪！不能对信徒有要求——群羊弱小，怎么可以加重负担？不能对信徒没要求——什么样的羊都有，太缺乏管理才能是不行的！如果教会太小——说明牧者缺乏魅力、牧养不到位；如果教会太大——过于招摇、高调，让政府有压力！

更奇特的是，如果我们自己遭遇患难，我们会本能将自己看作是无辜受难的约伯；而如果是牧者或他人遭遇了患难，我们更会本能地扮演约伯的三位朋友……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没意识到其实亚萨也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也会疼痛会恐惧会沮丧会委屈会难过会软弱会力不从心的人，一个也可能会艰难而努力地处理婆媳关系的已婚男人，一个需要不断鼓足勇气来处理各种属灵问题和世俗琐事的人，一个也需要成长的时间和空间、需要在讲台上得造就、需要关爱体恤鼓励和支持的人，一个和我们拥有同样性情的人。

但不同的是，即便被误解，即便受顶撞，即便总有人质疑他的讲道恩赐和带领与管理教会的才能，他也仍然以父亲的心肠容忍着、信任着他的羊群。曾经有一次，在小组做游戏，

内容是选择一个人站立在中央，其余人拉着手站在周围，然后让他向后仰倒。这其实是一个心理游戏，专门用来测试被选中者对他人的信任度。

我当时是这个游戏的指挥者，当我看见亚萨站在中间，毫无疑问地全然倒向身后弟兄姊妹用手联结的“网”时，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做过这个游戏，我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做到如此心无杂念，我只能做出一个“倒”的姿势，脚跟却死死地踩着地，而决不肯将自己全然交到那张彼此联结的“网”上——我习惯了不信任他人（包括我的大部分弟兄姊妹——真是愿主怜悯我），尽管事实上我很少受到他人有意无意的伤害。但是亚萨会信任，而且如此干脆、坦然！我想，他真是心中有爱的人，所以他能体会那种“爱里没有惧怕”的信任与平安。

亚萨的一位诗友在回忆文章中，曾不乏感慨地提到一句，大意是，倘若他没选择做基督徒，也许就不会有这么一次去团契小组的活动，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么一场事故了。他的假设并非没有道理。这样一个在人看起来变易无常的世界，我们生活于其中，真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是对于亚萨来说，我倒是相信一件事，倘若让他重新再做一次选择——一种是获得世人眼中成功的人生，拥有名利、地位、金钱，而且可以长寿，但一生都不认识上帝；一种是过着为世人所不理解的一生，清贫、简朴，经常会遭受成功人士的鄙夷与轻视，甚至可能为信仰付上生命代价，但却一生走在跟随基督耶稣的路上，我相信，我由衷地深信，亚萨仍然会选择后一种！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当然可以说，不是我们选择了神，而是神选择了我们。不过，单单从一种生活方式来看，

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并愿意终此一生奉行基督的原则而生活，这绝非是每个基督徒都能做、愿意做也敢于做的事。

但亚萨，似乎只会这么做——要么是基督徒，要么不是基督徒；要么是真基督徒，要么不是基督徒。从某种角度来说，基督徒，没有真假之分，只有是与不是之分。假冒是没用的，伪装是没用的，言行不一是没用的，口里承认心里不信也是没用的，它们都与基督没关，与耶稣没关。因为真只有一个，要么是，要么不是，就这么绝对，没办法。

亚萨选择了真，选择了成为一名跟随基督的战士。

明天是2011年1月1日，是新年，也是亚萨离开这个世界两个月的纪念日。

这段时间我一直忙着各种琐事，只能断断续续地写这篇文章。写到今天，我发现当初积郁难解的哀伤已经渐渐地消失，转化成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让我每次想起这位牧者和战友时，心里就充满勇气——已经有一人这样地活过了，这样地度过在世的岁月，那么我也可以这样地活，这样地度过此生——单纯、温柔、忠心、谦卑、与神同行！

这样的一生真是美好！

2010年12月31日初稿

2011年4月20日终稿

亚萨生平小记

1970年12月14日出生于中国东北山区。

1978—1989年就读于小学、中学。

1989年考入大学法律系，大学时与同学一起组建“冰帆诗社”，成为校园文化文化的代表。

1993年毕业后曾参与某早报建立之初的采访和编辑工作，后考取律师资格证书，专门从事法律工作。

1996年信主受洗，归于基督名下。

2000年被主呼召，全职服侍。

2002年10月2日与主内姊妹洁结婚。

2005年由主带领，创办并主编一本主内月刊。

2009年12月13日被正式按立为牧师。

2010年10月27日遭遇车祸，连续抢救四天。

2010年11月1日晚8:30被主接走，归回天家，享年39岁。

洛桑会议日志 (之三)

文 / Maria



10月23日，星期六

今天的主题是“纯全正直”（INTEGRITY）

8:45—10:15 全体大会 1——在圣经中共庆

今天的讲员是来自肯尼亚的牧师卡利斯托·奥德地 (Calisto Odede), 讲解的经文是《以弗所书》4:17—6:9。

他表示：“从很多方面来说，基督信仰似乎正在失去可信度，我们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与管理金钱的方式，并不符合我们所说的，很多的相关议题让我们的见证失去可信度。”

如果教会不能正直纯全，“我们无异于吹着巫巫兹拉喇叭的乌合之众，光只是会吹气，却无法积极地投入场中。”他挑战我们行事为

人要像光明的子女，要行在爱中，行在智慧中。

11:00—12:30 全体大会 2——呼吁基督的教会回归谦卑、正直和简朴

大会手册 32 页如此描述存在于现代教会中的危机：“权力滥用、不当的财务管理以及缺乏圣洁与正直度，经常是教会领袖的问题。他们经常扭曲经文，将贪婪、道德的败坏及骄傲合理化。”

今日全体大会 2 将探讨这个问题，讲员将把焦点放在“呼吁基督的教会回归谦卑、正直和简朴”的主题上。由斯托得创办的国际兰厄姆合作机构的主任克里斯·赖特 (Chris Wright) 也是《洛桑信约》的起草人，他特别要求教会要摒弃对权力、名誉、声望及财富的偶像崇拜，回归到基督里谦卑和纯正的信

仰。他警告说，今天越来越多基督徒失去了他们的诚信，甘于向这些诱惑屈服。

“你认为神得着全世界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呢？并不是其他的宗教，不是逼迫，也不是对抗的文化潮流。”赖特博士讽刺地指出，“神拯救世界时遇到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他的百姓。”

“最令神痛苦的并不只是这个世界的罪恶，而是那些得到神的救赎、被称为他的百姓的人的失败、不顺服和背叛。”他继续说。

赖特博士针对时下流行的成功神学作出了批评。他并不否认基督徒应该确信圣经里面神祝福的应许和圣灵的能力。但同时，他担心某些牧者一味扭曲圣经的意思来“满足个人的贪念”，却从来不讲圣经里面所说的圣徒的苦难和每位基督徒当背起十字架的呼召。

他说《洛桑信约》向教会提出的挑战可归结为三个主题，同样也是圣经所包含的主要问题。在圣经中，上帝不断地呼召他的百姓转离对权力、成功及贪婪的崇拜，活出谦卑、纯全和简朴的生命来。

1、转离对权力的崇拜，呼吁谦卑

追求权力和地位对我们来说试探很大。因为人按照其堕落的本性就是要抬高自己，窃取上帝的荣耀。可悲的是，许多基督徒领袖们都陷入到这个试探中并且跌倒。因而我们急需认清此罪，并且加以斥责。

相反，谦卑则是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个根本特质，作为他的门徒，尤其是教会领袖，应该具备这样的特质。

2、转离对成功的崇拜，呼吁正直

炫耀成就、技巧或行神迹的能力对我们同

样是极大的试探。我们渴望成功，得到认可。但这种渴望很容易使我们扭曲真理，控制别人。还会使我们在教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管理上，在私人生活和人际关系上不忠不实。神在圣经中不断劝诫我们，无论是在私事上还是公事上，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服事上都应纯全正直，我们当再次听听这个呼召。没有合乎圣经的道德，就不可能有合乎圣经的宣教。

3、转离对贪婪的崇拜，呼吁简朴

保罗曾说：“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以3:5）。圣经中的观点认为：合法的财富是神的厚赐。但更多的时候是说钱财容易成为我们崇拜的偶像。整本圣经都有针对贪婪追求财富带来危险的教导。耶稣和保罗都为我们树立了单单依靠上帝，知足常乐的榜样。

克里斯的信息鼓励基督徒领袖接受“谦卑的精神、以基督的方式传福音的决心、拒绝权力诱惑的态度及坚决反对以基督之名获取物质利益的立场”。

12:30—14:00 午餐联谊

今天是和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Y OF THE GLOBAL CHRISTIANITY）的人座谈。这个组织研究的内容包括“世界基督教发展趋势”、“世界宣教的现状”、出版“世界基督教的数据”和“世界基督教大百科全书”等。

今天座谈的内容是“中国基督教的复兴是受灵恩派的影响吗”，主要是对参加座谈的人进行问卷调查，大家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最直接的反应“当然不是”。在我所处的环境中，偏灵恩的教会并不多。在座的大



多数人也都认为有影响，但并不是很大。

可惜我们对中国教会了解很有限，城市教会并不了解农村教会，各个城市、各个地区情况都不同，如果大家都来了，也许能看出中国教会的概貌和发展脉络。唉！又一次失去了让世界基督徒了解中国教会的好机会。

14:00—15:30 多元主题分会

今天的主题是：

- 伦理道德、新兴科技及人类的未来
- 弟兄和姊妹（男女同工）：实现大使命的强大团队
- 贫困、成功与福音

我参加了“贫困、成功与福音”的研讨会，所讨论的问题是成功神学。

来自尼日利亚的腓米·阿德莱耶分享了一个故事：他的堂兄（弟）把自己的大众汽车奉献给教会，希望得到一个新的奔驰。他说

神当然关心人的需要，但却不是让我们只是去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以下问题需要关注：

- 成功神学使人期待物质上的丰富、健康的身体、名誉地位等。
- 《路加福音》6:38（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经常用来推动给予，但引用圣经时不能脱离上下文，此处的上下文是在强调爱和恩慈，不要论断，以免被论断——而不是讲财政问题。
- 基督的使命被扭曲成为“使我们富裕”。
- 成功神学是指向十字架吗？这对穷人不是好消息。大多数情况下是领袖而不是跟随者更成功。最后以剥夺穷人的尊严和他们应得的尊重而告终。
- 成功神学让诱惑成为幻想。
- 把穷人带入危险的境地，为不去工作提供捷径。
- 我们要为传这样的福音而悔改，要回到传简朴、谦卑的福音。

有一个弟兄还谈到一个教会教导信徒说“如果给神 10 块钱，他就会给你 100 块”，用这种方式 and 神进行交易。他说神用自己的方式，按他的心意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祝福别人；而成功神学传讲的信息则是以自我为中心，对信徒进行剥削。

讲台上坐着三个主讲人，都是黑人弟兄。后来我听说在非洲指出成功神学带来的弊病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这种神学在这里很兴盛。

这是一个很大的会场，都坐满了人，说明这个论题很引人关注。果然，主讲人陈述完毕，立刻有很多人提问，走道上排着长长的队伍。

大家提的问题包括：“如何分辨为得病的人祷告，又不是成功神学”，“如何分辨传统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等等。

成功神学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祈求神帮助中国教会抵挡成功神学的教导，引导信徒“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17:30—19:00 晚餐联谊

今天是与海外基督使团（内地会）的人座谈。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的传记为很多人所熟知，他说：“如果我有一千英镑，中国可以全部拿去，如果我有一千条性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句话深深地感动着中国基督徒和全世界关心失丧灵魂之人的心。我遇到一个韩国姊妹，他们全家预备要去中国传福音，她说每次读到戴德生的传记，都会感动得流眼泪。

内地会以迅速传福音为目的，远地区传道，差派不同宗派的宣教士，不保证薪水，也不要求财务支持。戴德生认为任何需要应放在祷告中交托给上帝。内地会的格言是：“用

上帝之方式，作上帝之工，绝不致缺乏上帝之助。”

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人，尊重中国文化，衣食融入中国。这一点让我很感动，试想如果现在让我到中国一个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去传福音，我也很难做到尊重当地的文化，衣食融入当地，更何况他们来自遥远的国家，生活环境比中国要舒适得多。

不建立内地会的宗派，只是作为宣教团体，积极传福音，训练中国同工。

信徒重质不重量，1905 共 2 万 2 千信徒，1949 年 8 万信徒，虽然人少，但扎扎实实。

在 1900 年义和团时期，内地会宣教士牺牲的人数比任何其他宣教机构都多，但在 1905 年戴德生去世之前，内地会在华宣教士人数达到 825 人，是宣教机构中人数最多的。

圣经《约翰福音》12:24 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戴德生和内地会的宣教士们在中国结出多少的子粒，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在座的人都见证了戴德生对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有的人已经是内地会结出的果子的第三代了。

内地会的宣教士今天还在中国工作，内地会的精神还在继续传播。谢谢戴德生和他的后人，谢谢宣教士们对中国福音事工的贡献。

19:30—21:00 全体大会 3——神通过他的教会在全地的工

聚焦地区：欧亚大陆和西方世界

首先演讲的是伦敦圣公会布兰普顿圣三一教会牧师、阿尔法课程的前驱尼克·冈贝尔。

阿尔法课程是一个十周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课程，由伦敦的圣公会布兰普顿圣

三一教会设计，可以通过讨论的形式让人们在很友好的气氛里探索基督教的本质和相关内容，现在被很多国家使用。

尼克·冈贝尔出生在一个非基督徒家庭，父亲是一个世俗化的犹太教徒，母亲是一个偶尔去教堂的圣公会信徒。尼克读新约圣经的目的是为了拦阻一个朋友成为基督徒，当花了三天时间读完后，他得出结论——圣经是真实的，而且明白耶稣为他而死，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耶稣，他经历了圣灵浇灌下来的神的爱。尼克立即兴奋地想传福音给每一个人，但大部分都失败了，后来他探索出了阿尔法课程。他喜欢保罗的一句话“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保罗的意思是：

1、福音是真实和可信的

我不以福音为耻，2010 开普敦大会最鼓舞人的事情之一是听到了许多为福音受苦的故事。在西方信耶稣没有什么恐惧，但经常面对的试探是以福音为耻，因为成为基督徒让人觉得可笑和遭到批评。保罗是在受审判时说这句话的，我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律师（我的大多数家人也是律师），但当我看到成堆的证据，我相信这是真实的。

2、福音的能力和生命的改变

福音带给每个相信之人的就是生命的改变。神改变了我的生命，在过去几年，我有幸参加了一些会议，听到了很多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生命改变的故事。星期四我们去了一家推广阿尔法课程的开普敦监狱，也听到了很多这样的生命改变的故事。阿博瑞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犯罪先生、国王，他做的所有事情只是为了得到爱。在圣灵显现日他遇到了神，他的生命改变了，这个刚硬的罪犯流下了喜乐的眼泪。

3、福音是重要和急迫的

救恩对那些相信的人是大有能力的。我们传福音之所以要急迫，是因为一旦我们传福音，人们就有机会相信，我们不只是给了他们一点好的东西，这是耶稣基督给人们的救恩，能改变他们的生命。正如约翰·斯托得所描述是“自由”——从罪里得自由，从各种上瘾症里得自由等等。一位学习阿尔法课程的妇女曾经是妓院老板和海洛因的上瘾者，她诚实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教会，她无法活下来。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福音，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传福音的急迫性。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的关键点上，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崩溃，也看到了在满足人们最深需要上的失败。而只有耶稣能满足人们最深处的需要，他相信我们——他的教会——能承担起把福音传到地极的责任。

接下来是来自牙买加的拉斯·纽曼访谈来自乌克兰的阿那托勒·格鲁霍夫斯基和俄罗斯的谢尔盖·拉库巴，主题是“神仍在运行”。

阿那托勒谈到了神在欧亚地区的运行：本次会议有来自这个地区的 12 个国家的 120 位代表，而 1989 年的洛桑会议只有一个前苏联的小组参会。自从那次会议后，神行了很多奇迹，前苏联也解体了，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基督徒，很多人却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的牧师被关进监狱，他们的家人被迫害，教会被焚烧等等，但是同时也有很多机会传扬福音，19 年前西伯利亚是一个监狱，今天却是建立教会和宣教的工场。很多人相信耶稣，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动力。

谢尔盖·拉库巴讲述了神如何在俄罗斯运行：福音运动在前苏联是受到压制的，特别是在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远东地区。前苏联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虽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福



音派教会还在受前苏联的压制所带来的影响。但最近 20 年，特别是现在，已有新一代的基督徒成为当代社会的宣教士，在前苏联地区传福音，扩张神的国度。当然也有很大的挑战，包括艾滋病和人口贩卖、世俗化和伊斯兰教地区的问题，但挑战对于传福音和福音运动所带来的变革也是很好的机会。更值得高兴的是今天的俄罗斯不再属于克格勃或新的总统、首相，而且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的未来、对神忠心的接力棒将交在年青而且有潜力的基督徒领导人手中，他们将带领教会进入荣耀神的时代。神依然在东欧和远东地区运行，请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忠心地跟随他。

大会在“荣耀、荣耀，哈利路亚”的歌声中结束。明天将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我们将继续享受“变象山”的荣耀。

10月24日，星期日

今天是大会的最后一天，大会发给我们一张参会的纪念证书，还有一张 DVD——里面有会议的许多文件、影片、照片及其他资料。谢谢大会的工作人员。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合作 (PARTNERSHIP)。

大会本来决定在昨晚最后一次的“神在世界教会的作为”中安排中国代表发表短讲，在全世界面前述说神在中国的大能作为和神当得的荣耀！后来接到大会的通知，短讲改成祷告，安排在今早全体大会之前。

中国代表和香港突破机构蔡元云博士一起登台，中国代表面对台下四千多普世教会的领袖和全球将近十亿的观众，开声向神祷告：“因着神的恩典，中国教会成为相当活跃又快



速成长的教会。跟 1949 年中国的基督徒人口相比，中国的教会已经成长了一百倍……”这是首次有来自中国教会的代表公开在洛桑大会中祷告。道格也邀请全场代表起立，为神的大能作为献上感恩，也为中国和中国教会的未来祈求神的带领和祝福。

敬拜由多文化的敬拜小组带领，演唱的歌曲是“万主之主和万王之王”（Lord of Lord and King and kings），带领的人用不同的语言领唱，我们用“哈利路亚”回应。终于有人用中文领唱了，是一个来自香港的弟兄，也许大家都觉得没有中文的演唱是一种遗憾吧。

大屏幕上播放了一段视频——“结束圣经的匮乏”，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年青人信耶稣，是因为 1992 年在西伯利亚得到一本圣经。他说：“谢谢那些送这本圣经给我的人，也许他们已经忘了那个时刻——但我不会忘。”

然后来自喀麦隆的迈克尔·卡门基带领大家站立祷告——委身于消除圣经匮乏的使命：“主啊，你应许就像海水充满大海一样，全地都要充满神话语的荣耀。我们承诺尽我们的责任让你的应许尽快实现。”

8:45—10:15 全体大会 1 ——在圣经中共庆

今天查考圣经《以弗所书》6:10—24，主题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由埃及圣经协会的秘书长拉马兹和丽贝卡·阿塔拉宣讲。

丽贝卡向女性听众们道歉，因为今天的主讲人是拉马兹，而她会在随后的时间宣讲。丽贝卡为自己的丈夫祷告让他不是依靠自己天然才能，而是依靠圣灵的恩赐来服事，然后坐到了讲台旁边的凳子上。拉马兹开始讲道：

“你们都听到了福音——要做刚强的人，不要做软弱的人，不要放弃信心。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有很多的基督徒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让我们用两分钟的时间安静地为我们的家人、朋友和教会带领人祷告……”

紧接着丽贝卡给我们讲了一个实际的例子——神的能力如何改变埃及一个贫穷地区的面貌。

“1982 年，这个村子里的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水平——他们以收集垃圾为生，每天生活在垃圾堆里，除了供应毒品和酒，他们没有

任何的服务业（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一些图片），垃圾村的人认为他们自己就是垃圾。但是经过一代人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建起了高楼，出现了各种服务业和市场（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了让人无法相信的变化）。有一个人凭借耶稣的力量成就了这一切，他到垃圾村带领这些捡垃圾的人到神的面前，很多人信了耶稣，奇迹就发生了。他有一个祷告支持小组每天为这个大家庭祷告，村里很快就有了足够的信徒，科普特东正教派为他们建立了教会，那个带领他们信主的平信徒就成了牧师，他就是西蒙神父。信徒们和西蒙神父一起建立了学校，垃圾村成了一个大的资源回收站——人们还是拾荒者，但却垃圾分类回收站的工作人员。

他们建立了山洞教会，这个教会可以坐20,000人，也是中东最大的教会。现在他们正在残疾人中开展一个很大的事工。”

阿塔拉夫妇最后挑战我们要持守住重要的价值观——真理、公义和诚信；解释了重要的信念——信心的盾牌；概括了重要的资源——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全体大会 2 ——在基督的身体里朝向一种新的全球性平衡而合作

一、约翰·斯托得的视频

大屏幕放了一段关于约翰·斯托得的视频，斯托得和葛培理有着一生的友谊，葛培理邀请他担任第一届洛桑会议的总设计师。

葛培理和约翰·斯托得的合作给基督教在世界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忠诚于他们那一代人的呼召——也给后代的人留下挑战。

二、道格·伯兹奥的道歉

洛桑会议主席道格·伯兹奥尔出现在讲台上，为一个关于拉丁美洲的视频中的错误道歉，他真诚地道歉，并感谢拉丁美洲代表的宽容和忍耐。

举办这么大型的会议难免会出现错误，难得的是及时道歉和纠正，更难得的是宽容和忍耐，这是基督品格的表现，也是合作的基础。

三、聚焦“合作”（Partnership）

有四个讲员分享有关合作的话题。

来自美国的莱斯利（Leslie）和查德·色格拉吾（Chad Segraves）夫妇谈到了男女之间的合作。

十年前他们共同创办了一个超宗派的宣教机构——目的是帮助宗派之间和各个年龄的人之间的合作；他们尝试推动西方人和本土信徒之间配搭侍奉的运动；通过他们的婚姻和机构促使男人和女人一起同工。

他们强调侍奉是基于恩赐，而不是性别。神创造世界时男女是平等的，他们共同管理神造的世界。始祖的堕落却改变了这一切，但在基督里又重新恢复了。男女就像钢琴的黑白键，神按照他们的恩赐来使用他们，他们搭配起来，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

我和这对夫妇曾在“男人与女人和好”主题的小组讨论中见过面。当我分享神如何在中国兴起女牧师、女传道及许许多多的女同工时，他们很受鼓舞，因为在美国也很少有女牧师。看来，男人和女人按照恩赐而不是性别一起同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中国教会的组织结构逐渐建立起来后，是不是也要面临这样的挑战呢？

OMF(内地会)的总干事冯浩鏊在题为“在基督的身体里同工以寻求新的全球均衡”中强调“均衡”不是使合作伙伴之间的力量达到平衡,而是在神的宣教使命中通过圣灵一起同工。他从三个方面来谈论这个问题:

1、神的能力。

首先圣经中的宣教理念是关乎上帝的能力,初期教会传扬福音不是靠有魅力的领袖,也不是靠有规模的耶路撒冷教会,不是用任何宏伟的策略,而是圣灵赋予那些无能为力的人以能力去勇敢地见证基督,与今天“有能力地”将福音带给“无能力”的宣教理念和做法不同。

其次,在基督的身体里的伙伴关系,应该是强化向世界传福音,而不是全球性的平衡。

第三,慷慨是早期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年轻的安提阿教会按照各人的能力,为更有规模的耶路撒冷教会提供帮助。因此在基督身体的同工伙伴应该是互依的——甘心乐意地给予和谦卑地接受。如果只是单向的接受而且索求更多,会导致神的工作受损害,一位中国牧师曾经说:“不要给中国教会钱,金钱将使中国教会分裂。”

神的资源不仅仅是金钱,而是在基督身体里的很多方面的东西,或者是不同的恩赐,或者是面对逼迫的信心,或者是一些反思,或者是在异教环境中传福音的信心经验等等,我们需要所有这些,我们应各自带着所拥有的,而非我们所没有的,达成真正的伙伴关系,在其使命上祝福普世教会。

越来越多的情形是,福音不仅仅是从西方输送到其他地区,而是从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南半球和第三世界教会主导传福音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2、神救赎的目的——和好的呼召。

和好是基督徒伙伴关系的基础。

3、神的主权统治。

我们掌权的主是一位控制历史的主,是所有政权的主,是他决定我们的时代。在基督里,上帝以他主权的恩典,从万国万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属灵群体,要将好消息带到世界各地,这个新的属灵群体是一个互相鼓励和学习的群体。安德鲁·沃兹教授很有洞见地强调“多中心的概念”,他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基督教中心或一个单一的宣教中心。因此,从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去宣教的全球化时代不容忽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说他们是福音的最后一棒,必须合作,骄傲和自怜是追求福音传遍世界的两个主要障碍。

冯医生针对21世纪的宣教是属于亚洲人或中国人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一方面可以增强亚洲弟兄姊妹的自信,另一方面却有可能使大家重犯西方弟兄姊妹的错误,即借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传福音,继续强化传福音总是由强者到弱者,从有的到没有的。这种“亚洲必胜主义”让他觉得很不安。

14:00—15:30 多元主题分会

今天多元主题分会的主题有以下几个:

- 在道成肉身的全球合作关系中对基督教会的盼望
- 在全球教会中的本地领袖
- 宣教中的圣经
- 不存在福音得不着的孩子

我参加了“在全球教会中的本地领袖”的讨论。来自阿根廷的亚美尔·桑托斯分享了一个案例——帕塔戈里亚地区的100位教会领袖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65年前,在15岁时我信了耶稣,16岁时就被呼召全时间服侍神,在阿根廷北部的土



著人中传福音。后来神带领我去对基督教不是很友善的帕塔戈里亚地区，这是沙漠地区，温度低于零下 20 度，风力每小时达到 120 公里。我和我的丈夫面对很多挑战：恶劣的气候、天主教的迫害、缺乏经济上的支持等等，但在神的帮助下，我们在世界上最南的城市建立了一个小教会，我们依靠神的供应和制作一些食品来销售以供养自己。

神也在我们的心里放下挑战——去装备领袖。神用《提摩太后书》2:2 来激励我们：“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于是我们开始训练门徒：教导圣经，活出基督的样式。100 多个牧师住在我家里，和我们一起生活，同吃同住，来经历神的供应。把他们培养成有信念、理解圣经，并能活出自己信念的成熟有责任感的人，然后差派到其他城市去服侍他们的邻舍。

我们受神的话语的启发：《提摩太后书》2:3

节说，耶稣的精兵要随时准备经历苦难，他需要进行合法的战斗，这意味着，要基于神的话语；为了能结果子，他要努力工作；他必须有信念，并且了解这个信念的形成。这些都需要时间，你不可能在一本书的章节里学到这些，也不是神学院的教室里培养出来的，这是在神的话语中的经历，保罗花了 14 年，摩西花了 40 年才得到。

我们接受了神给我们的在帕塔戈里亚栽培领袖的异象。现在我们在中心地带有了一个重要的聚会，我们为孩子办了一个星期六的学校，有六百多个孩子。所有这些都帮助我们培养领袖和工人。我们还把这个异象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装备那些有同样异象的工人和领袖，让他们也可以去训练别人。

经过 50 年的侍奉，我可以有成百上千的工人和门徒在这个门徒训练中得到装备，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牧养活泼的教会，经济上自给自足，他们也有宣教的激情。

我们事工的成功，在于我们有一个神学架构和教会生活整合的重要方法，这样培养出来的当地领袖都很有能力，但他们却在全球教会服侍。

耶稣基督的福音有转变的力量，让我们的生活不断发出光来荣耀上帝，让我们敏感于圣灵的引导，并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共同的目标——给人类带来救恩和服侍教会。教会爱神，就要投资时间在领袖的装备上，并给他们工具去装备工人和成全圣徒。”

亚美尔·桑托斯的领袖训练经验很像我们中国的门徒培训，教会就是我们的家，弟兄姊妹在其中不仅能学到圣经的真理，而且很多基督徒能用生命来见证这些真理，这样就能潜移默化地影响那些初信的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忠心的“提摩太”。

16:00—17:30 地区性聚会

聚集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和来自各个国家的在中国的宣教士。

大家都分享了参会几天来的收获，也谈到了要把洛桑会议的异象带回自己的教会，并把洛桑精神活出来。

今天的聚集之后，人们都要回到原来的服侍岗位，有的弟兄姊妹还不知道要面临什么艰难处境。

大家都为他们担忧，有人提到约沙法的祷告，《历代志下》20:10—12说：“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扪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

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经历了“变象山”上的荣耀，我心里也有很多感动，但也感到自己力量的薄弱，我也想向神说，“我不知道怎样行，我的眼目单单仰望你。”

我们同心合意为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及那些要面对艰难处境的弟兄姊妹祷告。

19:00—21:00 闭幕式与圣餐礼拜

一、聚集和游行

南非的迈克尔·卡西迪感谢我们来到开普敦，但他提醒我们——来开普敦的目的是从这里走出去传福音给所有的被造物 and 每一个人。圣经说我们不能出去为神作见证，除非我们得到圣灵的能力。圣灵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基本需要——我们需要圣灵本身、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恩赐。有人问慕迪是否被圣灵充满，他说：“是的，但是我漏出去了！”是的，我们需要圣灵更新我们，使我们得着他的能力，更有果效地在世界作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祈求圣灵来做新的工作和膏抹我们。

这时，几百人的交响乐队开始演奏音乐，拉开游行的序幕。

大屏幕上出现圣经经文，并配上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画的关于耶稣的画像，经文和绘画都深深地感动我们。其中一幅是中国画，画上是耶稣和门徒在一起，旁边用中文写着：“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 20:26—28）

这几天一直浸泡在英文中，突然看见中文

和中国画，尤其是在大屏幕上出现，让人激动不已。

接着，身着南非各民族服装的、各种肤色的几百人的诗班高唱“我神真伟大”(How Great is Our God)、“大哉、圣哉，耶稣尊名”(All Hail the Power of Jesus' Name)。全场起立，一起高唱这两首歌。

身着南非民族服装的游行队伍高举各色彩旗、蜡烛，击鼓跳舞，穿过会众走向主席台。

五千人一起高唱赞美诗，彩旗飞扬，人们伴着音乐、鼓声载歌载舞，如同天堂里的敬拜。

接下来是肯尼亚风格的圣餐礼拜(圣公会圣餐礼拜)。

身着红色大主教礼袍的主礼牧师亨利·俄隆比大主教问候大家：“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过去这几天，我们相当努力，不过在我们离开之前，现在让我们放下所有的辛劳，高举我们的手、献上我们的心，扬声赞扬我们的神。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全体起立，三位领唱和诗班唱：“求主怜悯，求基督怜悯。”

身着莎丽的助理牧师格蕾丝·马太读启应文：“求主怜悯我们，求基督怜悯我们。”

会众回应：“求主怜悯我们，求基督怜悯我们。”

然后由祷告主领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中文、德语读出祷告题目，会众回应：“求主怜悯我们，求基督怜悯我们。”

中文的祷告是：“为俄隆比大主教、所有教会和宗派领袖、所有神职人员和带职侍奉的教会领袖以及洛桑运动的所有领袖，我们



向主祷告。”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圣公会的圣餐礼拜，主领和会众起应的方式让我觉得很特别，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的方式，历史的沿革又是怎样的，值得好好去研究一下。

二、荣耀归与至高神和圣经朗读

带领人及会众演唱“荣耀归于至高神”。

接着是旧约诵读：《出埃及记》12:1—3,6—11，用俄语和葡萄牙语诵读。

然后是领唱、诗班和 5000 会众一起演唱《诗篇》148 篇。

再接着是新约经文书信诵读：《哥林多后书》4:1—7，用西班牙语、法语和阿拉伯语诵读。《约翰福音》1:29—34，用中文诵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时，一个黑人姊妹领唱“神羔羊配得”(Worthy is the Lamb)，经文和歌声让我们禁不住泪流满面。

三、证道

洛桑运动国际部负责人林瑟·布朗为今天的圣餐礼拜证道。在开始证道之前，拉斯·纽曼和其他的理事们上台来为他祷告。

林瑟·布朗说：耶稣的福音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信息，就是这个星期我们聚集在这里的原因。这是精彩的一周，难忘的一周，荣耀的一周。我们听了很多见证和神话语中

的宝贵信息，但是这次会议对基督的事工和我们的生命会留下什么呢？今天早上我们给各位看了开普敦承诺的序言，序言里列出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洛桑会议的成就，那这次大会的贡献是什么呢？只有神知道！但是作为洛桑会议的组织者，有四个方面的异象和希望激励着我们来组织这次会议：

1、对基督的独特性和福音真理的明确认定

我们要开展宣教，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没有一个对真理的基本承诺，我们能做的很少，甚至什么也做不了。1910年的爱丁堡大会最了不起的成就是开始了伟大的宣教运动，但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组织者把教义和圣经真理排除在外，拒绝讨论教义是害怕分裂。约翰·斯托得说：在宣教的讨论中，你所说的基督的福音和教会的宣教没有圣经真理，是很愚蠢的。

开普敦承诺就是要澄清基督独特的宣告、基督受死的意义、皈依的必要和人类的失丧，这是福音派基督教信仰的告白。这不是新的话语，不是19世纪的话语，甚至不是改革宗的话语，也不是西方的话语，这是植根于圣经、被2世纪的教会领袖，如德尔图良等人护教时，广泛使用的话语。我们今天使用这些术语表明我们是不以福音为耻、以福音为中心的运动。在这次大会中，你听到对基督的独特性和福音真理明确认定的钟声了吗？

2、成为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代的见证

本次大会的宣教陈述，就是给全球教会在世界每一个地区为耶稣和他的教导作见证带来新的挑战，既是地理上的，也是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上的。新约使用“成为”这个

词意味着语言和生命，通过我们的生命、语言和行为活出我们的信仰来，为基督做见证。

我们必须在所涉及的社会活动的每一个领域，把自己重新委身给基督，目标是让整个世界听到的福音没有被“缩水”。然而，我们在社会领域应用圣经的原则和真理的努力也许有些软弱，如媒体、商界、政府、公共政策，甚至是我们曾经很有影响的大学。“改变大学就能改变世界”，马丁·路德在1523年这样说过。因此，我们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这次大会也挑战我们将基督教的思想应用到种族问题和环境问题中。有一个基督徒政治家这样说：洗干净沾染政治的手不是爱，而是俗气；参与社会，应用福音的真理和基督的主权不是俗气，而是爱。

这次大会的一个希望就是我们离开这里以后，委身到将福音传到地极和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表明耶稣的福音是神的真理。

3、更多的合作成果

我们的希望和异象是这次大会能结出很多合作的果子，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和世界福音联盟（WEA）合作的原因，把所有代表分成不同的圆桌小组，目的也是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和友谊。在贪婪和破碎的世界，我们不是推动竞争，而是合作，这种合作需要突破宗派和组织的界限。我们祷告在同一个领域的福音机构在这次会议之后，一起同工，避免重复、竞争和浪费。

4、会议之外的新创意

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听到福音，我们怎能休息呢？1974年的洛桑会议之后，全球教会开始向未得之民传福音。这次会议之后会有什么出现呢？也许会有新的创意去服事口头学习者（不识字的人），年轻人，超大城



市的人,媒体,大学,什么是你的新鲜创意呢?

从《哥林多后书》4:1—7,林瑟分享了这次大会一直强调的三个重点:

- (1) 我们有了职分(1—6节):就是宣讲耶稣的神性,道成肉身,死亡和复活,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就不是宣教。只有通过耶稣,我和神才有亲密的关系;只有通过耶稣,我才能知道我的罪被饶恕;只有通过耶稣,我才有永生的盼望。耶稣不仅是救主,而且是唯一的救主。
- (2) 谨慎自己的脚步(2节):我们要小心是不是过度关注自己的技术和聪明的方法——不承认自己的软弱,过度自信和过度好胜,我们的宣教不能依靠技术和钱,只能依靠神的能力。整本圣经都在说,我们过敬虔的生活不是因为虔诚,而是因为神的怜悯和保护。耶稣教导五千人,然后喂饱他们,我们也要效法他,口头教导与怜悯和照顾并行。
- (3) 不要丧胆:第一节和《歌林多前书》15

章都说到“不要丧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要回到艰难的环境,有的人甚至会殉道,有的人从洛桑会议这个“变象山”回去后,则可能面对各种试探。21世纪人类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速度,我们必须拥有,而且必须快,但神的工作通常是慢慢成长的,我们需要长远的眼光,不要放弃,去实现神给我们的使命。

1812年,朱森先生从波士顿出发去今天的缅甸,他在那里服事了38年,到他去世时,只有12—25个人信主。他在这片土地上失去了妻子和五个孩子,在他死的时候,他受尽了折磨,最后被扔到海里,他甚至没有坟墓。他没有留下教会,没有留下小组,只是留下翻译成当地文字的圣经,但今天有600,000当地信徒在使用他翻译的圣经。

我们有些人会有丰硕的成果,有些人可能没有,不要灰心,不要丧胆,记住约翰·卫斯理说的话:“在神的帮助下,尽你最大的努力,用所有你能用的方法,去所有你能去的地方,用你所有的时间,服事所有你能服事的人,直

到神带你回天家。”愿神祝福大家！

四、回应诗歌，祈祷和宽恕

证道完毕后，由诗班先领唱，全体会众齐唱“面对未完成的使命”。然后是诵读尼西亚信经。诗班和领唱献唱“主啊，与我们同住”。诵读和歌声发出巨大的力量，让人无不感动。

随后是为普世教会祷告，每桌的人可以牵手，用自己的语言，大声或默祷。

然后是悔改的祷告和委身。与神和好之后，大家互祝平安。

五、圣餐礼

首先是圣餐预备。两个身着白衣的女子，像天使一样翩翩起舞，带领游行队伍，高举饼、葡萄酒，送到主席台。来自世界各国的领袖们聚集在圣餐桌前，准备帮助我们领圣餐，在乐队演奏的音乐、诗班的歌声中，把我们带入领受圣餐的神圣时刻。

主持圣餐礼的俄隆比主教在进行圣餐祷告和祝礼时，突然声音嘶哑，说不出话来，道格·博兹奥尔接替了他的工作。

我们一起唱“圣哉、圣哉、圣哉”，然后用各种语言诵读主祷文。接着我们齐唱“神的羔羊”（The Lamb of God）。

六、分发饼和杯

5000 会众被邀请到舞台周围的 25 个圣餐桌前，以饼蘸酒。全场响起“求主垂怜”、“看哪神羔羊”、“十架大能”、“唯在基督里”。也有人只是领受祝福，而没有领圣餐。

七、委身和祝福祷告

全场起立，基于《开普敦承诺》接受差遣。

最后是祝福祷告：“愿基督，公义的太阳，神的羔羊光照你们，驱走你们前面道路上的黑暗。当你们离开开普敦和本届洛桑大会时，愿神祝福你们！愿神赐福你们！愿神赐福你们回国的旅程！愿神赐福你们在每国城市或乡村的服事。当你向万民传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时，奉他的名服事穷人时，愿神赐福你、保守你、供应你！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

最后，全体高唱“拥戴我主为王”结束了今晚的聚会。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为隆重的圣餐礼拜。除了参加的人数众多外，圣灵的特别工作，精心的准备，会众的同心合意也是不可或缺的。圣公会圣餐礼拜的形式也让我感到很新鲜，圣袍、诗歌、启应文、程序都让人感觉到庄严、神圣。旧约花了很多篇幅来介绍祭司的服饰、献祭的程序、会幕的建造等等，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敬畏他。当然，新约让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但是，仪式和内容是相辅相成的，过于简单的仪式是不是会削弱内容的影响力呢？

我们要离开“变象山”了，我更加能理解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的感受了，神让我们在这里享受盛筵，是为了我们奔跑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当走的路还甚远。

愿神保守我们每个人的脚踪！

（完）



贝如意姑娘
Miss Susan Rowena Bird
殉道日期：1900年7月31日
年龄：35岁
殉道地点：山西太谷
国籍：美国

临终遗言：

昨夜，我们以为尚存一线生机，真想往山上跑，但权衡到拳民、盗贼和四伏的危机，风险实在太大，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假若你我从此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

神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为他找回一个失丧的灵魂？我们为他而来也为他而去，我所最爱的，再会吧……



要用精金作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锤出来。灯台两旁要杈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杈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

出 25:31—34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宗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创 28:13

